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移植現代性—論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許麗玉

Li-Yu Hsu

指導教授：夏鑄九 博士

Advisor: Chu-Joe Hsia,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July 2016

謝誌



學習向來是孤獨的，卻不是孤單的，能完成這份論文必須感謝不少人與緣。

感謝我的家人、朋友、同事、學生，以及在台大認識的同學，願意等待、聆聽、理解、分享，成全我這趟面對知識的自修之旅。

感謝中原大學建築系黃俊銘教授的介紹，讓我因緣際會認識故總統嚴家淦先生的家人嚴雋泰先生及其夫人，也感謝他們的信任與協助，讓我能在論文寫作期間查閱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國史館、國發會國家檔案局的珍貴史料。

感謝我在台大選修課的老師們為我打開各扇窗，包括藝術史研究所陳葆真教授帶我認識中國書畫史、音樂學研究所王櫻芬教授帶我認識歷史錄音、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徐進鈺教授帶我認識批判地理學、黃宗儀教授帶我認識文化地理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恆達教授帶我思索電影與城市的研究方法、王志弘教授解析各種空間研究理論、賴仕堯教授分享建築與城市形象的研究概念，以及夏鑄九教授帶我認識都市社會與歷史寫作的批判研究。

感謝出席我的資格考、計劃書審查、論文口試三階段的口委，包括資格考的所外口委：東海大學建築系郭文亮教授；計劃書審查的所外口委：美國路易維爾大學藝術史學院賴德霖教授；同時出席資格考與計劃書審查的所內口委：賴仕堯教授。論文口試的所外口委：東海大學創藝學院羅時瑋院長、台大外語所張小虹教授。論文指導委員會的成員：成功大學建築系吳光庭教授、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恆達教授與王志弘教授。另外，也要感謝台大的行政單位、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行政人員協助我辦理各項行政程序。

感謝人在美國的賴德霖教授與美國耶魯大學建築學院的 Kent Bloomer 教授持續寫信關心我的研究生活，吳光庭教授不厭其煩回應我各種提問，張小虹教授鼓勵我勇敢堅持自己的寫作，輔大社科院夏林清院長鼓勵我堅定自己的直心。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夏鑄九博士看見這份論文瑕不掩瑜之處，支持其可能性。

終於，這份論文將建築回歸與回饋給我成長的台灣社會，讓我能繼續前行。

許麗玉。2016年7月。台北

移植現代性 — 論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



許麗玉¹

摘要

為了回應當代對戰後台灣現代建築的探究，本文以歷史研究為基礎，重新建構方法檢驗「建築是特定社會的產物」之概念脈絡。本文嘗試從 1970 年日本大阪萬博會的中華民國館設計爭議切入，重回當時國家與社會動盪的局勢中看建築的能動性。宏觀的敘事從 1970 年前後開展多向的視域，這些段落重建歷史脈絡使建築透明，藉此我們檢視建築如何跟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文化認同之間產生關係。這樣的現代建築看起來是一種物質空間的形式，實質是一種流動空間，同時是一種制度。作者於本文結論中反思本文敘事脈絡，建構移植現代性的論述，並強調當代的建築專業須重構認識論的方法檢視「現代－建築－歷史」可能的力量與流變，以重新理解戰後台灣的建築與現代性。

關鍵字：移植現代性，現代建築，文化反身性，戰後台灣，民生主義育樂篇

¹ 作者的電子郵件信箱: hsuliyu.muto@gmail.com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Li-Yu Hsu²

Abstract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The approach is reconstructed for re-contextualizing the concept of “architecture is the product of specific society”. Reconsidering the architectural agency, the arguments of the Pavilion Republic of China design in the Osaka Expo in 1970 are reviewed under the conjug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society. To begin with macro-narrative before and after 1970 is to re-create the multiple visions. These paragraphs reconstruct the context of history to visualize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building. Through it, we are able to see the connections among the building, the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negotiatio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is kind of modern architecture looks like a physical space with modern form; in fact, it is a flowing space and an institute. I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s examined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f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Author emphasiz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profession should re-construct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of seeing the possible initiative and transforming within “modern-architecture-history” to re-understand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in postwar Taiwan.

Keyword: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modern architecture, cultural reflexivity, postwar Taiwan, the recre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² Author’s E-mail: hsuliyu.muto@gmail.com

移植現代性 — 論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



目錄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中文目錄	iv
英文目錄	v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_1
第一章 表述戰後台灣的形勢	_11
一、 切入中華民國館之死	_12
二、 顯影「現代」	_24
三、 轉譯「傳統」	_36
第二章 物質化戰後台灣的工業環境	_49
一、 不毛之地—公共私有化	_50
二、 田園城市—城鄉資本化	_58
三、 平民住宅—社會共同體	_63
第三章 知識份子的建築觀	_72
一、 大學之道—現代生活的烏托邦	_73
二、 建築師法—制度化的專業黑手	_80
三、 空間營造—文化的抽象與具體	_92
第四章 補述「大同社會」之夢	_97
結論 移植現代性	_109
後記 夢醒台灣之文化反身性	_114
內文附圖	_119
參考資料	_127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Postwar Taiwan



Contents

Acknowledgement	i
Abstract in Chinese	ii
Abstract in English	iii
Contents in Chinese	iv
Contents in English	v
Introduction Taiwan Modern Architecture with Non-Vision to Taiwan	_1
Chapter One Presenting the Conjugation of the Postwar Taiwan	_11
1. Interpreting The Death of the Pavilion Republic of China	_12
2. Developing “Modern”	_24
3. Translating “Tradition”	_36
Chapter Two Materializing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of the Postwar Taiwan	_49
1. The Barren Lands: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Property	_50
2. The Garden Cities: Capitalization of Cities	_58
3. The Housing: Social Community	_63
Chapter Three Intellectuals’ Architecture	_72
1. The University: Utopia of Modern Life	_73
2. Architect Provision: Institutional Profession	_80
3. Building Space: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of the Culture	_92
Chapter Four Up Above the Dream of Great Harmony	_97
Conclusion Transplanting Modernity	_109
Afterward Awakening to the Cultural Reflexivity in Taiwan	_114
Figures	_119
Reference	_127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2015年元月間，中國大陸的建築師史建，在網路上招攬「台灣現當代建築考察團」的簡介中表述：「在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近代台灣都市規畫與建築設計都是在日本人掌控中完成，公共建築以折衷主義為主流。1945年回歸後的幾十年間，公共建築復古（民族）主義盛行，由於脫離建築傳統語境，與同時期大陸國家主義建築（如北京十大建築）相比，這些建築（如圓山大飯店、故宮博物院、台北忠烈祠等）大都顯得比例失當、語言怪異、工法粗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父紀念館眼下不僅仍進行三軍儀隊交接儀式等紀念活動，同時也是民間文化、休閒活動的公共場所。」他還提到「最精髓的建築學術考察線路之一」包括「寶藏巖（貧民窟保存）保育」，開宗明義表白今日看過去，建築不會脫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形式美學之間的關係，更令人驚訝的是，史建用「貧民窟保存」形容「寶藏巖」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竟還表露出自我縉紳化的「現代建築師之眼」，將建築連結上表現社會階級的空間意識。

一般說來，關注以建築形式表現社會主體性的立場，多數偏重對民族主義和形式美學的再詮釋，難免從菁英主義看待建築和社會的關係。另外，關注以建築制度表現空間支配性的立場，則多倚重國家主義的社會制度，難免從技術官僚的視角去檢視干預公共建築的勢力。偏偏，主流的建築設計和都市計劃所強調的「規劃」，其實一直是建構民生經濟的主導性，而非認識人與環境之間的處境後，運用設計方法回應民生所需。尤其是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至今仍持續流變，這絕不是自然、緩慢、自主、循序漸進的演化成為民主社會的結構。

借用史建到台灣發現「台灣現當代建築」的眼光與措辭，是強調一般看待「台灣的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不應該繼續用保守的建築科學措詞，去回答台灣的「現代建築」形式。當代面對「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已經是社會學的美學範疇，現代建築再現的社會狀態是「政治運作的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¹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這幾乎是從法蘭克福學派之後、後現代主義之後，歐美研究「現代建築」歷史的基調，而造成今日各種立場、觀點之間的差異，

¹ 華特·班雅明（1935），〈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

仍是「建築的現代性應該如何與社會生產連接？」的問題。因此，現代建築的歷史研究仍在探尋連結建築和社會的理論橋樑，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開展思辯空間與社會生產的論述關鍵是：讓社會空間化與空間社會化連動，重建歷史空間的反身性。



為此，反觀目前台灣的研究時勢為何？

台灣傳統建築史和台灣現代建築史之誤分

台灣的建築類型出現「傳統」與「現代」的區分，主要受到學院內給建築師的建築史中，「西洋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分門別類的影響。但從研究台灣建築（史）的時勢來看，這是在不該分裂處分裂的結果。台灣的建築系師生開始關注在台灣的建築歷史，依照成大建築系教授吳光庭的觀點，大約是在中美斷交後的 1980 年代，李乾朗在文化大學建築系演講金門民居等閩南建築的觀察記錄，然後是 1990 年代林會承在中原大學建築系一年級開課講「台灣傳統建築概論」，以「地域性」的分類記錄建立台灣的建築形制傳統來概論歷史，並逐漸發展成為建築學院的傳統建築入門課程。

不過，追溯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仍只有台南的成功大學有建築工程系的短暫時期，1950 年代金長銘帶著成大學生辦的《今日建築》雜誌裡，已經著手描繪台灣的民居建築和漢人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1960 年代《建築雙月刊》和改版後的《建築與計畫雙月刊》談建築師的建築設計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乃至於從成大建築系畢業、到美國哈佛大學念完書回台的漢寶德，1970 年代在東海大學辦《境與象》雜誌的初期，和負責編務的夏鑄九談的也是建築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重提這些往事的意思是，探討台灣傳統建築史、台灣現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之間的關聯，本來應該是為了讓建築師看清楚台灣的社會，將建築回歸所處的社會脈絡，並不是為了方便塑形而分割出傳統和現代的形式。但是，台灣的建築學院內移植接枝發展出分門別類的建築史，造成建築被以營造的形式分類傳統和現代，甚至還分別歸納為東方和西方的形式語彙。教科書化的歷史形式使得台灣的建築師作出來的建築設計，與所處的環境及其居民越來越無關，更與社會生產一刀兩斷，成為看不見台灣的台灣建築。但眾人對保存古蹟與歷史建築物的態度與作為卻是相對積極且容易製造共識，這也造成了今日像史建這類的建築師或一般看待「台灣（現當代）建築」的反應：對形式熱衷，對社會冷感。

翻譯歷史成為戰後台灣的百憂解 (Prozac)



面對戰後台灣的歷史城市，台灣的建築師普遍陷入難解的憂鬱。

2013 年底，台灣建築史學會常務理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傅朝卿，「獨立出版」²一本只有英文版的《台灣近現代建築史》（*A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aiwan*），在序文中他表述台灣有獨特的社會文化（*unique socio-cultural*），因為地理位置和氣候因素而與中國大陸有所區別，他又形容原本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的人民」（*Taiwanese people*），一直期盼著「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引介「現代性的精神」（*the spirit of modernity*）到台灣，並且，「現代台灣建築」（*modern Taiwanese architecture*）的歷史是反映「現代台灣」（*modern Taiwan*）的歷史。其中，令人困惑的，是他引用自然環境的關聯性，分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自然關係，卻又將「現代建築」與「台灣的人民」之間的關係，描述成為人類對末日想像的精神寄託。

傅朝卿認為經濟形態影響建築的現代化，他將 19 世紀的茶葉貿易港口連結上閩南客家建築的形變，並認定接下來由日本殖民的 50 年，是台灣現代化的基礎。他利用自然環境的關聯性，將 1923 年日本關東大地震連結上台灣的建築發展，自此依照現代日本建築轉變而改變，成了台灣和日本之間更自然的現代建築關係。如同 1920 年代傳播美國新視域的《亞洲》（*Asia*）雜誌的措辭：*Nationalist Government*，他用來形容 1949 年後的「國民政府」，主導戰後現代化和建築的發展是為了維繫「道統」，將政治的意識形態置入宗教建築與觀光相關的建築。他用菁英主義的視角看待建築師的作者角色，並認為由於 1960 年代都是由中國大陸來的建築師主導多數的建築案，直到 1970 年代在台灣受教育的建築師才逐漸成為設計工作的主要角色，然後，1980 年代逐漸成為開放社會，後現代建築與地域主義在專業與公眾之間受到歡迎。

不意外的，他的觀點支持了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是意識形態干預的空間生產，他也讓空間和空間意識連結在一起，並試圖在描述台灣和現代建築之間的脈絡時，帶入地理的、社會的、人類的初步概念以及一種政治的立場。然而，針對空間營造關係的分裂和連接之間的觀點，以及在書裡收集的現代建築(物)案例，多數著重在營造形式的科技與美學的表現，同時為邁向現代化之路，彷彿現代化

² 這裡用「獨立出版」的意思是根據傅朝卿在出版此書之際於臉書上自陳此書印刷量少，主要贈與歷史研究同好、非營利目的。

為文明的終點站，以及在英美日「混血的視域」(hybridism vision)下讓台灣去中國化露出，這應該才是這類表述台灣現代建築形貌的實質作用。

2012年9-11月期間，台灣現代建築學會的榮譽發起人漢寶德，接受天下雜誌出版社與姚仁祿的安排，以10堂演講「東西建築」的觀點，從古代建築談到現代建築的形式營造，讓「現代傳統」自然形成，並在最後一講交由他在東海教過的學生姚仁喜，以自己的建築設計表述當代台灣建築的形貌。這十講，引導當代尋求「台灣(現代)建築」認同的憂鬱，回歸文藝復興的「現代建築」襲產，終將現當代同流為「大乘建築」的傳統。然而在漢寶德的「東西建築」觀點下，還是「希臘—羅馬—佛羅倫斯—美國」接枝而成的建築史，翻譯歷史成為戰後台灣的百憂解，仍未能重建歷史空間的反身性。

在台灣，民間企業集團越來越常見以簡化、擷取建築學院的形式概念，建立一種公眾的建築講堂，介入建構社會大眾看待建築的視角。多數以翻譯歷史建立專業意義，無論是借用關鍵字做文章，或者以經典導讀西方建築。甚至是形式上引介德國包浩斯學院的機械美學，卻不反思德國納粹黨掌權後重新任命校長的計謀，以及學院內一些被驅除、置換掉的藝術，其價值是原本積極表現解放階級的自由意志，而這正是法西斯主義首要壓制的社會反抗意識。至於後來在納粹監控下重新開放的包浩斯學院，已無階級社會的自由意志，只剩下菁英形式的美學教條向外擴散。這類令人不安的和諧氛圍，就像最近網路上流傳一場演講的文宣：「現代建築 (Modern Architecture) …主張揚棄長久以來以傳統的延續作為基礎所建立的古典主義，試圖以實用性、效率、經濟性作為基礎，希望能建立符合時代需求的一套抽象的量化模型，強調工業化生產的合理程序，運用新的材料與工程技術，解決都市化居住問題成為『現代建築』所努力追求的方向。…在帶有社會主義情懷的唯物觀點下，建構了對二十世紀城市與建築發展產生莫大衝擊的機械美學，透過『現代建築』的變遷，不僅可以清楚呈現『現代建築』如何在所建構的機械美學基礎上不斷成長，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探究內在理念外在形式的變遷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³這類開放給公眾的建築講堂以圖像及教條形式召喚包浩斯美學精神，但對工業社會的認知是將建築當成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這種建構公眾如何看「現代建築」的實質影響，是去除人們看見階級社會脈絡的能力，最終，向公眾開門的建築講堂成為機械複製美學的神學院。

³ 參考2016年欣講堂的施植明演講介紹。

造「夢」機

建築學院內有此一說：建築師把夢都畫進建築藍圖裡。於是，建築師的手稿成了一種為現代建築解夢的路徑。但，多數不會喚醒沉睡者，反而深度催眠建築師。



首先是 2010 年開始，台博館編列經費徵集戰後台灣的建築圖，由吳光庭和王俊雄召集一些建築師、建築系的老師和研究生，協助撰寫這些建築圖的檢索，並在 2011 年以第一批圖資的整理成果，在台博館進行一場「東亞現代建築紀錄與維護」的學術研討會，同年，郭肇立藉著台博館這項計畫之力，成立台灣現代建築學會，宣告其目標係加入「現代建築紀錄和維護國際組織」（DOCOMOMO International），這也是 2012 年，台灣現代建築學會辦「台灣現代建築 20+」和「海洋現代性—華人的構築文化」學術研討會的基礎。

2012 年 11 月，台灣現代建築學會在台博館辦「海洋現代性—華人的構築文化」的學術研討會，同時出版海蒂·海倫（Hilde Heynen）的《建築與現代性》（*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中譯本。這次由理事長郭肇立設計「海洋」與「華人」的命題，提出「海洋現代性」表現轉向地域性的研究取徑，意圖建構一種「非西方的現代」以克服「西方現代」。然而，他安排與會發表論文的作者組成和立場，卻表露出一種政治化、風格化、男性化的建築論述，反被受邀與會的作者海倫質疑：「這種論述現代性的方式，看不見社會、市民、女性，只剩下一種現代建築師偏好的形式風格之創意表現。」⁴

郭肇立為《建築與現代性》中譯本寫的序文〈移位的現代性：當東方遇見西方〉中說：「十九世紀之後的殖民主義入侵，促使了我國建築必須面臨他者，並認真去思考文化差異的問題。…戰後的台灣…一方面需面臨國民政府的極權統治與美國主義的認同困惑，另一方面卻仍無法擺開長期日本文化的熟悉感。…新傳統主義建築在戰後台灣一片房地產消費主義建築中…是一種對歐美日中四方強勢文化的模仿與抵抗，…脆弱地傳達一個移位的現代性。」這種「移位」之說利用搖擺主體／客體的位置示範意識的再生產，化約了台灣移民社會脈絡的空間化，形塑台灣成為一處永遠的文化殖民地，忽略了戰後台灣的現代主義建築師藉由再現流動空間，以結合文化與地方的語彙，但在文化認同層次上仍抗拒了西方的機械複製美學，在回首來時路的空間經驗中營造反身性。

⁴ 作者與會錄音筆記。

然而，在 2014 年初，台灣建築史學會申請加入現代建築紀錄和維護國際組織，成為台灣分會（DOCOMOMO Taiwan），卻非原本以此為唯一目標的台灣現代建築學會。反而，在 2015 年底由台博館委託學會理事長郭肇立策劃一場耗費近千萬的館慶展覽中，台灣現代建築學會斷斷續續、不連貫的討論，所提出的一些不完整的、有爭議的、不連續的、不清楚的現代性觀點，逐漸與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連結上的問題意識，竟是隱沒在六個金屬框架所展示的「一個現代性的尋夢計畫」。

郭肇立說：「城市如同博物館，他收藏著許多關於城市生活的記憶，一段段的影像相互對話，整合出屬於台北老城的共同歷史。此展『以夢似迷宮，夢似幻境』的策展概念，透過歷史復甦的尋夢計畫，重新整理台北舊城區現代化過程中散落四處的歷史碎片與記憶地點的資料，將其設計成六個現代性迷宮，包含都市烏托邦、現代大街、都是遊牧、知識理性、威權空間、工業生產等，提供觀眾一個現代性的空間體驗與自我反思的場域，並透過影像隧道的動態空間裝置，導引參觀民眾循著台博館的發展脈絡，經歷台北城的歷史更迭。」⁵他特別強調利用科技「建構民眾對台北城的『集體記憶』」終究，台博館展示的台北城是一部意識再生產的造夢機，而郭肇立表述的「移位現代性」則是機器複製的意識形態。

重新連結社會視野的台灣現代建築（史）對話

將研究路徑與台灣的歷史問題連結起來，是經由一些彼此不交流的討論活動與一些個別的作者立場。

2012 年 2 月，台灣現代建築學會和台灣建築雜誌合辦「台灣現代建築 20+」，在面對台灣的歷史複雜性下，與會者各自表白了論述定位的難處，特別是面對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物。相對於台灣的建築學院內分門別類的建築史，這是台灣的大學教授在台灣建築教育、日本建築教育的觀點和歐美建築思維之間的交互作用下，在台灣看台灣的建築形式，意圖重新建構出一種歷史的視角與主張。所以，這次未完成的討論仍表現出建構專業中心性的企圖及其問題：

- （一） 解放主體性：是探尋建築的哲學思維，也就是意識形態干預營造形式，讓空間與空間意識連結，另一方面也是表現主體性的空間營造。除了探問建築師的思路和建築形式的關聯，也論及統治集團表

⁵ 參考台博館官網介紹。

現於空間的意識形態，並探索長時間累積、重層的空間形式和社會狀況的關係，建構屬於建築師與統治者的空間主體性。

- (二) 建構地域性：是將建築形式的分類連結上人文地理、環境資源，一方面是建構文化的多樣性與建築形式的關係，另一方面是推論氣候與大地資源對於營建的材料和形式的作用，三方面是「台灣化」的趨勢，重新收納位於台灣的建築物成為「台灣建築」，建構屬於台灣的地域性。

2014 年，在台北舉辦的「社會關懷視野下的建築實踐（Architecture for People）－當代東亞建築專業的挑戰與機會」學術研討會，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建築師、大學教授與芬蘭的 Alvar Aalto Foundation and Museum、建築師、大學教授，各自發表對於現代建築的觀點，這次重點是省思建築如何回歸人與環境的關懷，以及空間規畫專業者如何適應當代政經局勢與環境變遷，還能在社會關懷視野下，提出永續城市歷史的規畫設計。在這場對話之後，台灣（現代）建築連結上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等其他領域的範疇，顯得更迫切了。

於是，從「台灣現代建築（史）」這個詞語、組織活動與論點形成的過程中，浮現出下一步更積極的研究前提包括：

- (一) 反思文化的多樣性
- (二) 索求主體性的空間經驗
- (三) 回歸地域性的關係
- (四) 營造多元社會的適應性

問題意識－移植體制化（institutional transplanting）與反身性（reflexivity）

以下是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的一段親身經驗，正好呈現當代反思亞洲的建築現代性，必須切入「移植體制化」來看「反身性」的問題意識。

2016 年 4 月底，我帶著交大建築所 6 位研究生到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參與連續 3 天學院內全英文的評圖過程。

第一天下午，這些台灣學生沒有以英文表述自己對新竹監獄宿舍再利用的設計構想，即使早已知道將面對這樣的對話場面，他們選擇推派一位應用外語系

畢業的學士後建築組的女同學翻譯。結果，整個評圖過程顯得特別沉重，不像上午港中大師生全英文評圖的愉快氛圍。

第二天下午，一位港中大高材生的作品被選上榮譽評，這件作品是規劃北京胡同成為國際觀光旅店，她很恰當的掌握全英文的建築設計評圖要項，就是要開門見山、簡捷扼要地表述「基地特色－形式重點－設計構想」，並且懂得鋪陳畫龍點睛的驚喜，她在表述自己的設計尾聲時，指著一張二層樓的剖面圖說，她要將一些在胡同店鋪二樓的房間，保留給一些有興趣體驗北京住商混和的外國旅客，她想藉此模糊掉新潮的西式旅館與傳統的中式店鋪之間的界線。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的漂亮說詞，在她流暢的英文與標準的建築製圖表現法襯托下，完完全全收服了台下從英文世界來的外籍評審。其中一位老教授甚至提到自己的太太會非常喜歡住在這樣的店鋪樓上，因為她下樓來就能買東西。會後，我稱讚她很懂得如何講給外評聽，她很自信的回應我：「因為我有畫面 (Because I have picture)。」

相較之下，另一位做新竹監獄檔案館設計的女學生就像台灣去的交大學生一樣，並沒這麼順利，雖然她試圖用英文解釋新竹的地方感與迂迴的空間哲學，結果，多數的外評不感興趣、保持沉默，只有其中一位老教授隨口舉出美國建築師彼得·艾森曼 (Peter Eisenman) 在柏林設計的歐洲受害猶太人紀念碑，質問她這兩案形式相近，有何差異？會後我跟她的指導老師表示，這些外評沒看見設計重點，他說：「她太緊張了，外評根本不知道新竹。」

第三天上午，一位女學生的畢業設計做香港快速道路旁的舊社區再生案，她從現況一座小廟與當地的老人生活談起，她希望結合藝術家與居民的力量，慢慢的、長時間的修建當地的小房子、登山步道，逐漸形成一處年輕人也喜歡去的、有藝術氣息與文化風味的社區。結果，台下的香港華人建築師輪番指責她的設計太滿、太無章法，而且形式普通，他們提出一些西方建築師比較漂亮的做法，要她回去重新想想設計。女學生退縮在一角未發一語，直到她的指導老師發言，這位英國建築師說他自己非常享受指導這個案子的過程，因為這位女學生一開始就很關心香港這種舊社區的未來，她從一座小廟開始逐步思考如何帶動居民營造自己的社區，她的設計讓人們看見香港，這應該才是評論這個題目的方向。之後，原本極為不滿意這個設計的香港華人建築師馬上改口稱許。

我從參與發言到列席旁聽，直到最後一天，見識到台上台下一群華人拼命講英文、迎合英文世界的建築價值觀，全英文談建築是如此順暢、美好、愉快，

用華語就不行了。我突然理解到這些設計在哪個城市已無差別，特別與香港無關，這樣的建築根本是西方文化移植之物，更是與自身的脈絡一刀兩斷，也正是這樣的震撼讓本文的研究問題更真實。



移植體制化阻礙了反身性的問題意識，是學院作為教育體制，設計作為專業產物，兩者都成了移植現代性的一部分，更悲哀的是身處其中的人，竟無法有反身能力看見自己。移植體制化造成無法辨識自己的現代性窘境，不僅發生在香港、新加坡，也發生在台灣，而這三處都曾是接受美援計畫、1970 年代經濟力竄起的亞洲四小龍（Four Asian Tigers）。如何重建反身性面對自己的城市建築與社會脈絡，挑戰了這些地方的當代都市治理者與空間專業者的智慧與技術。

分析性假說

重建反身性的空間歷史研究是將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與社會脈絡連結起來，探問空間生產的支配網絡。為了看清楚建築的現代性所依附或製造的文化形式，同時認識現代建築的空間形勢（conjugation）和關鍵作用，探問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之主要概念是移植（transplanting），同時涉及顯影（developing）、轉譯（translating）、建築脈絡文本化（architexture）與媒體中介空間（media milieu），提問的基本立場是將建築回歸與回饋給勞動生產空間的社會脈絡。

綜合今日研究時勢與浮現的問題意識，建構分析性假說如下：

- （一） 現代性是一種特定社會的空間經驗。
- （二） 文化反身性表現在空間中，已進行的、進行中的、接下來的活動之間的交互作用。
- （三） 在時勢驅動的空間營造下，建築一方面是物質構成的空間形式，另一方面是提供論述的空間營造。

各章期望達成：

- （一） 反思文化反身性
- （二） 檢驗空間關係的地域性
- （三） 審視空間經驗的主體性

（四） 修補社會空間的連結

論文寫作—為眾人說故事

本文選擇重新整理既有的文獻，刻意從剪報、照片、電影、紀錄片、小說、傳記、國家檔案、人物訪談等脈絡來說故事，從公眾社會閱讀、表述都市與建築的方式，也就是在媒體中介空間（media milieu）中建立一種更接近我們的語境，從中開展可能的視域與觀點，在結論中建構理論的可能性空間。這種甘冒學術寫作風險的表述方式，除了一心一意想為眾人卸除專業的斗篷，也因為以歷史研究為基礎的論文寫作，總得面對二項挑戰：既有的歷史建構「專業」意義的視線（sight）與視限（limited vision），以及非專業者與專業的歷史之間的斷裂。

第一章表述戰後台灣的形勢共有三篇文章，除了表述戰後台灣的國際關係、國家經濟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與初萌芽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脈絡，**反思文化反身性**，同時架構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與概念。這些研究方法交叉使用於第二章物質化戰後台灣的工業環境的三篇文章，重新建構戰後台灣的土地、房屋、居民之間的社會脈絡文本，**檢驗空間關係的地域性**。第三章知識份子的建築觀的三篇文章，同樣交叉使用主要的研究方法，建構建築專業體制化的社會脈絡，**審視空間經驗的主體性**。第四章補述大同社會之夢則是爬梳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與技術官僚體制的結合，介入社會建築的脈絡，並實質形塑空間，最後從一個建構育樂的大同社會之夢醒來，進到另一個面對階級批判的大同之夢，**修補社會空間的連結**。結論以「形勢」（conjugation）綜觀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檢視論文建構的分析性假說，進一步理論化移植現代性。

「藝術皆具政治性，否則只是裝飾品」⁶，建築也是如此。

現代建築的空間構成是流動的「時間—地點—建築物—建築師—資本（家）—政客—外來者（物）」，透過幾個戰後台灣的建築故事來爬梳空間的歷史，初衷是為了重新探究一些認識建築的基本問題：現代都市計畫中的建築應該是什麼？以及，現代建築如何表現社會的轉變？至於，台灣的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既有一些造成分裂的觀點必須釐清，也是省思台灣的現代建築和現實環境之間斷裂的開始，期望因此我們能夠有智慧劃開理所當然的歷史美學形式斗篷，終於能反身看見自己。

⁶ 節錄自 2011 年《莎士比亞的秘密》（Anonymous）的電影對白。

第一章

表述戰後台灣的形勢



當時，許多不一樣的中國人聚集到一起，然後發覺到自己什麼都沒有，除了在苛酷的人性考驗中僅存的一點尊嚴與夢。…太多人不願去想那段時間，可是那個時代有很多線索可以讓我們看清楚現在這個時代。

—楊德昌（1991）《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一、切入中華民國館之死



楔子

少有現代建築像中華民國館這樣歹命，先是受困戰爭，接著遭火焚身，最後成了亞細亞的孤魂。

1970 年前後

美東時間 1968 年 11 月 8 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頭版新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宣布長期聘任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I. M. Pei），重新規劃該校擴建案，尤其要解決 Morningside Park 的體育館興建案的爭議，校方期望透過這項史無前例的校園整體規畫委託案，中止 Morningside Park 的低收入戶住宅拆遷爭議，向社區居民展現哥大的好鄰居形象，並終止 Morningside Park 的體育館設計所引發的學生佔領校園罷課抗議行動。校長認為，聘任設計美國故總統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象徵哥大經過 215 年歷史後的「新時代」（a new era）。

離開曼哈頓西 43 街哥大俱樂部記者會現場，貝聿銘從曼哈頓的辦公室啟程，經日本飛往台北，準備出席台北時間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記者會，親自說明 1970 年日本大阪萬博會中國館的設計，並介紹四個月前他從波士頓、紐約、台北，親自面談挑選的五人設計小組（李祖原、彭蔭宣、翁萬戈、榮智江、榮智寧）。在飛機上，他一面準備記者會說明稿，一面回想 1968 年 7 月帶妻女回台探望父親，前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暨前中央銀行董事長貝祖貽，同時拜訪同為蘇州名園家族後代的嚴家淦副總統之情境。^{（圖 1）}

此刻，在台北的行政院會議室，眾人正忙著因應 19 日將公布的行政院局部閣員改組人事，以及緊接著的第五期四年經建計劃和財政稅改計畫。經濟部長李國鼎向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報告，他交辦新聞局安排貝聿銘於 16 日的記者會說明日本大阪萬博會中國館的設計理念。此刻的嚴家淦正斟酌著這次國家花費一百五十萬美元在日本蓋一座中國館的作用，以及更多的憂慮是落在同樣於 1970 年舉行的聯合國 25 周年紀念大會，他必須鞏固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的任務，特別在 1967 年 5 月 6 日副總統嚴家淦訪美 20 日後，加拿大蒙城世博會中國館竟然無端失火，國際關係顯然越來越不利這個國家的政治處境。

中國館失火

加拿大蒙城時間 1967 年 5 月 30 日早晨四時左右世博會中國館失火，台北時間 1967 年 5 月 31 日《徵信新聞報》報導，中華民國館與伊朗館、加拿大貝爾電話公司陳列館相距不遠，為一座兩層樓「中國宮殿式」建築物，底層展出的是工業品和農產品，二樓設有觀光導覽詢問處和中國美術品陳列室。這次火警據大會官員估計損失約在三十五萬元左右，但博覽會的一位發言人說，他們並不會懷疑此次火災有任何陰謀。

台北時間 1967 年 6 月 1 日《經濟日報》報導，因館內沒有人留守，至 7 時許才被人發現火焰及黑煙從中華民國館的窗口冒出。台北時間 5 月 31 日上午 9 時許，給外貿會主委徐柏園的電報中說，大火後，館的外殼仍存在，但館中除國寶石器外，其餘大部分燒毀，館中 4 名工作人員及 12 名女服務人員均不在場，故無人傷亡。

該報潛望鏡社論標題「國際怪事多走火入魔，參展六十國偏偏燒我」，提到這次加拿大蒙城世界博覽會，投資達一百一十萬美元，政府並組成籌備委員會，以中央銀行總裁兼外貿會主委徐柏園為主任委員，主持其事。社論批評這次中國館主要是宣傳，蒙城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語城市，但中國館的法文宣傳文件根本沒有。內部陳列方式死板無朝氣，只能使遊客發「思古之幽情」。一位曾經參觀過博覽會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匿名說：「博覽會中國館內最吸引遊客的是十二位服務小姐」。

同一版面，經建版記者侯政引述建築師楊卓成談失火的中國館，他說中國館的建築面積佔地一萬八千平方英尺，折合本省的建坪為五百餘坪，造價為二十三萬八千元加幣，折合美金為三十四萬元。搭配手繪粗略的中國館平面圖，他說中國館是完全防火的，不但有十二位異於他國的溫柔大方金釵引人注目，且有匠心獨運的用綾羅綢緞來將一個大廳隔成曲折迴廊，才真正地令人流連不去，他推想屬於縱火的成分較大，因為中國館太惹人注意了。最後，他斷然說：「我的設計，絕對安全！」

中國宮殿式

加拿大蒙城世博會之前，中華民國館出席 1964 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同樣是楊卓成設計的宮殿建築。196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徵信新聞報》第二版標

題：「美輪美奐中國館，宮殿建築，氣象萬千，四樓大廈，各有寶藏」，新聞形容「這棟耗資近百萬美金的中國館，是純粹的中國宮殿式，建築所用的材料除鋼筋外，全部由台灣海運到紐約，金色屋脊，朱紅廊柱，無論在色彩、格局和線條上都臻於完美之境，此一幢巍峨屹立於西半球的中國宮殿建築，氣象萬千。中國館最大特色是向西方介紹一個歷史文化最悠久國家的建築。」^(圖2)



這一年中法斷交，台灣的東西橫貫公路剛開闢，山地平地化，總統蔣中正即將巡視梨山行館。9月1日《徵信新聞報》預告雙十節前將完成梨山觀光大旅社，並且報導政府為實施梨山都市計劃，特別規定梨山各種公有建築物，一律需採「宮殿式」，要讓旅客一到梨山，即知到了中國，因此梨山大小宮殿林立，連梨山入口處的加油站也蓋成三百坪的宮殿，這種加油站在平地是看不到的。

但，究竟什麼是中國宮殿式（The Chinese palace style）？

從官方文件追溯，「中國宮殿式」一詞曾出現在1927年8月27日中國北京首都圖書館（Metropolitan Library for Peking, China）競圖評審團報告，報告中提到首獎的設計成功地將現代圖書館的需求與中國宮殿式風格結合。這項建築計畫出自美國將庚子賠款轉化設立的清華基金，評審團指導委員是梁啟超，即梁思成的父親。爾後，見1928年6月份的《亞洲》（ASIA）雜誌刊載一篇美籍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寫的〈在中國的建築文藝復興〉（*An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a*），將中國宮殿式風格與現代公共建築（modern public building）結合，置入各種中國現代教育機構的設計，他說：「每個國家都有她特有的建築發展，建築師無論是本地人或外來者，都應該在營造的過程中維護這樣的風格。然而，今日的中國建築師對自己原有獨特的建築傳統元素陌生，形同外人一般，無法融會貫通地運用在因應今日生活所需的平面與構造上，也無法繼續維持她的美感和品質。」1920—1930年代，墨菲設計了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並應孫科委託替國民政府規劃南京首都。當戰爭開始時，他將中國宮殿式帶回美國家鄉蓋成塔樓。

墨菲想像的「中國宮殿式風格—中國現代建築—中國現代教育」連結上國家大規模的建設，意外開展於戰後台灣。1966年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落成命名中華文化堂的儀式裡，總統蔣中正宣布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副總統嚴家淦表述「中華民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不可分。^(圖3)同一時間，身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則為了中國傳統現代化的公共建築採用中國宮殿式大

屋頂，被扣上「建築學反動權威」的帽子，吃盡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批鬥「美帝國主義」的苦頭。



這不是中國館

台北時間 196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見《中國時報》第三版大部分報導圍繞著體協辦公室大火事件的疑雲，其中一則專欄報導貝聿銘的中國館記者會。這一座中國館在大阪萬國博覽會場的日本主題展覽館之西，佔地 4150 平方公尺，展覽館總面積 1600 平方公尺，展覽館高 32 公尺，是展場內少數高聳的建築物。

「在建築藝術上來說，是採取中國『庭園式』的建築，而不是『宮殿式』」，貝聿銘特別在這一點上強調，他說：「在六個月的展期中，我們要表現的是活潑而多變化，輕鬆而有戲劇性，是像劇院形式的組合。中國文化不是一個小小中國館所能代表的，我們只能盡量表現它的精神，而不是拘泥於形式。」在場其他建築師質疑這兩棟三角形的房子不是中國的，新聞局長魏景蒙對這些建築師說：「他們這個中國館的建築精神所在，是以蒼宥的基礎走向新的境界。」該報專欄記者黃珊如此結論：「我們也了解到，要恢復中國文化，並不能一味抄襲過去的外貌，而是要闡揚它的精神，透過現代技巧來表現文化精神。我們也有了一個新的觀念，建築藝術不再是個人作品，而是『一組工作』（Team work）的整體性，也顧及到社區群體的調和，更要表現中國文化的精神。」¹

至於 1969 年元月份改版的《建築》雙月刊（1962/4-1968/4），發行人虞日鎮找來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漢寶德，擔任新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的主編，開版便是報導中國館的競圖結果，他評論了日本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引發了「什麼才是中國式？」的形式爭議，最後以「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結語。對這時的台灣建築師而言，建築似乎是與人的空間體驗沒有關係的專業行當，僅以使用行為模式的考量，提一句：「日本人對爬高的興趣究竟較西方人強多少？」²

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

該雜誌報導經濟部主導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館設計競賽，認為這次是以現代建築設計修正 1964 年、1967 年世博會中國館的古典樣式為目標，同時暗喻這項

¹ 本段文字節錄自 1968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中國時報》第三版。

² 本段文字節錄自 1969 年 1 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

公開競賽的美籍評審貝聿銘，介入競圖得獎團隊的設計，落選的台灣建築師等著評論這次由「青年人」執行設計的結果。在〈大阪博覽會之最後消息〉中，主編定位 1970 年大阪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真正的建築師是貝聿銘，據此評論貝聿銘以現代建築的流動空間表現庭園式的「中國趣味」，展示「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此種空間形式上的宇宙性，使得設計小組提出單線性的展覽室，為中國式的空間連續的解釋，有種羅織理由的嫌疑，而此設計的外型，有西方人的厚重與紀念性。」³

該雜誌在 1970 年五月份刊登青年建築師李祖原的〈中華民國館設計之回顧〉一文，回應外界質疑中華民國館的幾何形式不像正統的中國式建築，他引述貝聿銘的話：「我們並沒有特意去表現中國的傳統風格，但因為我們都深受多年中國文化薰陶，無形中，便在作品中注入了中國的精神和特性。」李祖原進一步表述「節潔、平衡、高雅」是中國館代表「東方建築」的特色，這是中國人的「灑脫恬淡、靜觀內省人生觀的態度」，「中國」表現在內部空間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境，外在形式「莊嚴、宏富而較拘謹」，唯獨在建築高度的表現上，必須克服鄰近中國館的日本、加拿大、韓國國家館的壓迫。對 1960 年代中國館那種「節慶式」的中國風，李祖原斥之為「庸俗的」、「非中國人本質」的表現。⁴對於接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教育的青年建築師李祖原而言，現代建築是特定的形式連結特定的意義，據此，中華民國館的象徵意義理當可用幾何形式普同化，並未覺察到這樣的「中國傳統現代化」之矛盾正是賦予幾何形式一種普同的意義。

另一方面，看在這時的台灣建築師眼中，1970 年的中華民國館造形反叛了 1964、1967 年的中國館，拒絕承襲 1912 年之後象徵中國的太和殿與翠玉大寶塔形象，所謂「現代」的形式彷彿是與「傳統」的意義一刀二斷的，眾人驚呼「這不是中國館」，這是形變了的現代中國建築。結果，「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這個政治結論與如何蓋好這棟建築的關係有限，無論是詮釋或批評中華民國館設計形式，像中國或像美國，此時，改變「現代中國」形象的既是沾染美國味的中國，也是台灣味不足的中國，這棟中華民國館浮現層層的國家意識，也擴散了 1970 年前後敏感的「中 | 華 | 民 | 國」國家與人民分裂的社會政治氛圍。

³ 本段文字節錄自 1969 年 1 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

⁴ 本段文字節錄自 1970 年 5 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

風雲起—中國日

1968年剛結束，《時代雜誌》（*Time*）寫到：「1968年超級大國沒有走向一場無法調和的衝突，人類好歹也該為此慶幸。然而，世界各國卻面臨著一種新危機—『內部異見病毒』。抗議的幽靈在國家之間飄盪，如同思想上的香港流感。人們發動抗議遊行、靜坐、引發騷亂，抨擊各種機構、團體和政權。」³第三世界解放運動在全美大學校園擴散，這波青年奪權的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聞周刊》（*Newsweek*）評論此時的報紙「開始在首頁刊登建築物被佔領和普遍混亂的總覽，就像棒球的個人得分紀錄一樣。」此時，從台灣大學到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林孝信正串聯北美的台灣留學生與學者，著手籌備《科學月刊》，這份通訊錄後來促成了1971年海內外大學校園內保釣運動組織的串聯。

1967年加拿大蒙成世博會中國館失火後，中華民國與加拿大政府之間的關係動盪，一度傳出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將親赴加拿大主持「中國日」，未成。直到1970年傳出「中日備忘錄貿易協定」在北京簽字，中共總理周恩來宣布「中國日本貿易四原則」，要求和中共做生意的日本工商業必須切斷和台灣的經濟往來。為此，中華民國政府決定由副總統嚴家淦於7月率團訪日，以主持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中國日」為名⁴，帶著經濟部長孫運璿和財政部長李國鼎，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協商中日經貿合作關係，以及向日本貸款三億美金興建南北高速公路與造船計畫。

1970年3月12日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提前開幕，首日據稱有3萬人次參觀⁵，建築師貝聿銘專程飛回台北，向經濟部追加中國館的維護費用，此時總花費已提高到兩百萬美元。但「博覽會不是商展，在這裡看不到商品和廣告，幾乎所有的國家展覽館所展示的，都是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⁵負責中國館展覽期間視聽器材維護及台視公司採訪工作的莊靈，在5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的〈萬博二月記〉一文中，形容這次的中華民國館以映像代替展品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象徵漢代宮闕的大門，由兩個一百零八英尺高的三角柱，以及中間三個透明的紅橋所結構成的白色中國館，無論從那個角度上看，遠非附近的印尼、紐西蘭、非洲館群，甚至緊鄰的大韓民國館所可比擬的。⁵博覽會實際上是世界各國間一場國力強弱和進步成就的無形競爭，這個館是否為已發展國家還是發展

⁵ 本段文字節錄自1970年5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

中國家，一眼便可看出。他形容眼見「所有的這一切，才是日本舉辦這次『萬國博』的目的和意義。」⁶

7月7日星期二，「中日經濟合作策進會」經濟組開會，「石川島」田谷、「三菱」河野均晤面，但不談船廠事。這天，日本昭和天皇決定與嚴家淦見面，中華民國政府隨行人員在飯店急忙熨燙禮服。當這個會面消息傳出，引發在北美的中國留學生群起抗議，認為此刻正是日本與美國串謀奪取釣魚台主權之際，日本政府故意挑在盧溝橋事變日讓中華民國政府失格。事後，日皇僅交代一句：「這是臨時起意，完全出自友善。」⁷

7月10日星期五，天陰偶雨，副總統嚴家淦在丹下健三設計的大阪萬博會日本主場館太陽之塔前主持「中國日」，儀式由北一女中110位學生組成的樂儀隊表演拉開序幕。^(圖6)

中華民國館的信息－抗爭、反叛與分裂的現代中國

日本傾國家之力從1963年開始籌備這場萬博會，當代日本建築界代謝派下門徒深信，這是戰後日本現代建築的誕生日。大會中一幅主題海報彩繪象徵日本的「太陽之塔」含著吸管，轉頭癡癡望著象徵美國的「可口可樂」(Coca Cola)，這瓶已開罐的可樂被四隻手握著，最外圍碰不到瓶身的黑皮右手壓著黃皮右手，同樣觸碰不到瓶身、唯一塗紅色指甲油的黃皮左手，則依附唯一緊握著可樂瓶身、看不見手指的白皮右手。諷刺的是，這張海報的標語是「人類的進步與調和」=「Coca Cola」。^(圖7)從1970年前後美國宰制與中國、日本之間的關係看來，大阪萬博會的建築「太陽之塔」確實傳遞了美國與日本的親密關係。

那麼，反觀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中華民國館傳遞了何種信息？

中華民國館開幕後，長期在釣魚台海域捕魚的台灣漁民遭到日本軍艦驅離，漁民回台跟政府申訴，引起台灣媒體注意與報導，《中國時報》特派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報導，引起日本政府抗議，這些報導同時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的議論，北美留學生開始醞釀保釣運動。

⁶ 本段文字節錄自1970年5月19日《中央日報》副刊。

⁷ 本句話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中國日之後，1970年10月20日，副總統嚴家淦赴聯合國25周年紀念大會發表演說，為了中華民國的唯一中國代表權，他說：「維持和平的行動主要還是一種撐住局面的行動，它的功用在於爭取時間，謀求政治解決。這一種行動只有在取得當事者同意下才能實施，這種『同意』倘在緊急關頭突然撤銷，其後果不堪設想。這種維持和平的行動，建立在一個相當脆弱的基礎上。」⁸同年10月24日，日本駐華大使館以「節略」陳述尖閣諸島係所謂南西諸島之一部，為日本國之領土。此日，副總統嚴家淦抵華盛頓白宮，與尼克森會談中美關係、中國大陸問題以及釣魚台爭議。這位剛上任美國第37任的新總統，1955年曾到東海大學為貝聿銘設計的路思義教堂剪綵，也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在人民抗議包圍下就職的總統。

1970年12月16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台灣與香港留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隔年1月29日在舊金山、1月30日在華府、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檀香山等地，台灣和香港留學生集結進行保釣遊行，主要到日本駐美機構抗議。4月10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由於台灣留學生擔心台灣政府顧忌聯合國席位不保而放棄釣魚台，以及美國政府明顯偏袒日本，因此這次大遊行目標擴及到美國國務院及中華民國大使館雙橡園陳情。4月13日台大人類系與哲學系師生在張肇康設計的農經館牆上，垂掛兩幅白布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二天後，台大、政大、師大僑生一千餘人舉布條標語遊行到美國大使館，抗議美國擅自決定將台灣的釣魚台交給日本。

同年3月2日嚴家淦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中國大陸問題措辭失當，提出嚴正聲明。4月14日尼克森宣布改善與中共關係的五項新步驟，包括解禁美國公民赴中國大陸。面對尼克森政府操作釣魚台行政權歸屬，扶植日本、分化中國的兩手作為，5月1日密西根大學留學生召開五四運動大會，開始討論「中國的聯合國席次問題」，5月23日保釣師生集資九千九百六十美元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三千位華人、學者聯名發表〈留美學界致尼森總統既國會議員公開信〉，要求美國政府「否認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視為美國託管下琉球南西群島的一部分或任何主張，承認中國擁有釣魚台，譴責日本與琉球侵犯中國領土。」⁹

⁸ 節錄自國史館編（2001）《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國代表權》。422-423頁。

⁹ 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6月14日美國52所大學研究中國問題學者110人則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我們以研究中國問題學人的身分，認為必須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政府，給予它在聯合國一切組織中的合法席位。我們反對美國做任何努力，在事前未獲兩方請求者之協議，將雙重代表權的公式強加諸中國的席位。如無此種協議時，問題僅為何方代表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北京政府。至於將來台灣與華府跟北京的關係，乃是複雜的爭執問題，須有時間從事協商與調解。為此時，應給予北京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¹⁰緊接著，6月17日美日簽訂「沖繩回歸協定」，宣告將於1972年5月將釣魚台行政權及琉球交還日本。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家安全助理季辛吉已到過北京訪問，並宣布他將赴北京訪問。這個舉動引起美東地區中國留學生約四百人，於8月20-22日，聚集在美東布朗大學舉行「美東國是會議」，會中轉向認為中共可能保得住釣魚台，而對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個結論：「如今已鬥走資路線的當權派，改革了教育與文藝，更希望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總之，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¹¹9月3-5日留學生聚集到密西根大學附近舉行安娜堡全美國是會議，「密西根大學的保釣會裡，左右中各派都有。…五月間各地舉辦五四運動紀念會時，大家所談的都是如何塑造一個新五四運動。…籌辦國是大會本來是想繼續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但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情勢急轉直下，許多人一下子向左轉，原先並沒有參加運動的人物突然紛紛冒了出來，這時就有人對國事大會的方向提出意見。…國是會議開完，我就知道保釣運動非分裂不可。」¹²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會員大會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席抗議。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率團赴北京訪問並簽訂「上海公報」。5月15日美國正式將琉球群島和釣魚台列嶼之「行政權」交給日本。9月19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

¹⁰ 節錄自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¹¹ 參考林國炯等編（2001）《春雷聲聲》。

¹² 參考張系國（1979）《昨日之怒》。

1974年5月中華民國館出席美國史波肯世博會「慶祝明日的清新環境」，中國館的外牆雕塑由製作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門口「有鳳來儀」雕塑的楊英風設計，展覽開幕以影片「中華民國海島省份台灣的成功故事」展示「台灣」。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0年大阪萬博會舊址，興建「中華人民共和國館」展示「中國」。隔年的日本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海－充滿希望的未來」排除中華民國。1978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自此中國館的全名不再是中華民國館。

2011年，《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回顧1970年代時說，「失望與徬徨也不是全然負面的。…至少，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為什麼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麼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麼國民政府不願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¹³

終究，從現實的矛盾深化到重新認識歷史脈絡，是實踐反省的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小結－決裂的切入點

如何看待中華民國館之死？

「死」的實質意義是斷裂，是將永恆切斷為過去和現在，也會形成連續的迴響，甚至可以是斷尾求生。「死」可以創造話語的空間，就像賀龍·巴特（Roland Barthes）在《中性》（*Le Neture*）一書說：「只有死亡才有創造性。」死亡成了持續迴響的意識形態，滲入人的思想，支配人的實踐。而切入「死」又可以重新認識「生」，就像在《莊子·至樂》中，莊子為妻喪而鼓盆說：「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如此說來，我們要認識生死之間的變化，就得要看見萬物行勢，而非緊盯著形式不放。

本文以中華民國館作為決裂的切入點，是將具象徵意義的建築放回到當時的動盪局勢中，使建築透明（transparency），從中看見國家、社會、人、事、物的矛盾與流變，將建築的現代性與戰後台灣的社會脈絡連結。這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後誕生的現代國家關涉經濟利益時，原本是政治的語言，卻是用建築表現。

¹³ 節錄自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會編（2016）《為了將來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

如何看待 1960-1970 年代的中華民國館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形式的展演，而是建築上載了信息，正轉變為一種「現代媒體」(modern media)，這是「第三元空間」，既是建築師之間爭奪建築的話語權，也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老大輸誠的「親密話語」(darling tone)，更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內滲入公共空間的構成，介入私人生活與自身脈絡的聯繫。



無論是宮殿式或者庭園式，中華民國館都生產了象徵意義，也都是舊有的形式精神引導集體意識下的產物，並沒有建築師仰賴的「現代中國建築」論述(discourse)。關鍵是這種意象生產對社會起了作用，要害在於傳達特定對象所渴望的中國意象，以形塑特定的文化時，未處理特定的社會脈絡，包括外來的經濟壓迫與內化的政治連結，反而強化了生產的社會組織內在的矛盾與現實環境之間衝突。

這種在機械複製時代(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下的建築，其中一種構面是集體意識下的權力意象與再生產集體意象。曾經，這種生產的變化動力如同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 1935 年發表的〈巴黎，十九世紀之都〉(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說：「回應『生產』的新意義之形成，起初仍是由舊的形式引導，皆是集體意識下的意象，其間的『新』滲透著『舊』。這些意象是渴望的意象，為了索求克服與理想化不成熟的社會產物與不完整的生產之社會組織。」¹⁴所謂的「新」或稱之「現代」的生產源自索求克服舊有的不成熟與不完整，從中可見建構主體性的線索。

然而，集體意象的再生產只能淪為渴望的意象，歸咎於集體意識的偏見與生產的社會組織不完整，正如《涅槃經》(32 卷)：「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菴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木白。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這樣的視盲既是將局部詮釋為整體的結果，也是局部的想像與生活經驗的連結，而對象的真實性往往建立於後者。如此看待中華民國館之死，無論

¹⁴ 原文為 Corresponding to the form of the new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in the beginning is still ruled by the form of the old (Marx), are images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which the new is permeated with the old. These images are wish images; in them the collective seeks both to overcome and to transfigure the immaturity of the social product and the inadequac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從國民政府請貝聿銘來設計中華民國館，當作向美國輸誠的具體行動來看，眾人見識到了美國的背叛比索求美國的忠誠更真實。或者，從台灣的建築師摸索中華民國館的現代建築意義來看，覺察到公共空間的規訓權力比複製建築的幾何形式更真實。



據此，現代建築不會是靜靜的展示一種形式上的不同，而「現代建築反映時代精神」這句話也就不會是「蒸餾、蒸餾、再蒸餾出來的純粹形式」，反而是批判現實社會中的空間權力與規訓的反話了。如果我們仍聚焦在學習評比建築形體的比例與幾何關係，其作用不會大於塑造外部形象的視覺效果。但是當我們開始覺察到分裂的形象迴響特定的意義，又未能闡明其中變化的社會脈絡與政治意向，驚恐其大規模擴散為各向斷裂，進一步造成難以自我辨識時，就得重建反身性，並重建歷史的視域，重新檢視「現代—建築—歷史」的力量與流動，才有機會「超克」現代性的作用。

二、顯影「現代」



攝影皆是把現實禁錮起來，使現實被理解為難以駕馭、不可獲得、維持靜滯的一種方式。或者，強化現實感為退縮的、迴響的、消融的、飄渺的。吾人不能擁有現實，但可以擁有影像，同時被影像擁有。¹⁵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77) <影像世界>
(“The Image World”), 《論攝影》(On Photography)。

看一張照片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中日開戰。該年臘冬，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已逾十年的嚴家淦，剛為雙親服完喪，決定隔年春天離開上海南下福建，投入政府的戰時建設工作，臨行前，他與家人一起回到蘇州木瀆鎮老家祭祖。他拍下沿途經過的城市景象，其中一張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兩旁店鋪簷下，婦人圍著小販的竹籠子，挑著所剩不多的食蔬，街上滿滿的行人，個個帶著帽、裹著棉襖，雙手緊緊窩在袖子裡，面色凝重，低頭行走，無人留意嚴家淦的攝影機。^(圖8)另一張在一條窄巷口的中藥鋪，巷子剛好穿過店鋪，簷下一位光頭小學徒正顧著煎藥的爐火，轉頭木然看著攝影機，爐子旁還坐著二位先生，一老一少，同樣轉頭看著嚴家淦，店鋪裡的掌櫃與夥計站直身子望著巷子口，沒理會眼前赤腳的男子。戰火雖然還沒擴散到此地，這條碎石路面的窄巷子，已經顯得冷冷清清。^(圖9)而這樣街頭巷尾市井小民的生活，自此成了嚴家淦離家逾半世紀，一直帶著的城市意象 (images)。

這是一個全面崩毀的黑暗時代，也是個從頭來過的黃金時代，所有離鄉背井的人，不分老幼、男女、貧富，只能設法記住家鄉最後一面，到另一處地方落腳，重新造家。這樣的「現代」衝擊著生命，沒有人能夠回頭，必須一直走，生命才能留下來。

¹⁵ 原文為 Photographs are a way of imprisoning reality, understood as recalcitrant, inaccessible, of making it stand still. Or they enlarge a reality that is felt to be shrunk, hollowed out, perishable, remote. One can't possess reality, one can possess (and be possessed by) images.

給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意象

1963 年 12 月美國新聞處製作了一本相簿「高雄工業之旅」(Kaohsiung Industry Tour) 送給當時剛宣誓就任的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內容是 1963 年 5 月 30 日到 6 月 1 日間美新處攝影師隨行紀錄的照片。(圖 10)



相簿的第一張黑白照片，是財政部長嚴家淦陪同一群美國人走出歡迎「美國國際開發署」(Department of Stat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簡稱 USAID) 代表團的廠區入口，大門的柱頭頂著縮小版的中國宮殿式屋頂，後方則是水泥造的、箱型的廠房建築，一排一排同大小的方窗子，有的緊閉，有的半開，窗前的樹剛種植，還沒長高到可提供樹蔭，高雄的酷暑可從美國人穿短袖襯衫或棉布 T 恤，台灣人穿麻紗織的上衣、戴草帽看出來。(圖 11)

下一張照片，一行人走過廠區的水泥道路，路面二側是無蓋的水溝，以及道路兩旁一排排約二層樓高、斜屋頂的廠房，周遭環境草木不生。(圖 12) 這行人連續參觀了幾個不同的廠房，先是參觀製作木夾板的廠房，室內是水泥地面，陽光從屋頂局部的透光玻璃滲入，照亮了鐵屋架、堆置一旁的木夾板與厚重的機具，美國人聚在一起討論機器，台灣人則滔滔不絕地圍著財政部長嚴家淦解釋機器的功能。(圖 13) 同樣在夾板工廠的生產區，一張從較高的位置拍攝壓鋼夾板的輸送帶景象，陽光從廠房側面的窗戶照進來，每個轉角處皆站了 2-3 位穿著制服、戴帽子的解說人員，攝影師同時記錄下參觀團順著生產線移動、東看西看的樣子。(圖 14)

最後，在廠區會議室的角落，木板架起了一張廠區平面圖，圖名是「工廠平面圖及擴充計畫」(PLANT LAYOUT OF PRESENT EQUIPMENTS AND FUTURE EXPANSION PLAN)，負責建廠的美國公司代表，一位高大的美國人，背對鏡頭指著這張圖，向身形相對嬌小的財政部長嚴家淦說明擴廠計畫與經費需求，他抿著嘴、右手摳著下巴若有所思，在他身後的窗框上被刻意掛上一面台灣的蘭花，桌上的茶杯旁同樣放了一盆。(圖 15)

只不過，在這些影像中的工廠顯得特別乾淨、明亮到幾乎看不見工人。

相簿裡另有一張特別的照片，記錄了在暗黑的製磚窯廠裡，這群白領的工廠管理者圍在一起談話，內容無從考據。但在畫面中，這群人的背後，一位裸著上半身、皮膚黝黑、或起身、或蹲下的工人，他瞪著攝影鏡頭彷彿是被攝影機逮

到了，但現場無人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圖 16) 不夠白皙的工人意外起身，連結上影像複製向下望的視角，讓這張被選入相簿的照片，剛好表現了此時的美援工廠裡，被創造出來卻避而不談的勞工階級。

美援會（United States Aid Mission to China）指導委員（Director）霍華德·帕森斯（Howard L. Parsons）在這本相簿的首頁寫了贈言：「身為今夏的高雄工廠導覽團的一員，我認為你會想要這些照片。或許，他們能持續提醒參觀對教育與公共關係的助益，我認為你也會同意這樣的觀點。」¹⁶言下之意，美國國際發展署指導戰後台灣複製工業化社會，基本上是運用影像製造健康乾淨的工廠形象，以取得工廠擴張的環境與經援，並持續透過教育供給工廠生產所需的高素質勞力。

國際現實

1963 年 12 月 16 日嚴家淦宣誓就任行政院長，隔年 2 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來台與嚴家淦會談，緊接著 4 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與國務卿魯斯克相繼訪台，形式上與嚴家淦會面，未談 5 月 30 日美國政府宣布隔年 5 月停止對台的美援一事。該年底，中日合作策進會日方委員代表團佐藤喜一郎及前首相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等二十餘人來台與嚴家淦會談。¹⁷這一年，美國與日本親美派的高層官員密集的相繼來台，隱約透露美國中止直接對台美援，迫使台灣政府向日本貸款，轉移了戰後台灣的國家債權給日本，美國得以隔海操控對日本、台灣的政治經濟干預。此刻的國際現實，竟是戰後的台灣又不得不再次淪為日本的經濟殖民地，同時還是美國的。

1965 年 2 月帕森斯結束在台任務，離開台北前宣告「自由中國的經濟已經『起飛』（take off）」¹⁸，但美國指導戰後台灣複製工業化社會的影響從未結束。戰後台灣的處境正如 1967 年 5 月間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對副總統兼行政院長的嚴

¹⁶ 原文為 As a member of the group which toured the Kaohsiung factories earlier this summer,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have these pictures. Perhaps they will serve as a permanent reminder of a visit which, I think you will agree, was most profitable both from the point of a view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¹⁷ 參考 1994 年嚴前總統家淦先生哀思錄編纂小組編輯的《嚴前總統家淦先生哀思錄》年表。

¹⁸ 原文為

Free China's economy has "taken off" and will soar to satisfying heights, bringing increased satisfaction and a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家淦調侃的「一處中華民國慘澹經營的地方」¹⁹，也是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對嚴家淦輕蔑形容的「一處美國傾倒剩餘物的垃圾箱」。²⁰



技術官僚

戰爭讓人民的命運隨著國家動盪而行，許多學了西方科學的青年，後來進入國家機構當了技術官僚。其中，像嚴家淦這樣的技術官僚並不多，他先是 1945 年代表國府來台接收日產，先後擔任台灣省府財政廳長、省主席兼保安總司令、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長、副總統，最後在 1975 年宣誓繼任總統，並依照憲法於 1978 年期滿卸任。終其一生，他參與了整個國家體制的變化，卻被今日的國家淡忘。

當時所謂的技術官僚，往往是學工程與科學出身的工程師，好的工程師往往能找出問題來解決，在國家體制下，有些問題的影響規模大，得從制度面的建立或修改下手，這就是技術官僚在國家機構裡的預設功能，這些人必須像個國家機器的工程師一樣，找出制度面的問題，然後設計制度工具來解決，好的技術官僚往往能設計好的制度工具來解決問題，這便是理想化的國家機器。不過，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

戰後，嚴家淦二度主掌財政部，分別是 1950-1954 年與 1958-1963 年，同時負責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交涉事務，直到 1963 年底接任行政院長。1958 年嚴家淦由台灣省主席轉任財政部長，在陽明山莊報告〈台灣的經濟建設〉：「日據時代台灣的經濟，完全是日本的附庸，對外貿易要透過日本來經營。光復以後，台灣的經濟從日本整體中分解出來，最初轉為我國大陸經濟的一環。…後來，大陸淪陷，台灣省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為了自身的要求，非走獨立的路線不可，…更是非有獨立經濟不可。」²¹這一年，美援會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以回應美國一再威脅對台終止美援之說。

1960 年，財政部長嚴家淦在立法院推動成立「獎勵投資條例」，作為應對美國壓迫台灣政府做出改善工業環境的具體方案。嚴家淦在九一記者節演講中聲明：「獎勵投資條例的主要目的，在改善投資環境，以疏導國內儲蓄，吸引國外

¹⁹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402 頁。

²⁰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421 頁。

²¹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39-40 頁。

資金，供經濟建設之用，使加速經濟發展的目標得以順利達成。」²²這項條例的上位計劃是加速經濟發展計劃及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其實施細則是免稅、退稅、開放投資設廠與取得土地。於是，農田、山坡變成建築工地，加速農村都市化、都市工業化。



1964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首次出現二位數 12.3%，對外貿易首度出現出超，平均國民所得突破兩百美元，國家的財政赤字首度消失，此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被美國奧馬哈世界前鋒報形容為「平衡預算的能手」。西方學者歸納 1965-1974 年台灣的經濟數據後形容這是台灣的「黃金十年」，因為這段時間經濟平均成長率 10%，平均國民所得由 203 美元擴大四倍到 852 美元。曾任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的李國鼎說 1960 年代的台灣是「國民儲蓄取代了美援，成為工商發展所需資本來源。」²³

1965 年 5 月美國政府宣告終止對台美援後，隔年初，美國副總統韓瑞福訪台。面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局勢，行政院院長嚴家淦在經合會（前身為美援會）經濟部聯合動員月會上一再強調：「就老百姓的觀點看，不問其原因為何，生活好，就是政府好，生活不好，就是政府不好。」²⁴

小人物顯影台灣魂魄

1963 年，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影製片公司新任的總經理龔弘用李行的電影《街頭巷尾》放送國家的健康寫實映像。導演李行說：「龔弘覺得《街頭巷尾》描寫小人物、小市民為生活打拼，大家住在違章建築裡，彼此守望相助，彼此關切。還反映出一個社會現象，本省、外省人雜居。」而龔弘說：「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是苦難的一代，一定要有光明健康的思想，把那種低沉的心情，轉化成有建設性的，才能夠走出一條坦蕩的路。」²⁵

依照當時的總統蔣中正指示新聞局長沈劍虹兼任中影董事長，任命新聞局副局長龔弘當中影製片公司總經理，是因為「電影是新聞宣傳的一部分」²⁶。這

²²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101 頁。

²³ 本段文字參考 1988 年 02 月份《天下雜誌》。

²⁴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475 頁。

²⁵ 節錄自張靚蓓（2012）《龔弘：中影十年暨圖文資料彙編》第 73 頁。

²⁶ 節錄自張靚蓓（2012）《龔弘：中影十年暨圖文資料彙編》第 46 頁。

時候國家要大規模用工人拚經濟，須要推動健康寫實路線的電影來「育樂」工人。於是，當電影製片技術移植義大利寫實主義電影表現社會意象的手法時，配合國家發展路線，得在原本顯現社會暗黑面的布局上，打上蘋果光，使違章建築與小人物都看起來光明、健康。



不過，當蘋果與健康的形象連結台灣的工人生活，構成一部闔家觀賞的電影放送，結果是畫面的背景越明亮，例如：白刷刷的美國海軍醫院，劇情越荒謬，例如：雙腿不如一籃蘋果。最後，眾人真實感受到具種族意味的階級差異，例如台灣比不上美國。就像萬仁在 1983 年拍的電影《蘋果的滋味》：

「阿發去上班的路上，不幸被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台軍官格雷上校駕駛的汽車撞斷了雙腿，住進天母的美國海軍醫院。上校賠償阿發新台幣五萬元現金，並打算帶阿發的啞女兒到美國留學。前來探望阿發的老婆、孩子及朋友，見到他能待在豪華的醫院，反而羨慕不已。當阿發拿上校送來的美國蘋果給老婆和孩子，一家人彷彿品嚐到天堂的果實…」²⁷

導演萬仁回憶 1987 年解嚴前後，當時的青年人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叛逆與壓抑，就像他在 1985 年的《超級市民》裡，拍小人物在台北康樂里的違建裡過日子（現在的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在西門町討生活、跑警察，以及在剛蓋好的大安國宅屋頂賭博、追逐、打架。他說，當時一些被稱為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導演，包括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等人，就是一股腦趕著捕捉台灣即將遺忘的悲情城市的記憶。²⁸彷彿透過電影讓小人物顯影，就能保有台灣的魂魄，為了明早打拼的氣力。

體制崩壞

1980 年 1 月 19 日，《中國時報》舉辦「如何檢肅貪污」座談，1 月 21 日滿版訴求政府盡速建立專責機構從制度、律令、人事肅貪。2 月，台北市長李登輝透過媒體放消息，說他將提議中央注意建築商人興建並出售房屋所得的暴利，並研擬適當課徵所得稅的辦法。他說，對市民課徵所得稅或所謂的暴利稅等稅

²⁷ 節錄自維基百科電影《蘋果的滋味》簡介。<http://ppt.cc/T5wgY>

²⁸ 參考萬仁在 2015 年寶藏巖的台北蚊子電影院，影後座談會中對 1980 年代新浪潮電影的評論。

捐，都是屬於財政機關主管的事。²⁹同一時間，台北市政府大張旗鼓舉辦新市政中心規劃競圖，台北市長李登輝對外發新聞稿表示，蔣總統特別關心台北市政中心新建工程，他為求謹慎而宣布舉辦第二階段徵圖，並將邀請國外名建築師來華參與指導，擔任顧問，期使成為中華民國的象徵。



1980年2月27日從台北起飛的華航707式客機在馬尼拉國際機場爆炸。

1980年3月4日的《中央日報》第三版，以航空安全與建築高度的連結關係，並列了華航空難與松山機場建築高度放寬的新聞在同一版面。政府對華航飛機失事的檢討模式，是簡化失事原因為機件故障與人為操作疏失，並運用了大眾媒體新聞，塑造了一種空服員的英雄形象，壓制了對航空業勞工保障的批判空間，也讓航空業經營高層快速將空難的責任成本，移轉給保險公司的理賠程序，掩飾了航空業的勞動結構問題。

此時的內政部長邱創煥面對飛航安全的作為，反而是找來建築界的專家學者，如漢寶德、吳讓治、王濟昌、沈祖海等，共議放寬機場周邊航高限制範圍、建築限建高度與建蔽率，並強推實施容積率。1980年3月4日的《中央日報》第三版摘錄會議中「不具名」的綜合意見：

- 為維護國民居住環境，增進身心健康，建蔽率不應放寬。
- 台北市未來的都市發展，必然將朝向高空發展，政府主管單位，應依據這一個趨勢，及早做妥適的規劃。
- 應會同飛航安全專家修正「飛航安全及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與建築限制辦法」，放寬松山機場四周約半徑四公里範圍內建築物不得超過四十五公尺的限制，以使台北市東區的建築物，可依據所面臨道路的寬度，做更高的設計，以增加都市土地的利用價值。
- 都市建築所附建的防空避難設備，可設計為平時的停車場之用，以增加其利用性。
- 建物附件防空避難設備之規定，應依據所在都市之規模，做不同的彈性調整，不應強求其一致性。

²⁹ 此時的財政部長為張繼正，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學博士，其父親為總統府資政暨蔣中正時期總統府祕書長張群。

--為增加都市建物的美觀與通風採光，容積率的實施應加速推動。

這種同時操作市民恐懼與慾望的都市開發模式，並不是歷史上的最後一次，不變的口號是解除建築高度限制與放寬容積率，一再醜陋地曝露台灣的都市計劃是以分配土地開發利益為核心，追求建築高度的瘋癲。這些看似不約而同的新聞稿，是從地方到中央一路迎合總統蔣經國對「均富」的想像，就是建商蓋高樓、官僚抽稅油，大家樂。

1981 年底，已卸任的前總統嚴家淦在中央研究院「台灣經濟發展會議」中以英文講述〈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條件〉，結語時特別提醒當時的政府：「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固然值得我們做參考，開發中國家發展的經驗也有許多令人警惕之處。我願在此提出三點：（一）許多開發中國家過分強調經濟的快速成長，以致損及經濟穩定；而經濟之不穩定，又將以所得分配之不均及經濟進一步成長之受阻為代價。（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政府過於熱衷於工業的不斷成長，以致忽略農業的繼續發展；而農工業發展的失衡，又會導致社會政治及經濟問題之滋生。（三）有不少開發中國家的政府過於耽好誇耀性的措施，以致損及一般的發展。一國的一般性發展若不能相互配合，則誇耀性的措施只會造成不合理的資源分配和浪費而已。」³⁰不久，李登輝卸任台北市長，轉任台灣省省主席，直到 1984 年被蔣經國提名任副總統。

1982 年 4 月 14 日開計程車討生活的獨居榮民李師科持槍搶劫台灣土地銀行台北古亭分行，震撼社會。他遭逮捕後於 5 月 21 日判死刑，四天後槍決。他曾對圍觀的記者說，當看到國家銀行將千千萬萬的鈔票放款給特權成為呆帳，自己犧牲青春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然這樣對待他，所以決定搶劫銀行，這是小人物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的行動。

1985 年初，新聞媒體揭露官商勾結第十信用合作社違法超貸的弊案。十信曾經是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自傲的 1958 年三一儲蓄運動中，向全國人民集資發展工業的金庫，長期累積下來的存戶總存款金額達 170 億元。27 年後，十信弊案受害最深的還是人民，士農工商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全面受到打擊。隨著檢調深入調查弊案，國民黨內高層涉及十信弊案的人紛紛去職，包括此時的中央黨部祕書長蔣彥士。1986 年 4 月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圈定以嚴家淦為首召集成立十二人小組，排除黨內反對勢力，規劃並貫徹執行國民黨的政治改革，其中具體議題包

³⁰ 參考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137-138 頁。

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赴大陸探親。9月，嚴家淦在主持會議時中風送醫，直到1993年底過世。1988年初，總統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年續任總統的李登輝重新任命蔣彥士為總統府秘書長。於今來看，十信弊案是投機金牛與官僚政治結合長年橫行的典型，更殘酷的現實，是體制內的改革無法改變體制本身積累的弊端。



1988年5月20日，農民從南部開著貨車載滿收成的青菜北上，為了克服國家長期以農養工造成自己的生活困難，希望國家改善農業制度保障自己的生活，集體走上台北街頭向國家要求自己的生存權利。同時，對中華民國而言，這一天是國家體制下的總統日。農民挑在這一天發動農運，正是起因於恐慌與不滿自己的國家迫於美國壓力，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的進口數量和種類，而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卻正好是美援計畫下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農經學博士。抗爭的農民集結在火車站、立法院前與持盾牌、警棍的警察起衝突，一時間，農民收成帶來的青菜、雞蛋砸了滿街，警民對峙，這是1987年台灣解嚴後第一場激烈的集體衝突。在此之前，農民集體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是1925年在彰化二林庄，蔗農反抗林本源製糖會社挾日本警力低價搶收甘蔗。

1988年11月1日《人間雜誌》三周年特輯〈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踪〉中，曾參與北美保釣運動後回台的總編輯陳映真以戰後台灣的勞工生活影像作為正文，為戰後台灣的「工殤」寫下註解：「60年代台灣的工業飛躍性發展，創造大量的工人階級；但他們的政治、社會權利，卻未因而受到保障；工業汙染的發生，種下日後嚴重的公害。」

小結—顯影現代之殤

追溯戰後台灣的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必須從認識「殤」開始。

「殤」的本意是未成熟而亡，如《逸周書·諡法解》的「短折不成曰殤」，這種滅亡的重點不是生命跡象終止，關鍵在於未成熟而亡是一種失敗，這是集體意識下的恥辱，必須切斷個體的感受，立即進入下一步的發展。這樣的「殤」在英文翻譯中更接近 shame 的意思，台大外語所張小虹教授在2016年元月出版的《時尚現代性》中，也曾處理了「shame 代性—羨代性—線代性」的同音譯字，她說：「shame 不僅只是現代性經驗所產生的一種外加情感模式，而是內在於現代性的表述本身，現代性就是 shame 代性，而殖民現代性乃是雙重的 shame 代

性。」她並以現代性的論述同時生產「以新為美/以舊為 shame」的情感結構，點出集體共同感覺的恥辱作用。³¹

本文呈現的轉型脈絡有幾段層疊的過程，首先是小販、自營店鋪與學徒，其次是工廠、工人與管理者，接著是資本家、企業與壟斷，最後是勞工組織與社會抗爭。如此看待戰後台灣的「工傷」、「工業之殤」、「現代之殤」，就不止是工人身體的傷害、工廠造成環境的污染，還是工業都市轉型的失敗，造成資源分配失衡、經濟與社會轉型失敗、體制崩毀。

另外，戰後台灣工業化的核心概念「發展」的英文是 **developing**，與攝影學的措辭「顯影」（**developing**）是同形字，二者的現代作用特質都是計畫性、科學化、植入的程序操作結果。「發展」是建構明日意象為真的現代化過程，而「顯影」則是重構過去意象為真的現代化過程，在建構明日意象與重構過去意象同時為真的計畫下，現代是重層的影像且不屬於當下，而是真空了此時此刻的人與環境的關係，顯影與發展交疊離析出了戰後台灣的都市發展之虛構性，也就是都市幻影。

這裡強化的視域（**vision**），在我們的語言習慣中最接近「如何看」。當提出這樣的詢問，我們往往想知道，除了對方所見所聞或精心設計的「形」，還想知道對方從中理解或企圖傳達的「意」，更積極的人會進一步學習如何看的寬廣、看的深入、最後還能看見「行勢」，或者退一步思索人人看事物的差異，探問「相由心生」的脈絡。因此，將「視域」連結「如何看」的意圖，不單純是指科學度量人眼視覺的範圍，也不侷限以美學計較影像的構成，動機往往富含了社會性。當我們認真地探問特定對象的視域，勢必是探查變動中的關鍵思想，尤其是社會意識再現於空間的狀態，以及空間再現的階級社會。正因為戰後國家的技術官僚體制介入社會轉型與都市化過程，像嚴家淦這樣的技術官僚雖非是歷史的主人，但其視域能幫助我們今日追溯戰後台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變遷脈絡。

戰後 1950—60 年代，因為戰爭造成的大量人口遷徙、通貨膨脹、國際政治關係的動盪，在威權體制下，台灣處於「國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象徵建構」的過程，新的都市計劃奠基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基礎設施之上，依賴聯合國與美援的技術指導，主要以軍事防禦為由，進行藍圖式的都市規劃，除了以興建新村、眷村

³¹ 節錄自張小虹（2016）《時尚現代性》，第 85-87 頁。

臨時性安置大量的遷徙人口，並建構中央與地方之間在空間上的層級區劃，以紀念性的建築設計表現國族國家的象徵。



1960—70 年代，台灣的發展被設定為「發展型國家導向」，都市計劃成為促進工業發展的規劃工具，運輸交通建設、加工出口區規劃、產業轉型的區域規劃等等，並以福利國家社會作為都市空間結構雛型，進行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與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規劃等等。1970 年代末，資本主義出現危機，由於福利國家社會的經濟結構失衡，造成國際通貨膨脹，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再結構，新自由主義意識主導下的企業主義在國際間興起。

1970—1980 年代，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引領台灣的中小企業之民間活力，制度性的都市計劃逐漸脫離了國家的管理主義，以及脫離了勞動力再生產的集體消費之功能性設計，規劃轉向成為地方發展的制度性工具，引領資本、激勵積累的機制設計，讓台灣的都市化擴張過程加快，也同時蓄藏了更大的都市治理的危機。

1980 年代，隨著威權體制正式宣告結束，國家與社會轉型，但由於快速的都市化過程中，土地開發、房地產炒作造成歷史文化保存、都市居住權等等的問題一一浮現，於是都市社會運動崛起，社區組織意識抬頭，市民要求參與城市的規劃過程，都市計劃的專業領域與地方連結，經由市民社會自主參與空間營造的過程進行規劃。

1990 年代以後，由於全球化政治—經濟佈局與新國際分工市場形成，都會區域、區域創新、區域發展成為策略性（戰略性）的規劃之挑戰，如台大教授夏鑄九於 2013 年誠品講堂演講所言：「對國家而言，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所帶來的最大的規劃難題便是都會治理，這是建築的技術分工與建築師專業分化之後，甚至是規劃師的專業分工之後，最不易連結上的空間發展動態了，這便是國土規劃（territorial planning）的工作，也是指全球化時代區域發展與區域規劃（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planning）的政策規劃領域。」

於今來看戰後到 1980 年代末的戰後台灣的都市化過程，成敗皆與移植的技術官僚體制有關，制度化的「官僚」敗在只看學歷、出身、人脈、政治派系，使得「技術」最後淪為嘴上說說、牆上畫畫而已。失敗的體制忽略了國家介入社會轉型下的都市計畫，政府部門須具適應現實環境、解決實質問題的專業策略能力。然而，長期以「學而優則仕」形成的學者內閣過度依賴理論、案例的形式移植，成了理論的奴才，這樣的行政部門無力對付體制內關說過程中的貪汙、利益

輸送的弊端，當然也無法面對體制外的社會抗爭，更不可能調節市民參與意識成為城市進步的力量，反而操作為民粹政治，今日的藍綠政黨皆然。

故，本文小結提出的「顯影現代之殤」，本意就是「發展性現代的失敗」。



三、轉譯「傳統」



在行將成為工業中國的今天，我以為古老的建築是劣點多於優點的，但優點不是沒有，諸如：一、平面雖然是呆板但極洗鍊，我們若能更靈活地運用它那就好了，麥司·凡德·諾（Mies van der Rohe）所說「Less is more」，從簡單中求變化和趣味，亦是此理。二、內院雖不宜於住宅，我以為可以應用到公共建築上去，使人們在群體中產生合作的向心力，使「社會便是一個大家庭」，「路人便是親人」的理想更易實現。三、色彩的更廣泛應用；中華民族的再生是需要活潑，勇氣，新鮮，數千年的暮氣悶住了我們的潛動力，那麼明亮而快樂的色彩，不再是身份的代表，而是跳動與活力的象徵！

—林空（1955/12）〈中國建築略論〉《今日建築》，第11期。

一甲子過去，學院內外仍迴響「青年建設新社會」的話語。只不過，青年立志成為現代建築師的路上，「傳統」一直是「更現代」的彈簧墊，往往是踩在腳下的比跳起來看到的，顯得隱晦、不體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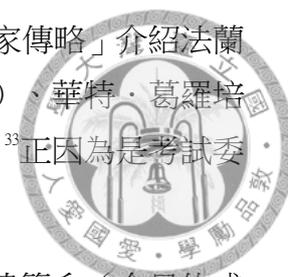
介紹新建築

1952年夏天，剛考進建築系的學生漢寶德形容「這時候的台南工學院，完全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校園與建築。大門外是一條鳳凰木掩映的土路，進得門來，正面是一座簡單的二層仿羅馬式的辦公廳，前面是一座水池，右轉過去，在成列的椰子樹引導下，再左轉，是前後一行五座完全相同的系館，那就是工學院的五個基本單元。而建築系並不在裡面。在機械系的後面，有一座木造的樓房，是建築系一年級臨時上課的地方。」³²

1954年年初，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一本考試委員盧毓駿寫的《現代建築》，第一章「建築之新時代與新精神」談時間、空間與建築的關係。第二章為「現代建築發展史及其先驅者」，第三章為「現代建築與新材料」，第四章

³² 節錄自漢寶德（2012）《築人間》，第67-68頁。

為「建築上新結構與新營造法」，第五章為「現代建築國際各家傳略」介紹法蘭克·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勒·柯比意（Le Corbusier）、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³³正因為是考試委員的著作，被學生視為準備考試最重要的一本書。



1954年3月1日，建築師貝聿銘受邀到台灣省立工學院建築系（今日的成大建築系）與該系師生及曾任教於該系的黃寶瑜進行討論會，照這時候的系方說法，這是為了維持自由祖國建築教育的唯一法統機構，師生向貝聿銘提問有關新建築的一般趨勢、各大師的基本思想、未來中國建築師應走之路以及該系前途。隔日，貝聿銘演講新建築發展的歷史和經過，他說，「新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約肇端於20世紀，影響最大的是 Louis Sullivan 當時在芝加哥組織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發動了兩項運動，一是從建築材料的革新著眼，使鋼筋混凝土在建築上的應用有了一個嶄新的觀念。一則從經濟的觀點謀求建築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同調。遂倡議建築應向空發展，建造高樓。這都是鋼筋混凝土的新應用和社會經濟發展所使然。」³⁴貝聿銘傳達給這時候全台唯一的工學院建築系師生的新建築之誕生與價值觀，只有美國的脈絡。這樣的價值觀與說法後來被化約成了新建築就是鋼筋混凝土的高樓，「建築向空發展，建造高樓」也成了後來的政府官僚與民間投資者最熱衷於現代建築及都市計畫的做法。

另外，這時候的建築系學生華昌宜要求貝聿銘以自己的作品為例，說明如何做設計以及思考，貝聿銘舉自己在哈佛求學的習作為例，當時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正執教哈佛大學歷史和地理條件，極力倡導國際建築，他相信向亞洲非洲等工業落後國家，遲早也得接受歐美的建築。但貝聿銘不認同，他認為「物質的條件決不能主宰一切，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除了物質條件之外，還有歷史和文化等精神條件，因此地域性的限制和民族特質的表現是不能加以抹煞的。」他形容「中國的玉石、金器、象牙等古玩以及書畫，都是小巧精緻，不能陳列在高大無朋的西洋藝術館中，不獨樹一格，相形失色，抑且藝術氣氛全失。」因此他提出中國博物館設計向 Gropius 證明自己的民族文化觀點：「我乃根據民族文化特色作為問題的重心，著手設計我的作品，並沒有戴上一個中國的屋頂，因

³³ 節錄自 1954 年 3 月份《今日建築》。

³⁴ 節錄自 1954 年 3 月份《今日建築》。

為我不以為戴上一頂中國帽子便可以稱為中國建築，而應從空間取理（Space）和周圍環境的氣氛（Environment）上著手才是正確的思考方法。



當代的建築學院通稱這樣的設計習作是 Thesis Design，中文翻譯為「畢業（論文）設計」。

1955 年暑假，建築系二年級學生漢寶德自修當時老師們嘴上的名著《時間、空間與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從中認識建築與文化的深層關係，這讓他覺得可以把高中時的社會文化責任感，與臥病時的文學情懷自建築上找回來，便說：「建築不再是磨鉛筆，不再是耐心地畫水彩潤飾圖，而是反映時代精神、社會需要的空間藝術，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整體文化的呈現。」³⁶

建築工程術語

1954 年 6 月行政院長俞鴻鈞主持院會通過改組台灣省政府，原財政部長嚴家淦轉任省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負責省政府疏遷工程，這一年，省政府建設廳在美援顧問指導下規劃設計新村，此時的省政府建設廳副廳長為劉永懋，而李重耀任省政府建設廳技士並且剛通過建築技師考試。1957 年 5 月，劉自然案判決結果引起群眾怒砸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藍欽向外交部長葉公超揚言索賠及懲罰台灣，省主席嚴家淦以未盡台灣保安之責請辭。6 月，省政府由台北遷至南投中興新村辦公，8 月，行政院核准嚴家淦請辭省主席，改由國防會議秘書長、曾為陸軍中將、參謀總長、空軍總司令的周至柔接任省主席。

1958 年 5 月，省政府建設廳出版一本中、英、日翻譯對照的《建築工程術語集》，建設廳長朱江淮在序文中寫到：「建築，不僅是為了解決人類居住問題，而且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表現，從一個國家的建築物上，可以反映這個民族的文化水準，當今科學發達，學術昌明，對於建築，無論是技術方面，材料方面，或是結構上，形式上，都是日新月異，建築無疑已由技術成為藝術。」³⁷並指定以此為工業學校講解建築學識之參考。

³⁵ 節錄自 1954 年 3 月份《今日建築》。

³⁶ 節錄自漢寶德（2012）《築人間》，第 76-77 頁。

³⁷ 節錄自 1958 年 5 月省政府出版的《建築工程術語集》。



翻譯、編輯這本手冊的人主要是建設廳技士李重耀，他從日殖時期台北開南工業學校建築科畢業，曾是台灣總督府財政局營繕課技術員。這本對照手冊第1-10章為三種語文的建築工程用語對照，還包括都市計畫用語對照表，第11章為工程大樣圖，第12章是日常度量衡折合表，第13章是材料荷重表，最末章是日語母音讀法。其中，與斗栱、屋瓦等依靠工匠師徒傳授之工法用語尚未有英譯字。出版這本書時，全台正推行說國語運動。李重耀在自序中說：「台灣光復後，各方面積極灌輸祖國文化，惟建築一門，迄今因無適當建築術語代替，在建築技術上，均普遍採用日本名稱。為便新學者盡速學習國語名稱，舊學者在日據時代所習建築學上之學識能與現實所習貫通，故每一名詞均採用國語、英語、日語三種文字對照。」³⁸台灣工業學校的建築教育對這時候的政府而言，是持續提供有效率的製圖員及監工的職訓機構，此時的建築工程混雜了中、英、日三系的工法與材料，而沒有台灣的原住民族的營造語言。

這時候，無論是對日殖時期台灣工業學校畢業的技術員或自中國大陸土木工程學校畢業、隨國民政府遷移到台灣的工程師而言，台灣的建築就是水木（土木）工程。李重耀在自序中說：「建築技術者，全憑表面圖案，任由水木匠工，因循舊法承造，其工法亦傳亦秘，鮮有能從技術方面加以改進者，而載諸書籍以傳後世者，更寥若晨星。迨歐風東漸，國人始感建築技術落後，競仿西方；惟歐美一切進步，亦皆於科學之發達，吾人欲與歐美並駕齊驅，務必先習其語文，在建築技術上建築術語尤屬重要。」³⁹建築技術是靠工匠的傳統手藝完成建築形式，要發展建築的科學與文化不得不學習語言，語文翻譯對重建戰後台灣的建築工程系統之實質功效，在於建立形制的同一性以及方便營繕制度化管理。另從省政府建設廳的角度來看，這時候為了解除民間工匠亦傳亦秘的造屋傳統對現代化工程的阻抗，必須將台灣民間工匠習用的日語，連結上美援技術顧問習用的英語，同時轉譯為國語（中文），並開始建立工程標準圖，加速推動戰後建築工程工業化，以利同一化興建集體生活的空間。

戰後，這三種建築工程術語所再現的轉譯關係，一直運行於台灣的營建工程中，而原住民一直是建築工地裡常見的版模工人。這種工程現代化過程建構形制的同一性，即使轉譯過程一再浮現各種傳統的位移狀態，並未處理差異的文化

³⁸ 節錄自 1958 年 5 月省政府出版的《建築工程術語集》。

³⁹ 節錄自 1958 年 5 月省政府出版的《建築工程術語集》。

脈絡，反而是建構「現代」的物質空間化過程中，所有人學習、操演、適應這些去脈絡的傳統規矩。



蓋一座台灣廟

1965 年李重耀競得了木柵指南宮的設計監造權，他自認為是因為他建議蓋一座鋼筋混凝土造的高層建築，以表現天公高高在上，以及設計的尺寸都是依據魯班尺的吉字，不使用公尺。當時台灣的廟，一般都是以單層建築為主，如行天宮。在道教裡，天公是神格最大的神，而且是一個不顯現的神，誰也看不到，所以因地制宜，將這廟高座雲端，把這個意念表達出來。竣工後，因為木柵天候變化多端且多雨，結果凌霄寶殿經常出現飄在雲層上的意境，這跟他原先的想像畫面相當接近。⁴⁰

為了蓋一座現代廟，李重耀借助民間蓋廟匠師的幫忙，從頭學習蓋廟傳統的禁忌與吉祥形式，將材料、尺寸、形式的轉化繪製成藍圖。最後，這座高樓層、現代化的台灣廟讓李重耀成為一位蓋廟的現代建築師。這段蓋廟的過程曾被當時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攝影收藏，但未曾公開放映。在 1990 年 3 月的《雅砌》雜誌專題人物訪談中，李重耀回顧指南宮的設計，他說：「期望廟宇建築未來的發展能夠賦予一些時代的意義。多少要恢復古風、回復唐宋那種純粹性、結構必然性以及適度的裝飾就夠了。」重耀建築師事務所接班人、留美返台的建築師李學忠補充說：「我們從宗教空間的角度去思考廟宇建築，不是從中國建築語彙去塑造。最近的一個案例裡，我們運用了類似密斯（Mies van der Rohe）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德國館（1929）的手法，牆面使用玻璃材料，只在神位的後面以石材處理，內部空間則保留了傳統空間的意念，但減少裝飾物。」在這對父子之間的話語中，蓋廟的內部依舊是一種保存傳統的空間生產，而蓋廟的建築形式已經混血、移植、現代化了。

譯寫一本小說

1965 年 11 月 12 日孫中山百年冥誕日，又一棟以「中山」為名的國家建築動土，這是建築師王大閎宣稱以傳達中國的革命時代精神建立的中國現代建築。同一時間，王大閎以譯寫的方式將王爾德（Oscar Wilde）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敘事從 19 世紀的倫敦換場到 20 世紀的台北市，並改以

⁴⁰ 參考 1990 年 3 月的《雅砌》雜誌專題人物訪談。

《杜連魁》譯寫。隨著工程進行到竣工，1977年《杜連魁》付梓出版。1977年4月，王大閎在出版說明中寫到：「這篇譯文卻不是純粹的翻譯，我認為文學著作如果要保持原文的意旨就必須偏重意譯，而不重字譯。為了使這故事更接近我們，更能打動我們，我不惜採取了三項主要的變動：時間、地點和人物。時間由十九世紀改到現代；地點將英格蘭的首都倫敦改成臺灣第一都市臺北；又把英國的貴族紳士改為臺灣的社會名流。這種改變並沒有使原著的精神受到影響，因為人性不分古今中外。」⁴¹相較於李重耀從《建築工程術語集》到蓋廟，王大閎譯寫一本小說與一棟國家建築同時建構的計畫，對他而言，時間空間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對人有重要意義的精神，傳統即是這種永恆的精神。為了翻譯這樣的傳統，他連結意識與意象、轉譯形式差異以產生空間，終於成為一位現代建築師。

王大閎譯寫《杜連魁》，同時建構一種空間，反身看自己：

「那天晚上，我把車開到**新公園**，然後下車無目的地散步。我沿著**貴陽街**走，不知不覺到了**萬華**。這是我頭一次到**龍山寺**，那裡的**夜市**很熱鬧，房子古老，那才是真正的**台北**。我慢慢地往前走，經過兩旁的路攤，有賣衣服的，有賣飲食的，也有賣藥的。有時我停下來看看攤子上的東西，聽著小販的叫聲，擠在人羣裡，想滲入他們的生活。但總覺得他們和自己之間有一層隔膜。我偶然走進一條小街，經過一家**小歌廳**。門上掛著一串紅綠色的燈泡。有一個穿著花香港衫的男人站在門前吸菸，他見到我就彎身說：『先生，請裡面坐』…我買了一張票。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進去，大概是好奇心吧。」⁴²

汽車的機械速度停下來，跟仁愛路不同，杜連魁從貴陽街走進「真正的台北」，路與街的尺度與速度感出現區分，都市隱隱約約顯現出地理座向。因為這是第一人稱的敘事，我們閱讀者進入了「我」的視界，穿過龍山寺、夜市、路攤小販的叫聲、擁擠的人群，「我」並非一種空間中的獨特的中心，而是人群中的一份子，因為是無目的散步，沒有大宅院的老趙笑臉迎接，而是穿香港衫的男人站在門口吸菸彎身賣票，「想滲入他們的生活」卻與「他們之間存在一層隔膜」，直到「我買了一張票」得以進入真實感。原來，「我」進入這個都市必須消費。空間中的具體交易是消費，換來自己存在於這部份的都市。

⁴¹ 節錄自王大閎（1977）《杜連魁》，第7頁。

⁴² 節錄自王大閎（1977）《杜連魁》，第60頁。

「到圓環小攤子上去吃，換一下環境。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單調極了，只有罪惡還帶有一些色彩。」⁴³

「在台灣寫書，根本沒有讀者。他們除了報紙和參考書以外，什麼書都不看。…他們寧可看一天電視，也不會看一小時書。…有人說過台北滿街是餐館，書店卻很少。這表示我們只注重吃，而不需要精神上的糧食。」⁴⁴

「我到保安街一家古董店去買一件磁器，講價講了半天。現在的人只知道每一件東西的價錢，而不知道任何東西的價值。」⁴⁵

小說原著裡沒有以上兩段，只有第三段，只是地點不在「保安街」上。藉由吳騰陳述消費行為的話語，地方被附與形象，並帶有批判的意思，例如：圓環小攤子--罪惡，台灣的「他們」不看書，台北的「我們」只注重吃而不需要精神上的糧食。此外，「他們」與「我們」之間顯現以台北為台灣主體的群體區分。消費的現實強化了階級化的都市空間，台北是雙面的城市，既是讓貴婦、巨富、高官、教授這種不需要工作的人，總是有時間聚會的台北，同時也是讓一群人日夜工作、只能望梅止渴想像生活的台北。這是原著與譯著在敘事本質上的共同點，譯著置入熟語熟地構成觀眾族群的空間真實感。

吳騰一面注意杜連魁的神情，一面把金色的菸蒂弄熄：「我們這時代所需要的是一種新的享樂主義，你也許就是一個具體的象徵。」⁴⁶

在萬華臨街一座小陋屋裡，一個中年婦女正坐在窄暗的前房看報，牆上掛滿了劇照，慘白的日光燈使她蒼老的臉更顯得憔悴。⁴⁷

他沿著騎樓，無目的地向前走，不知不覺走進一條彎曲窄暗的巷子，巷子兩旁是破舊簡陋的房子，女人三三兩兩地站在門口，向他笑著，叫喚著他。成群的男人在他身邊來回閒蕩，有時停下來和那些女人調笑。他穿過巷子，到了一條熱鬧的街上。街道兩旁擺滿了攤子，有賣藥的、有賣海鮮的，也

⁴³ 節錄自王大閔（1977）《杜連魁》，第 38 頁。

⁴⁴ 節錄自王大閔（1977）《杜連魁》，第 53 頁。

⁴⁵ 節錄自王大閔（1977）《杜連魁》，第 57 頁。

⁴⁶ 節錄自王大閔（1977）《杜連魁》，第 31 頁。

⁴⁷ 節錄自王大閔（1977）《杜連魁》，第 69 頁。

有賣蛇膽酒和蛇肉羹的。那些小販高聲叫喊著在拉生意。杜連魁在人群中慢慢走動，好奇地觀察台北的夜市。⁴⁸

在性別與階級差異的觀看產生與自己的分離，例如吳騰注視杜連魁時，杜連魁成為享樂主義的象徵。另外，觀看的動作協助辨識出形式上與對象上的空間移動，例如女人向著他笑，叫喚著他，成群男人在他身邊來回閒蕩，有時和那些女人調笑，跟著人物的視覺方向察覺空間中的互動。「現代」是新的享樂主義，「建築」是具體的象徵，而所有的人都在這樣的空間裡遊蕩。

杜連魁第一次到美國，便感到拿紐約和巴黎相比，紐約像是一座俗麗的暴發戶的大住宅，而巴黎卻是一棟高貴的書香之家。…美國首都的布置和巴黎不無相像之處，因為華盛頓是法國人計畫的。但杜連魁看不慣那些仿羅馬式或仿希臘式的建築物。美國雖然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吳騰認為粗俗的物質文明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在臺北時，吳騰時常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⁴⁹

故事中的吳騰與杜連魁所引領的都市之間的遊蕩，從歐洲到美國再回到台北。基本上，原著與譯著在這段描述不同城市的氣質是相同的，譯著特別強化了城市之間配對比較，例如倫敦與台北，巴黎與紐約，皆是以文化精緻與粗劣對比，將模仿與複製的形式視為粗俗的文化，又指出建築師複製文化形式的都市計畫，例如：華盛頓是法國人計畫的，所以美國首都的布置和巴黎不無相似之處，而仿羅馬式或仿希臘式的建築物，表現出文明世界以歐洲文化為中心，再次貶抑了美洲本身的文化。譯著借用吳騰的話傳達了當時西方城市之間複製形式、移植文化的問題，並且連結上台北的情境。

換句話說，在王大閎這類出身中國的名門並接受完整西方建築教育的建築師眼中，1960年代的台北現代化是混雜了各種去脈絡的傳統形式，既無法辨識自我，還接收了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美國」。建築師王大閎對這種搞不清

⁴⁸ 節錄自王大閎（1977）《杜連魁》，第99頁。

⁴⁹ 節錄自王大閎（1977）《杜連魁》，第137頁。

楚傳統是什麼的新建築極不耐煩，充分表露在小說人物吳騰的口吻中：「粗俗的物質文明令人生厭。」



一座回歸傳統的博物館

建築師貝聿銘在哈佛念書時期的中國博物館設計理念，後來在 1970 年的大阪萬博會上，以「中國庭園式」表現在中華民國館的設計上，也在 2006 年實踐於蘇州博物館的設計上，這是他最後一個建築設計案，他稱之為「最心愛的小女兒」。整座博物館及園林依循蘇州的傳統風貌，回歸宋《平江圖》（1227）的蘇州古城平面，他認為蘇州園林是詩人、文人、畫家把做園當作畫作詩一樣做出來的，只是現代那樣的人才幾乎沒有了。園中一隅依照宋《營造法則》蓋了一座茅草屋名為「宋畫齋」，他強調宋畫齋是「陋室」，可以調素琴、閱金經，在蘇州園林裡依古法再現一座仿宋民居，是讓大家重新體驗宋代蘇州人的生活方式。⁵⁰這也是貝聿銘設計此案時念茲在茲的「回家」。

2012 年漢寶德在《建築母語－傳統、地域與鄉愁》最末章評論貝聿銘的蘇州博物館：「現代的建築師盡心的傳承過往風貌，並沒有成法可循。要怎麼傳承、傳承些什麼，幾乎完全看建築家本人的主張、觀察的角度而定。觀眾的反應與期待，也是因人而異的。…建築家對傳統的知識與認知的深度是很基本的條件，對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牽連是另一層次的條件，如果沒有這一些，談傳統只是幾句尊敬的話語而已，在建築的實質上是沒有價值的。」⁵¹

城鄉風貌

1977 年 2 月 14 及 15 日《中國時報》第十二版人間副刊連載作家施寄青寫的〈彰化孔廟的修復與還原－記東海大學建築系一次座談會〉，這是在台灣的鄉土文學氛圍下對建築文化的觀察，古蹟愛好者透過漢寶德主持彰化孔廟修復與還原工程的座談會各抒己見。漢寶德拋出來二個問題：還原古建築色彩與修改古建築設計。漢寶德認為應該以當代的科技與使用功能，塗裝色彩及調整空間尺度，台灣傳統建築權威林衡道否定漢寶德的觀點，他認為古建築的色彩、材料、尺度源於傳統技藝與生活脈絡，這與當代人的主觀看法不一樣，修復古建築應該修舊

⁵⁰ 本段文字參考高福民主編，徐寧和倪曉英著（2007）《貝聿銘與蘇州博物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第 73-78 頁。

⁵¹ 節錄自漢寶德（2012）《建築母語－傳統、地域與鄉愁》，第 228 頁。

如舊，不能是仿古，不能隨意更新。民俗學家施翠峯表示縣政府為了商業開發覬覦古建築的土地，省政府為了招待賓客隨便在古建築上塗色，二方都不珍惜歷史。民間藝術的鼓吹者席德進直呼古建築最大的價值就是工匠的愚蠢，工匠不同於學院的想法，企圖別樹一格，才是最可貴的。在場的台灣觀光局顧問美國景觀建築師湯瑪斯·潘（中文名潘德明）說，美國人只挑紀念性高的老房子才裡外全部保留，否則太花錢。他認為建築物的外觀永遠比裡面重要，將老建築內部重新改修，適合做律師事務所、高級辦公室等，在裡面上班的都會認為比較有身分，這個方法最可行。

1977年3月2日《聯合報》標題為「固有建築純樸實用，農村不必學步都市，蔣院長談農村建設頗多改進，外貌保持傳統內部更新設備。」報導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質詢時提出台灣農村建築，今後應走方向，是外型保有原來古樸的風味，內部則有現代化設備。立法委員呂學儀質詢時建議政府積極鼓勵並補助或貸款給農民整建住宅，使他們亦能和其他國民一樣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環境。該篇下方另一則報導標題「農村日趨現代化，傳統建築漸式微，青山綠水四合院，相映成趣，高樓大廈轟田間，觸目刺眼。」記者陳長華引用藝術家席德進的說法：「台灣農村是傳統的中國建築，中國建築維持了幾千年不能一夕間推翻的。」他認為中國人注重倫理觀念，所謂的五代同堂，唯有在傳統建築中能容納，因為它不僅是一種住的格式實際上是在維持社會秩序。現代化公寓逼得老小分開住，老人寂寞，小孩乏人照顧，這都是「現代化」惹的禍。東海大學建築系系主任漢寶德認為蔣院長呼籲保存農村傳統建築，正合時機，應包含二個方面：一是農村傳統建築的保存，二是整個村落風格的保存。他並且建議政府儘速訂農村住宅興建辦法，同時對傳統建築的重建，也能主動提供參考格式。否則經濟快速如飛，數年後，鄉村「都市化」，要談保存傳統建築恐怕來不及了。

接著，1977年4月10-11日漢寶德在《中國時報》第十二版人間副刊連載〈農村建築風格的保存〉。再強調保守農村環境是從農民的生活方式來保存傳統。在《民生主義育樂二篇補述》中的「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不是讓城市看起來像鄉村，鄉村看起來像城市，而是政府必須要有分別市鄉環境的能力，讓城市有足夠的陽光空氣綠地，鄉村有現代的水電設施，而不能像新農村建築設計概要裡的新建築原則，創造一座，使人完全不能了解的形式，細查其內容，不過是城市住宅的一種變體，把汽車房改為農機房而已，外表竟是超西方、超現代的了。

該年東海大學面臨在紐約的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基金會準備撤資，校務決定增收學生以充實學校財務，漢寶德認為師生比對建築系教學成敗影響甚大，決定離開東海，8月轉任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1977年12月5日《中國時報》第十二版大篇幅刊載漢寶德寫〈我們真要保存古蹟嗎？〉點出保存古建築的二個關鍵：經濟和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是家族結構的改變與休閒消費社會的改變，都關係到大量的金錢，前者是家產分配與修復維護支出，後者是政府資源分配與觀光消費投資。政治方面的問題是都市化的虛浮誇張、輕舉妄動，漢寶德認為政府與民間都沒有把古蹟保存看作地方發展的要素之一，不了解地方發展的精神所在，反而視為阻礙發展的石頭，結果「發展成了開馬路、蓋大樓」，這種不重視保存的都市發展下場就是霧峰林家、板橋林家、林安泰古厝與台北城北門的慘狀。

保存

1982年7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嚴家淦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研討會」上致詞，他說：「有傳統乃有創新，有創新乃成傳統」。這一年立法院通過文建會提出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立法。

1986年3月17日《中國時報》以標題「二百年古厝翻新貌，四合院建築存舊制，林安泰古厝重建已完成」報導1977年台北市長林洋港為拓建敦化南路，要將僅一小角坐落在敦化南路計劃拓建的人行道與慢車道上的二百年林家古厝拆遷，引起維護古蹟文物的人士高度關注，認為原地保存並非不可行，於是展開訴願古厝保存運動。但開闢筆直的道路優先於保存古厝，因此市政府堅持發工卸下古厝一磚一瓦，堆置於安和路空地，然而日曬雨淋，雕梁畫棟幾乎淪為朽木敗瓦，市府不堪輿論批評，再將古厝建材移至和平西路高架橋下一處倉庫。直到1984年2月18日，台北市長楊金欉標定濱江公園內一處二百多坪土地，發包重建古厝。1985年11月中旬，林安泰古厝第一期重建工程才完工，古厝庭園仍在規劃中。承接林安泰古厝重建工程規劃設計的建築師是李重耀。

後來，馬以工在文化部網頁的台灣大百科全書上撰寫了這段台北林安泰古厝保存事件，文中記載1977年7月8日下午中央主管古蹟的內政部民政司召開會議，楊雲萍、林衡道教授等與會力爭，司長居伯鈞宣讀憲法的166條「國家應…保護有關歷史文化之古蹟、古物。」承諾將會議結論函送台北市政府參考。惟市府堅持道路須筆直，仍將拆遷古厝至比木柵動物園預定地更遠的南港民俗村。學

者聯名致函市長林洋港，希望就歷史民族大義著眼，爭取一個保存的政策與態度。各大媒體反應冷淡，只有《民族晚報》在 1977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全函。當天下午發生「中壢事件」，古蹟保存者被抹黑為「選舉期間打擊政府威信」。

1986 年 3 月 15 日《中國時報》標題「雕梁畫棟斗拱疊木接榫，傳統建築絕活無以為繼，老師傅柳通信慨嘆施工藝術日漸沒落」，記者翟大龍的報導文中提及中國古式宮殿及廟宇，雖然在現代建築師設計監造下，仍然能呈現古代原貌，但是細膩的古法施工技術、木刻、圖繪已逐漸被捨棄，而以半人工及現代方式作業，不僅難以保持固有文化，而且衰退至為迅速。北部及中部地區中國式宮廷及廟宇施工專家、現年八十歲的老師傅柳通信，北縣金山人，古法師承養母之父，一位漳州府老師傅。他指出目前所帶領的一批年紀較大的工人，都看不懂現代建築師所畫的施工圖，因此他和孫子柳飛松必須把圖改樣，讓這些老工人施工。柳飛松認為，真正的藝術建築，仍然盡量以木造為妥，現在則都是鋼筋水泥外包木頭或用水泥灌製模型，外表上就看得出來。

對這些一生靠手藝謀生的匠師而言，「傳統」是一種由社會經濟決定存廢的行業，中國式宮廷及廟宇建築是這行交出來的貨，而現代建築是另一種靠畫圖的行當，老工匠終究不懂，結果他們只能期待「有朝一日，經濟繁榮，政府行有餘力，才會有這種『復古』建築留存下去。」

小結—傳統空間的共性

如何從戰後台灣的建築過程中理解「傳統」的構成及作用？

本文以「轉譯」為方法，重新切入一些人的思想、自身脈絡及具體作為，一則解除長期以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二元對立，二則假設傳統的構成是一種適應社會變化的作用過程。這段追溯過程中出現的每個人物與傳統之間的知行關係，是在面對矛盾與爭議時，將留存在自身脈絡上的傳統認知痕跡，轉化為一些具體的行動，例如：學習、寫作、演講、蓋房子、訴願運動等，進而形成集體適應社會變化的狀態，然後在經歷社會化、參與社會的過程中，反身認識傳統構成與自身脈絡之間的變化。

文中出現的人物包括：技術官僚、匠師、學院師生、海外華人建築師、外籍技術顧問、古蹟愛好者、藝術家、作家、記者等，在同一時期，身處於變動中的台灣社會與都市化過程中，透過建築形式、工程技術的整合與討論過程，這些人

各抒己見，試圖從語言、文字、圖像、習慣之間尋求同化各種傳統為一個系統，又為了阻止都市化的問題，同樣也從語言、文字、圖像、習慣之間建構多樣傳統的保存價值。

本文避免以特定的文化中心為傳統設框架、立門檻，主要是為了關注傳統形勢在人、事、物之間的流動狀態，這是因為在戰後台灣的土地上，每個人身上有著不盡相同的社會脈絡所留下來的傳統認知，當傳統被視為穩定社會的要素，傳統的空間便會隨著社會變遷浮現，並在文化的回歸、流失、位移、混合等交互作用下重新建構。這裡提出「傳統空間的共性」而不是以「傳統的公共空間」，來理解這種非教條式、融蝕的空間特質，這種以人為本的「共性」包含集體認同的形式、彼此適應磨合的經驗、可持續發展的技藝、可逆的構成脈絡，不可分化來看待。傳統不是一種膨脹過去的遺產組合，更不該是建構空間關係的地域性來排除異己的主張。

隨都市化問題而生的「保存」，這種保存是市民意識的覺醒，化為一種具體的行動，召喚了歷史的幽靈，對都市化造成的衝突與矛盾進行社會抗爭。當代的保存運動所捍衛之物不等同於保守的傳統形式，但是，當二者遭遇同樣的壓迫處境，或二者建構集體認同的社會價值被串連起來時，保存傳統對公眾社會的實質影響就會成為同一回事，這種「保存傳統」往往會演變成為地方包圍中央的政治事件。

第二章

物質化戰後台灣的工業環境



列寧格勒建築一棟大廈共有三十層，當落成那天，有很多人前往參觀，承建的工程師對大眾說：「請大家看看社會主義的建築力量多麼偉大，現在已經建造三十層的大樓，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我們便可以建造七十層大樓。」有個觀眾忽然舉手發問：「聽說美國有個一百二十八層的摩天大樓，工程師先生，請你告訴我那是什麼主義的建築啊？」「那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築」工程師很不屑的回答。

- 1964年4月12日星期日《聯合報》副刊〈垂死的建築〉

一、不毛之地—公共私有化



今日一位網路作家吳毅平寫記憶中的台北：「其實台北有許多體育場館，只是過一陣子就會拆掉，奇怪的是，新的也不會蓋在原來的地方。」

體育，文化活動中心

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在 1960 年 11 月間被百名工兵拆到只剩下一堆廢鐵，散置原地。它是台北最早在 1951 年啟用的標準籃球場，一開始是在露天水泥地上帶動了全民的籃球運動，直到 1958 年「四國五強籃球賽」前才鋪上第一面木地板，並掀起第一波亞洲國家隊競賽籃球的高潮。國軍體育總會在三軍球場拆除後，卻接到上級指示，要在台北舉辦 1963 年第二屆亞洲籃球賽，面臨沒有標準籃球比賽場地的窘境。

另一方面，泰國華僑林國長藉著 1955 年 11 月 19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與 1960 年公布的《獎勵投資條例》到台灣買地置產，正為了誤買到一塊不能蓋房子的不毛之地，懊惱不已。聽聞亞洲籃球賽沒有球場可用，他便透過中間人私下向全國體協理事長楊森將軍表示願意提供這塊土地向銀行抵押貸款，及時興建一座「中華體育文化活動中心」（後來的「中華體育館」），讓亞洲籃球賽順利開打。不過，林國長也趁機表示「難處」：「這是一塊鄰近砲兵射擊練習場、不能蓋房子的不毛之地。」

1961 年 7 月 6 日《中央日報》第四版報導台北市體育館建築經費共籌一千五百萬元，教育部負擔四百五十萬，省政府負擔四百五十萬，台北市政府負擔六百萬，台北市長黃啟瑞數月前已經在敦化路與中正路口舉行破土典禮。同年 9 月 30 日《聯合報》第二版報導，全國體協籌建體育館貸款有著落，楊森將軍昨偕建築師等再度前往現場勘測。報導中指出全國體協理事長楊森已與願意提供擔保品向銀行質押借貸一千萬給興建體育館的某一實業家（即泰國華僑林國長），開始磋商細節問題。這個全國體協計畫興建的體育館基地位在敦化路市立體育場的前方，楊森對這個全國體協的「中華文化體育中心」的體育館興建計畫表示樂觀，並說周百鍊代市長對提供興建土地的使用權已經沒什麼問題，可是正式手續尚須盡速趕辦。



1962年9月21日《聯合報》第二版報導，教育部長黃季陸邀集有關單位商建中華體育館事，報導中指出，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稱：未來的中華體育館將可容納觀眾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因此教育部希望在建館時，全國體協和國軍體育總會都能拋開了本位主義，使過去分立的中央體育館興建計畫和國光體育館興建計畫合而為一。全國體協計畫興建的中央體育館即是中華體育館，但因為籌無興建經費而擱置，而國軍體育總會計畫興建的國光體育館位於敦化路台北棒球場與羽球場之間的公園，內政部不同意修改台北市的都市計畫變更此一公園為籃球館。因此國光體育館興建計畫就停止了。黃季陸部長的構想是由行政院、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各負擔一部分興建經費，並在中華體育館籌建委員會成立後向外界募款，希望國軍體育總會將籌募到的國光體育館經費挹注到中華體育館籌建經費中。

此外，台北市政府和國軍體育總會開會商討國光體育館興建基地問題，據市府代表表示，市政府原則同意國光體育館於原基地的興建計畫，而內政部不同意該計畫使用公園興建籃球館，並指出應興建在敦化路、中正路口。國軍體育總會的國光體育館計畫是以原三軍球場拆除下來的鋼材重新搭建，約一萬人觀眾席，若興建在面積較大的敦化路、中正路口，不能發揮土地的邊際效用。因此，市政府認為在敦化路、中正路口興建體育館，必須擴大增能，最好能與其他單位合作興建。

另外，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對媒體表示，希望國軍所籌建的國光體育館可以在南京東路的十四號公園預定地興建，他說二年前就已經計畫在此興建體育館，只是購園土地發生糾紛，與另一地主周秀蘭官司纏訟不已，於是計畫擱置，昨日上午簽字和解成立，此地產權目前已歸議長張祥傳所有，他將與國軍政治部方面繼續洽商興建體育館事宜。

一時之間蓋體育館成了各家爭相購地、供地之事，在實業家、議長眼中，原本不能蓋房子的不毛之地，讓政府出錢興建體育館，正好是藉機變更都市計畫，將公園地變身建築地的大好機會。

最後，1963年底第二屆亞洲籃球賽在敦化路、中正路口這塊地上新蓋好的房子裡進行。同時，泰國華僑林國長一家人也搬進位於敦化北路旁的中泰賓館^(圖 17-19)，這是由中原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剛畢業的工程師謝文昌繪圖。謝文昌回憶

當年同時替林國長畫工廠的建築施工圖，並且得以獲得出國許可到香港與泰國觀摩工廠，再依樣繪成建築施工圖，蓋在台灣。¹



聯合開發

1963 年啟用的中華體育館於 1988 年鴻源機構的尾牙活動中燒毀，後來的重建過程在「台灣籃球維基館」的網頁上是如此表述：「在 1996 年展開重建計畫，第二代中華體育館有了一線生機，由知名建築設計師李祖原負責設計新場館，工程發包給達欣工程，開工之後不久即傳出基金會無法付出工程款，地基完成後停工，期間曾遭法院拍賣土地卻數度流標，直到近年基金會清償相關債務，更拜台北都會區地價飆漲所賜，加上捷運松山線動工（部份土地已被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徵收做為捷運站出入口），林國長之孫林命嘉決定將原址重新再開發，不再做為體育館用途。」從法院紀錄來看涉及此案的集團董事組成，中泰林家、中信辜家與達欣工持互為集團董事，這種家族財團之間的利益共構關係讓這塊不毛之地身價不凡。2001 年在林家的中泰賓館提供給陳水扁在總統任內嫁女兒的婚宴場地後，中華體育館的廢墟出現轉機。

從 2005 年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8 次會議紀錄來看，當時由台北市政府向該基金會徵收一小塊捷運出入口和出風口的用地，表面上是聯合開發，實質上是終結了中華體育館，並讓這塊傳到林家第三代的不毛之地，再次順勢從公共設施變身為配合捷運聯合開發的住商大樓建築用地，如林命嘉所說的「重新再開發，不再作為體育館用途」。這種聯合開發是政府與民間財團聯合利用都市計畫變更的制度工具，解除了教育部向法院主張禁止林家拋棄體育館、另謀住商建築發展的禁令，最後是便利了公共私有化的土地再開發利潤。

觀光飯店

為了面對 1958 年美國要求改善工業投資環境的壓力，1960 年 9 月間立法院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這是美援會主委暨財政部長嚴家淦設計作為加速台灣經濟發展、加速資本累積、準備因應美援終止的財稅制度，所涉及的範圍包括稅捐、工業用地及公營與民營事業之配合發展。

1961 年 6 月 29 日《中央日報》第五版報導，臺省觀光事業已獲相當發展，政府積極整修觀光道路，民間大量建築觀光旅社。報導中指出，據自可靠方面獲

¹ 根據作者於 2014 年 1 月 18 日於台中訪談謝文昌的筆記。

悉，發展觀光事業要件，必須修好通往風景區的道路和建立完善設備的觀光旅館。據可靠方面透露說：現正有三家規模龐大的觀光大旅館，包括一家華僑投資的中泰賓館股份公司，一家為中美合辦的中美企業公司，預計興建在愛國西路與重慶南路之間，另一家為臺北鐵路飯店預定投資五百萬美元，利用鐵路局收回火車站館前的土地興建。現在建設中的飯店有兩家，一家為台北館前路的皇家大飯店，一為日月潭華僑大廈，由華僑投資。另經政府補助及輔導民間建築的觀光旅館及招待所已完成約十一間，包括高雄市圓山飯店、日月潭臨湖招待所、八卦山招待所、大風潮招待所、臺中鐵路飯店、文山招待所、天祥觀光飯店、高雄市華園飯店、礁溪彌山莊、東方大飯店、金山海濱大飯店。

1969 年的「發展觀光產業條例」引用了「獎勵投資條例」，讓都市裡原本的工業用地，紛紛變成興建觀光旅館用地，卻又在 1970-80 年代間經營不善，一一倒閉，僅剩較具規模的觀光飯店，慘澹經營到 2008 年總統大選後，再從飯店變身為豪宅，不毛之地再度成為新興的房地產：

遠雄集團在中山北路富都飯店改建豪宅案，喊出每坪一五〇萬元，信義區、大安區等一級地段以外的區域，也紛紛叫出每坪百萬元身價。最誇張的是位於敦化北路、由中泰賓館改建的『文華苑』，還前放出每坪一七〇萬元身價，後來喊出每坪二〇〇萬元的空前破表價。

— 《台灣壹週刊》第 362 期

塔

高塔一直是象徵吉祥的建築，但在 1971 年 10 月 14 日在聯合報副刊第九版中間位置，卻沒來由的刊載了一則翻譯自《世界論壇社》的短文：「不祥的建築-艾菲塔，它是全巴黎最著名的人工建築物，也是歐洲最高的。有些批評家說，它是最醜的，但它確然是最要命的。」

1971 年 10 月間，聯合國會員大會正以行使否決權的方式，決定是否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對當時的中華民國而言，這是關係著「中國代表權」的歸屬問題，更是表現了主導聯合國的美國對中國大陸問題的意向，同時危及華人社會是否繼續支持在台灣經營的中華民國。換言之，「中國代表權」對台灣在各方面的影響，主要在於失去了華人社會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經營的認同，會讓戰後的台灣更難營造在政治、經濟層面的生存空間。

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際，台北時間 1971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左下角的建築消息：「華僑塔啟用一陽明山上十一層建築，紀念華僑對祖國貢獻」，這塔建在中華學術院內，也就是今日的中國文化大學內，當時預計作為世界華人研究所址，供國內外華僑學術研究中心之用，由旅菲僑領、菲華反共總會會長剪綵揭幕，並由僑委會主委高信兼任世界華人研究所長，當時中華學術院院長張其昀說：「對於海外僑胞熱愛祖國，明辨是非，深明大義，在海外保存中華文化美德，宣揚中華文化的奮鬥精神，深表讚佩。」這座塔，雖說是世界華人研究所，也是寄望回歸共同的文化關係、延續認同的空間營造，如同表現在 1959 年教育部長張其昀主持、盧毓駿設計的現代科學教育館，「完全宮殿式建築，設計華麗，由重慶南路總統府前，即可看到其高聳入雲之頂部，具有一番莊嚴氣象。」（中央日報）而這樣的建築視角是設計給總統蔣中正的。

在〈不祥的建築〉刊出之後，連續數日出現一些篇幅報導台北車站區域更新計劃，從一位台籍旅日建築師頂著「超高層建築之王」的名號，回台展示、講解他的計劃模型開始。這種建築象徵都市向上發展的計劃、視建築容積率是先進國家的都市計畫良方，已經不只一次引起產官學界的議論，例如：1958 年台灣省主席周至柔（1946 年創建空軍的陸軍一級上將），就曾倡言都市的建築要朝天空與地下發展。但這次還沒正式通過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審議，在短短四天之內，省政府就先公開發布消息，將由這位建築師設計位在台北車站區域邊，一棟 22 層、82.4 公尺高、工程造價一億八千五百萬的第一銀行總部出租辦公大樓，預計年收租二千四百萬。這筆預期的收租利潤，間接形塑出台北車站區域更新計劃中，11 棟超高層大樓花開富貴的魅力，向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特別是向華僑投資集團，展現更開放的經濟誘因，讓投資集團趨之若鶩。只是礙於建築高度限制，這朵富貴之花僅是空中樓閣，還開發不了。直到 1975 年初，台北市宣布解除「禁限建令」。

禁限建令

什麼是禁限建令？禁限建令本來是一種都市計畫的制度工具，用來限制特定地區的開發規模、密度、形式，主要是從整個都市的公共利害考量所做的決定。例如：機場、航管區、水利地、防洪區、保存區等等均屬法定禁限建範圍。由於涉及私有房地產，便衍生了由公部門「補償」私有產權者的概念。

借用 2014 年 6 月 25 日《商業週刊》的〈幫台北背了 44 年十字架的小島〉台北社子島報導文字來看：「1970 年被台北市以台北地區防洪計畫設定為滯洪區後，一旦洪水氾濫，社子島將任其河水淹沒。…房租是台北的三分之一，是外來的人移居台北的第一站。…會留在這個地區的只有三種人：沒有能力搬遷出去的中低收入戶、世代居住於此的人以及想要領特定補助金的人。因此使得這個區域有三多：獨居老人多、弱勢族群多、破落景象多。」這是將禁限建的社子島放在都市開發者與地主的眼光下，形式上是一塊等待了 44 年的不毛之地，今日成為跟政府要土地利益分配利潤率（容積率）的金磚。

換句話說，今日政府與民間面對再開發的種種誘因，已不再討論當時的禁限建令要封閉的危機，而是積極主張禁限建令已經阻礙了今日的都市發展空間擴張，甚至要求從政府「補償」地主的關係，「縉紳化」到以容積率「賠償」開發事業體的主張。但是，對於原本住在禁限建區裡，沒有房地產所有權可論事的窮房客而言，面對這種蓋高樓進行都市更新的方式，只能準備再搬到更偏遠、更便宜之處，這種解除禁限建令助推「再發展」的政策，實質上還看不出來保障了人人皆有住在都市裡的權利。

台灣塔，大宅門

回顧 2008 年 5 月 1 日出刊的《台灣壹週刊》第 362 期的封面故事〈1 坪颯破 200 萬 超級豪宅激戰台北〉：

五二〇將至，台灣建商抓住新總統馬英九蜜月期的尾巴，快火猛炒房市。儘管上週來台的大陸富豪團飽受批評，但本刊調查，五二〇前後還有多個香港、澳門與大陸的大亨團，受建商邀請來台。…有趣的是，大陸富豪們對投資台灣豪宅，興趣不大。

上週來台的大亨企業團成員之一、雅居樂地產董事長陳卓賢說：「雅居樂去年在中國的開發案面積，就高達六百萬平方米（約一八一·五萬坪），幾乎是台中地產開發案的三倍之多，光一個小小的豪宅開發案，根本不在眼裡。」他們最中意的是大型公共工程與工商開發案，因此二十三日的台中豪宅參訪行程，上演主客拉鋸戰。富豪團在聽完台中市政府簡報後，原被安排看五處台中七期的豪宅案，但只看了二案，遊覽車竟往逢甲大學開去，眾人一陣錯愕。原來他們私下透過台中市政府情商逢甲大學，要借用就在水湳機場旁的逢甲大學商學大樓八樓，遠眺整個機場腹地。「依胡志強市長的規劃，水湳的開發面積達二百五十公頃，將採 BOT 開發，還要開國際標，正符合我們在台投資的項目。」

因為上廁所脫隊、深怕沒看到水湳機場全貌的北京萬通地產董事長馮倫，急忙跑上天台，邊看邊對記者說：「我到台中，最感興趣的就是水湳機場開發案。」

於是，一座宣稱能瞭望台灣海峽的建築，計劃在幾年內出現在荒廢的水湳機場跑道附近，在這片不毛之地上，台灣塔還沒蓋出來就再次表現了台灣的都市開發的特徵，尤其是透過建築形式將一種認同感建立在政治經濟層面上。

首先，贏得機會形塑「台灣塔」的日本建築師表示，這是模仿榕樹的氣根形式，表現「台灣」的生命力。不過，真正引起評審團的興趣，是一張世界最高建築的排列圖，像白色巨石的台灣塔和艾菲塔並列在一起，壓在台北 101 之上。這個大腹便便卻空無一物的巨塔，召喚了不久的「過去」，建築工程師用高度、量體和鋼鐵，建構象徵「新科技」的「現代」之夢，這位日本建築師藉此論述：這就是「未來」。

這個漫畫式的荒謬設計被日本建築媒體《GA》形容是日本建築的勝利，除了指認台灣塔的天空樹（或稱「空中花園」）是源自「東京晴空塔」（Tokyo Sky Tree）的概念，台灣塔的位置正巧也是二戰時期日本神風特攻隊起飛之處。正因為今日科技輔助設計高塔並非難事，「台灣」也不過是其中一個虛構的觀點，未完成的「台灣塔」反而真實構築了發展性都市的側面，凸顯了這座城市的市長對炒房集團招手的熱情和承諾，下次不用商借逢甲大學商學大樓八樓，可以站在台灣大道的市政廳、豪宅屋頂花園、星級飯店總統套房和大都會歌劇院酒瓶窗前，藉著台灣塔的霓虹光，循著這一股酒色財氣，前進高塔周邊土地吸引熱錢的「大宅門」。然後，在 2015 年市長換黨換人之後，台灣塔又成了懸而未決、前市長的弊案。

這種以高聳的建築形塑國家的形象是營造城市認同的空間，終究是意義競爭與利益分配的空間。

小結－公共私有化

回顧戰後台灣的都市計劃，往往是透過開闢道路，開出資本擴張的空間，一直是經濟考量下的土地利益分配。本文切入的不毛之地案例，一開始是藉由迎合國家政策囤地、透過官商權貴集團勾結、假公濟私的興建公共設施、公共私有化，不毛之地一路增值到成為壟斷利益的私有房地產，特別是當土地價值遇到再發展的瓶頸時，建構「公共空間」一再被利用為突破再發展瓶頸的管道，於是政

府、政客與民間企業集團聯手下，土地成了終結都市居住正義的壟斷資本。政府並未如人民寄託的專業與正義，監控這樣的利益輸送，反而成了助推利益分配的推土機。



以下的事件，僅是再次見證了今日台灣的都市計劃、都市設計還是只停留於交通建設、經濟與地政的思維，仍舊是排開了建築計畫、歷史文化保存的通盤計畫，都市設計就是開馬路、利益分配，甚至是更退步的作為，將專業審查委員會作為稀釋都市治理政治責任的過道。

台北市政府的怪手於 2015 年 9 月 13 日直入南港瓶蓋工廠，應聲開拆市府劃定的十米「計劃道路」，市長解釋這是根據都審、文資審查的「專業決策」，卻引來更多市民團體抗議、反彈、不願買單，也讓參與都市計畫、建築設計、文資保存的專業審查委員處境尷尬。何以開闢一條道路會讓市長的「專業施政」蒙灰？

都市規畫與治理是處理眾人之事的「專業」，本是多方參議、參與的社會過程。適當的「專業決策」不是一個人的決定，往往是各有專長與各有訴求的人，持續討論、折衝、調節、執行的過程。也就是說，當政府介入都市環境的改造，面對相關利害／利益團體現身捍衛某些權益／特定價值、互不相讓、發生衝突，地方政府往往須要透過專業組織協助進行專業決策，例如：都審、文資審查委員會等，但，不是完全切割專業決策的政治責任。

今日引爆衝突的「計劃道路」，同樣也是專業決策產物，本是都市規畫的其中一種手段，可作為地方政府服務市民生活便利的基礎工程，也可視為改良都市環境的干預技術，例如：設計引道讓產業發展的區域移動，或者，為了完整保存歷史建築而改道通行。因此，「計劃道路」並非僵硬不能改，也不是不能偏移或轉彎，確實正如市長說的：「要考量實際需求，選擇一個最適當的方式處理。」

但，今日足以讓民選市長背信、讓政策轉彎、卻不講清楚的實際需求究竟為何？「無法調整分配瓶蓋工廠可建地」、「歷史建築保存」和「計劃道路」之間究竟是什麼利害/利益關係？如何選擇適當的方式滿足這樣的需求，本是挑戰府內技術官僚的「專業決策」能力，然而，不論民選出誰當市長，市長還是要市民等待「如果時空環境改變，要做改變還是可以，市府不是那麼僵硬的。」²

² 本段文字修改前曾刊登於 2015/09/17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二、田園城市—城鄉資本化



原現代新思潮非必都市方能享受現代文明，方應具計劃，及凡一聚居或一村一村落，均應具此要求，而都市不過為多數社區所構成，故今日學者有廢棄『都市計劃』名詞，而採用『社區計劃』之趨勢，但在今日自由中國此名詞或尚嫌生疏。

—盧毓駿（1954）〈走向正確都市計畫思想之路—台灣省市政考察報告〉
《今日建築》第三、四期

田園城市（Garden City），也翻譯為花園城市，並被現代建築師當成理想城市（Idea City）、光輝城市（La Ville Radieuse）的範型。這樣的構想最早源自一位貧苦的工人之子歐文·羅伯特（Robert Owen, 1771-1858）所繪的一張「現代城鎮規劃」（modern town plan）藍圖，他設計了一種合作公社，建築的外面是花園，花園的外面是農場、牧場和工廠，他稱之為「和諧與合作之村」（a village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作計劃

1964年11月聯合國顧問孟森（Donald Monson）來台審閱《台北基隆都會區域計畫》，他警告到本世紀末台灣的都市人口將增至2-3倍，除非政府採取政策指導這些增加的人口分佈，並且實施都市及都會計畫確保都市建設的合理，否則因沒有計畫而帶來的額外損失，將會使台灣的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傷害。建議行政院請求聯合國「大都會與都市計畫特別基金」（Special fund for Assistance in Metropolitan and Urban Planning）援助，1966年得到聯合國發展方案（UNDP）特別基金董事會通過並在聯合國要求下提出相對配合款在經合會下設立「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UHDC）配合聯合國專家工作，於1966年8月到1971年6月對台灣地區住宅都市及區域建設完成248種報告及建議，聯合國顧問提出了

495 種重要備忘錄及建議。包括台北市綱要計畫(1968)、台中市綱要計畫(1971)以及七個區域計劃等。³

1968 年 12 月 6 日副總統嚴家淦在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成立大會致詞中提到，都市計劃法最初在民國 28 年(1939)制定，到民國 53 年(1964)加以修正，在精神上充分表現我國行政均權制度與地方自治的特色，這從對於各種都市計劃的擬定、變更和公佈實施的層次與程序所作的規定，可以明顯看出。都市計劃隨時代進步要求的產物，都市計劃的本身必須是進步的、是現代化的。為實現「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理想，綜合來說，區域計劃對於都市計劃有指導作用，都市計劃對於社區發展應有促進作用，而區域計劃、都市計劃與社區發展，三者則都應以切合國家建設的總體計畫為最高原則，構成一系列的關係，彼此相互為用，相得益彰，那麼各種建設的推動與進步必可順利，進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也就不難圓滿達成。⁴

1969 年元月份改版的《建築》雙月刊報導了 1968 年 12 月 6 日由盧毓駿主持的中國都市計畫學會成立大會，宣告「作計畫」已經成為勢在必行的國家政策。副總統嚴家淦、經濟部長李國鼎、內政部長徐慶鐘、聯合國顧問孟森、美加州大學教授邁義爾，親臨政治大學會場演講，分別提出台灣的都市計畫須作為台灣的經建計畫之經濟動力基礎，以及配合區域計畫的都市建設原則，會中孟森特別提出英美「衛星城市」和「花園城市」的樣本，期望依此推動林口花園城市計畫。他認為透過城市規劃，城市就會變得有效而可愛。

系統設計

在 1969 年 1 月 17 日的行政院「台灣北區區域建設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會議中，院長嚴家淦強調「何謂區域建設？顧名思義，區域性的建設，不是在某一地區內做些零零星星、各不相關的建設，而是要做通盤性的規畫。所以行政院確定本會的名稱為『台灣北區區域建設委員會』，其主要意思即是在特別強調要進行區域性的建設，即是在建設的全程中，要有『系統設計』(system planning)的觀念與作為。」他強調區域計劃下的都市計劃要應用系統設計分析方法，決定分區範圍與公共建設方式，他舉了分區的問題，他說「在台灣區域建設計劃中的

³ 本段文字節錄自張景森(1991)《台灣現代城市規劃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考察(1985-1988)》。台大土木工程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157 及 160 頁。

⁴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265-268 頁。

分區，台南縣市都是和高雄劃在同一區域之內，那是依照我們既有的觀念而劃分的。可是水資源的劃分則不然，…因為嘉南大圳的水雖發自台南，可是水向北流，所以在水資源計畫中，把台南劃到中區，以便水資源開發，自然有其道理。…因之，現在的區域建設計劃，就應根據都市計劃小組的構想，使與經濟部的水資源計畫相結合。…區域計劃如果將水資源計畫除開的話就不成為完整的計劃了，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所謂系統設計。」系統設計下的都市計劃必須適應四年經濟建設計劃的成長趨勢，依經濟成長有關資料，作為都市建設計劃的參考，使能適合實際情況的要求。

另外，他強調「聯合國所創導的『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概念，和『新社區』指『開發某一個新的地區』不同，是高度的地方自治，即是要實現所謂守望相助、安危共仗的社會理想，也就是要實現中國禮運大同篇理想境界的社區，功效可說是基層民生建設。」⁵

花園都市

1968年10月26日《經濟日報》第二版發布國際貿易基金會將於11月在台舉行研討會的消息，該會外籍代表主要來研討（實為審視）這一年來台灣的財政、金融、外匯、貿易的情況，並就相關措施提出建設性意見。該消息下方則是報導世界銀行專員剛結束視察台鐵貸款運用績效，並建議台鐵可以配合第五期四年經建計劃，向世界銀行申貸近三千萬美元的鐵路建設經費。同一版面另一標題：「建設台北為花園都市，十條道路劃為『美觀區』建築限制高度。」台北市政府決定將南京東路、仁愛路、信義路、松江路、中山北路、羅斯福路、重慶北路等主要道路劃為「美觀區」，規定建築物必須是三層或四層以上。市長高玉樹說要將台北市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都市，首先必須在都市的建築上面做若干限制，要求若干馬路上的建築物必須具有最低限度的高度。他說，仁愛路三段至一段之間的建築物目前不予規定，將是全市最美的一條花園大道。除此之外，為了使得來我國的國際人士離開機場之後即有深刻的印象，因此將在敦化南路鄰近機場處建一座代表我國固有建築藝術氣息的巨型牌樓，初步構想是三頂五門，以代表我國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民主政治，這座牌樓將沐以「金黃」色。

這時候的建築限制高度同時有二種標準，一是不准蓋太低，二是不准蓋太高。因為台北市市長的花園都市是講給二種對象聽的，一是坐在黑頭轎車裡行經

⁵ 節錄自作者於2015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269-276頁。

仁愛路、中山北路的大官，所以沿路建築不能蓋太高。二是買好或正要買大馬路邊土地蓋房子的富商，所以沿路建築不能蓋太低。這種整齊劃一的市容美觀概念，像是軍隊閱兵，在大馬路邊建築物的高度（天際線）上搞統一的形式規矩，後來還是被行道樹的自然生長與建築容積率的人為操作突破了這條線。



修建築法

1968年6月，行政院提送建築法修正草案至立法院審查，主要針對九章：總則、建築許可、建築界限（線）、建築管理、施工管理、使用管理、拆除管理、罰則、附則。12月16日《經濟日報》第三版滿版報導建築法條修正，標題為「各大城市的全盤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及區域計劃如未能及早修訂，僅修正建築法勢難配合現實需要」，小標是「違建雖應加強處罰，但不能只知處罰小老百姓。行政人員如延擱批准申請或舞弊敲詐，亦應有適當處罰條文。」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委員彭爾康質疑修法時間點過晚與修法層級過低。這位經委會立委的一番話明明白白告訴政府了修法立法是為了便利都市開發獲利，根源還是管理土地與房地產的利益分配。

同樣針對建築法修正，中國建築學會常務理事張紹載提出應加入：「在觀光區、新社區內不得設計興建相同式樣的建築物。」他認為建築是一種藝術，又是一門工程，藝術貴在創作，而工程則要日新月異。否則都是千篇一律的所謂「標準式國民住宅」、「標準式學校」、「標準式廠房」，既不適用，又不美觀，同時也不經濟，那有什麼值得觀光呢？這條法規在歐美以及亞洲地區國家如菲律賓和越南等，都已行之有年，如果今天我們還不知採用，豈不是自甘落伍？他的第二項意見是免除建築師因業主的違法開發行為連帶受罰。

在這位得過建築金鼎獎的建築師眼中，市容美觀概念應該是創造差異形式而非統一規矩，建築師要從建築法中獲得創作者的自由與保障，而建築是建築師捏出來的藝術品，立起來供買家品評之物。

模範城市（capital city）

1970年7月24日在中山堂召開的台北市市政工作會議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表示：1967年台北市改制，一方面是由於地方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反攻復國的需求，期使台北市的改制而能增強自由基地的力量。中央要把台北市建設成為一個不但安寧的、健康的，而且具有發展性的現代化都市，

因此檢討的時候，不但以整個台北市作為檢討的範圍，也應參考最新都市建設的理論，迎頭趕上。市府對於社會輿論的建議與批評，應當虛心檢討；建設性的批評，要盡力從善如流，對市民的意見與願望，則重在尋求「民隱」。副總統嚴家淦建議台北市今後努力的方向，要秉持中央政策來做，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全面行政革新、盡快簽訂都市建設細部計劃、通盤解決市區排水問題、積極處理垃圾水肥問題、加強九年國民教育、增進社會福利、加強省市協調合作，尤其是配合國家安全會議核定的北區區域建設計劃。⁶

小結—城鄉資本化

資本的英文是 *capital*，不僅是經濟面的資金，實質空間化可作為「首都」之意，對戰後亞洲各地而言，特別是在聯合國與美援顧問團介入的都市計劃，同時是一種「模範城市」的建構與擴散。如同資本的流動、擴張與修補，模範城市在特定的政治目的下具有同樣的特質。本文表述的「城鄉資本化」同時包含了這些脈絡。

二戰之後，中國庭園的形式曾經被挪用在花園城市的模型裡，在亞洲的現代化過程中建構象徵自由中國的社會空間。它曾經是一種國家政府之間維繫政治關係的禮物，例如 1968-1973 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在新加坡裕廊工業區興建一座由虞日鎮設計的中國公園（*Chinese Garden*）。

今日為了顧及再發展明日都市的基礎建設，新加坡裕廊工業區管理局正在進行改造裕華園（即虞設計的中國公園 *Chinese Garden*）的新興住宅區計劃，將裕廊工業區升級為展望廿一世紀的想像空間，讓新加坡不再是「亞洲四虎」（*Four Asian Tigers*），而是擠身「全球城市」（*Global City*）。

中國庭園和花園城市的連結，在亞洲的現代都市計劃歷程裡，既是一種營造「社區發展」和「新社區」概念的空間計畫，也表現出建築是一種文化想像，但實際上是一種制度。

田園城市或花園城市的系統化城鎮設計概念，透過美援顧問團轉手以形式移植在戰後台灣的都市計劃中，原本的合作公社勞動生產空間與公共資源分配的系統設計，最後淪為美國版的郊區住宅開發、建設公司的銷售模式，而政府為求形式上的市場經濟成長數據，一再修改建築制度替房地產擴張市場空間。

⁶ 節錄自作者於 2015 年編輯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 283-295 頁。

三、平民住宅—社會共同體



過去由政府興建的，有勞工、農民、漁民、公教等各類型住宅。自四十四年開始有市民住宅的興建，其中包括有台北市工會承辦的小販和流動工人的住宅，但真正大規模興建的都市平民住宅，是以台北市水源路和南機場的國民住宅開始。…今年因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所增收之地價稅收入可指定為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措施之用。其中興辦平民住宅便是主要部分。…將優先用來為改善都市裡收入低微的市民建造住宅。

現代大家住進了公寓式的國民住宅，彼此門戶相連，比鄰而居，必須盡量約束自己的生活行為，保持公共清潔和安寧秩序，尤其要發揮我們祖先的善鄰美德「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否則不到幾年又將變為汙穢雜亂的貧民窟，那就不合政府今日興建住宅，改善民居的目的了。

—嚴家淦（1964/11/29）〈台北市南機場平民住宅落成典禮致詞稿〉

1966年1月10日《徵信新聞報》標題：「實行先建後拆案，適當建地難尋，復缺可靠財源，南機場國宅住戶不歡迎。」報導中指出，據說過去所有的拆遷及補償費用，均係在防洪經費內動支，今後如果沒有可靠的財源，拆遷及整建的計劃自恃無法繼續執行。其次取得土地的問題，原本計劃在市區外五處土地興建國宅，現在也受到有關單位阻擾，建地取得困難。最後，從新建好的南機場國宅空屋率高的現象來看，洋房解決不了原本居民的生活問題，南機場因為位置較偏離市區，他們無法做原來可以維生的小生意，今日多數違建戶所從事的大多是小攤販之類的工作，要他們搬到郊區收入頓時成問題，他們自然有所不願。

在興建都市中標準化的國民住宅之前，「新村」曾經是一種理想的都市計劃下的新社區住宅規劃系統，在南機場平民住宅的公共設施形式中，可以看見中興新村省府職員宿舍住宅的系統設計，例如樓梯間收集垃圾的公共管道。二處最大的差異是居民的工作生活類型，今日因為社會的轉型改變了工作生活的型態，無論是公務員家眷，還是市井小販、新移民同樣都要面對家的搬遷與拆遷。

中興新村⁷

1950 年代隨著台灣省政府辦公廳舍遷居中興新村的勞工與眷屬，在一種封閉模式下的生產與消費的迴圈中，成為所處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旁觀者，也同時在新的營造形式卻是陌生的宿舍房子裡，透過身體的勞動學習建立現代化空間與家園塑造之間的關連，這些人累積了逾 50 年的生活空間的營造，對「中興新村」的空間認同已經內化成為身體的一部份，直到國家的政治結構改變與都市的經濟發展政策干預空間生產所造成的迫遷現實的壓迫下，身體的勞動與主體的認同之間開始出現裂痕，這個與中興新村密切連著的身體，只能試圖透過語言、影像以及其他方式掙扎，就像陳樂人的自述結語：

從那一刻開始，我們成為中興新村的一份子，之後我常常驕傲的告訴朋友：我家住在中興新村。只是這樣的認知，在 93 年父親過世後有了變化。因為原本的家必須歸還給政府，搬家時女兒問我：爸爸，我們為什麼要搬家？住在光復國小旁上學不是很方便嗎？女兒的想法和我是一樣的，只是如果繼續住下去，我們將被冠上違規佔用的罪名，我想既然已經方便了 30 多年，這盤棋也該是結束的時候，因為我們都只是棋盤上的棋子，漂浮水上的浮萍，但無論是棋子也好，浮萍也罷，能夠曾經住在中興新村，我已心存感激全心滿足。

又如同在一場法院代替台汽強制執行遷讓房屋的過程中，住戶與前來執行公務的檢察官及警察之間的語言，國家、政府、僱主、法律、公權力與台灣、我們、你們、眷屬，全都融成為一種強迫搬家與欺負身體之間的痛苦。

「當然我們公家機關都是依法行政，一再勸導他們搬離，我們只好尋求法律程序來解決。」

「我們是良民不是暴民，你們這麼對我們，38 年跑來臺灣給你們搞這樣子，公路局分個房子你們台汽的…來告我們，…你對付我們幹什麼？…你欺負這些眷屬幹什麼？…你要我幹什麼就幹什麼，你現在反正你依法行政，對不對？」…「依你的法行政。」

⁷ 本段文字修改前，原文曾發表於 2013 年 6 月 22 日，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教育部、東海大學、台灣建築史學會主辦的《2013 台灣建築史論壇－亞洲涵構中的台灣建築與都市》。



正因為在「中興新村」的空間形式與在地人的歷史自述的觀察過程中，現實空間裡的衝突顯現在身體政治⁸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連上，本文得聚焦在身體、現代性與建築之間的非正當性的支配，這也就是說，現代化的空間移植過程中，俱有非正當性支配力的勞動身體，既是工業化依賴的生產力，又威脅著現代化的工具理性，因為沒有同等的社會權利與知識能力，在不成熟的工程與社會技術下，成為機械性空間的附屬。移植的現代建築以統一的物理標準，複製現代空間的理性規則，形成現代化的法制，隱晦了現實中只有勞動力的身體，以維持某些優勢集團的享樂空間與時間，剔除這種移植現代性所造成的身體存在經驗的斷裂。每當出現來自於傳統經驗對於現代空間的理性規則的威脅，優勢者必須賦予現代化的理性規則一些新的內容，成為維持其空間權力的工具，直到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的目的被失控的都市化推翻，隱晦化的身體將以各種形態反抗佔有優勢者，這是為了被壓迫的過去而進行的一種現代性的戰鬥。

於是，一座存在各種歷史的「城市」開始浮現。

非「城市」

「似城聚落」曾經被用來定義「中興新村」的城市類型，這樣的分類是奠基於「城市/鄉村」的區別定義上，因為中興新村無法被完全歸類為其中一方所採用的一種模糊的地理學名詞，所以被定位在一種「非鄉村，非城市」的聚落狀態。其主要的認定標準在於：「聚落位置往往與既有城鄉脫離，所以內部都設有基本的公共服務設施供居民使用，雖然依賴外援物資，但與周地其它城鄉鮮有往來頻繁的互動關係。」⁹這也就是說，這種似城聚落具有城市的形式卻沒有城市的實質狀態，也已經不是鄉村的經濟結構，仍能符合「聚落」的一般性定義下的集體生活空間的基本類型。另外，對照主張以聚落保存的在地人所引用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這二種論點之間的交集，似乎是合理化了今日多數進行中興新村文化資產指定或是世界遺產潛力點評估的現場勘查重點：建築物的歷史價值。而這種選擇性的「歷史價值」的認定方法，在都市

⁸ 這裡使用的「身體政治」意指一個人的身體如何受到外在力量的支配，例如：來自於國家、政府、學校、雇主、社群等等的壓力，包括國家的認同、政府的管制、學校的管訓、雇主的管控、社群的道德牽制，身體因為受到支配權力的壓迫，而產生主體的位移，也就是失去自主性。

⁹ 節錄自王怡雯（2003）《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發展導向的壓力下卻是難以量化論斷的利益分配方式，只能暫時形成一種特定的專業屏障。

當合理化「中興新村」是一處以集體的空間營造形式所認定的「聚落」後，我們似乎是忽略了先前被「似城聚落」模糊化了的「非城即村」論點與「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間的關鍵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須要再回頭確認：「中興新村」是否不具有活的城市的實質狀態？換言之，能不能在「中興新村」看見一座經由生活需要所營造出來的城市歷史，而不是一批依照現代化的藍圖營建而成的歷史建築？挪用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於 1922 年提出的「共同體」的概念來閱讀「城市」，除了有特定的政治運作系統處理一般性的公眾事務，也同時有特定的經濟運作系統，維持一般性的勞動生產與利益分配，二者之間聯繫著空間中各種形式的生活營造，這樣的城市不能單調地只以一種空間形式或空間大小進行辨識，而是會看見一種生氣蓬勃的城市狀態，這種城市活力關係著勞動與利益的分配方式，持續改變每個人的生活所需的空間生產。在這樣的概念下，一座活的城市如何顯現出共同體的性格，往往不只是正當性支配下的規則與規律的單調工商業系統運作，還會有團體的性格、自己的行政區與一部份自己的法律、一部份的自律性與自主性，也就是非正當性支配的顯現。淺白地說，一座城市會浮現出市井小民能自律、自主地維持生產、消費的空間實質狀態，也就是社會化空間。

市場蔬果魚肉定價、街上販夫走卒的叫賣、司機、車伕、男女老少的工作、求學與鄰里生活。

像第一市場或第三市場的攤販，多認為台灣省政府員工的待遇較高，因此在市場物價方面比照台北的價格，造成中興新村有「小台北之稱」。…一般在中興新村賣剩的東西，攤販寧願載到草屯低價賤售，也不願在中興新村降價出售。…民眾若有空閒時，即使到草屯去買東西，加上來回車錢，也較在中興新村划算…由於村裡市場規模較小，消費民眾也不多，因此商家必須提高售價才有利潤可圖，而商家一般也多有共同把持高售價的共識，造成物價無法下跌。¹⁰

里民的自治組織所進行的公共事務討論，即使只是一部份參與城市的行政事務，都是一座自律自主的城市的活絡狀態。像 12 棟所在的光輝里里民的陳述：

¹⁰ 節錄自王怡雯（2003）《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原文來自台灣省文獻會 1988 年的資料。

歷任省主席只要他把戶籍遷到我們這裡來的話，常常會來參加我們里民大會，甚至有各種的地方選舉，中央選舉選舉的開票所也設在光輝里的活動中心。¹¹

無論是住在中興新村內由公部門統一規劃興建的住宅，或者住在鄰近的台中、草屯地方由民間營建的房舍，其實這些居民在描述日常生活的互動過程中，已經提醒我們要從生活的視角才能看見一座活的「中興新村」，而不是成為人去樓空的歷史註腳。

是不是中興新村的人…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會知道，因為都在這個環境…就等於一個「家」。¹²

搬家 / 搬遷

透過影像工作奔走各種「以聚落保存中興新村」的陳情說明會的陳樂人，本身是今日制度認定下非合法使用中興新村房舍的第二代住民，在其製作的〈村舍〉的片尾中，現聲陳述父親與自己的故事：「這裡曾經是我住過的宿舍，光明一路 202 號，民國 60 年 5 月父親分配到這間宿舍後，他積極的改善宿舍四周的環境，首先他在宿舍的外牆畫 12 生肖圖，然後在院子的左邊搞假山，中間擺水泥桌椅，右邊挖水池，值得一提的他在水池的中央，刻意留了一個台灣島，並在台灣島的中央種了一顆樹，代表我們住的位置，我想當時父親，已經意識到反攻大陸是沒希望了。從那一刻開始，我們成為中興新村的一份子。」跟陳樂人一樣不是在省政府上班工作的居民，正是面臨今日的都市計畫改變壓力的「中興新村人」，也同時是遭遇到自身與家之間的連結出現裂痕的一代。

同樣是以都市計畫做為空間營造的引導，在 1950-60 年代的中興新村都市計畫下遷移了省政府的勞工，這些勞工因為在勞動薪資與福利分配的特定系統裡，不自覺地圍繞著省政府為中心形成「中興新村」與「政府」綁定的空間認同。「所以即使中興新村也是一個反應現實生活的缺憾所提出來的想像未來，但他是一個國家假造出來的理想城鎮，並且是一個借用西方的想像未來的理想城鎮。…」

¹¹ 節錄自陳樂人的〈村舍〉影片。

¹² 節錄自王怡雯（2003）《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第 216 頁。

中興新村對戰後的台灣，似乎是一個沒有歷史過程、社會脈絡、地方涵構為基礎的未來想像，它像是一個一連串時空際遇巧合索拼貼出來理想城鎮。

然而，對於這些勞工家庭而言，「家」的空間營造已經在遷入一處陌生的、一排矮矮的小房子時，「搬家」、「生活」、「養孩子」的過程一步步地改變了工程師按書本裡的圖畫摸索、設計與施作的現代房子，也同時依附著現代房子的樓梯間、廚房煙囪、衛生間、窗戶、停車棚等等營造出另一種長期生活所累積而成的空間認同。

「我們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通往二樓的那個樓梯，就是它很窄很窄，然後以前就是要睡覺或是要上去洗澡，我們家都是…就是魚貫的爬上去，就是爸爸第一媽媽第二，然後我在後面，然後弟弟在我後面，就是這樣爬上去，然後…就是那個樓梯印象很深刻。

我們以前這裡有一個煙囪是公家作的。

你進來看看，這裡是廚房啊，這裡是廚房這裡是樓梯，這裡炒菜煙都通上去，這裏是相對的，廁所在這裡，現在改了移到後面去。

喜歡躲在這裏是因為裡面堆滿了棉被，我幾乎都把棉被翻來翻去，把自己藏在裡面，躲貓貓時怕被同學發現，這裏有一個夾層，天花板是可以移開的。

垃圾好像是從這邊直接丟下去，…就有人在下面收集垃圾。」¹⁴

隨著從法院判決書接踵而來的「搬遷」令，這個因為土地開發與都市計劃而出現的措辭，也同時順著環境的自然災變為由，執行以土地財產權作為管控都市空間發展的正當驅趕，也就是說，在都市空間量度以產權管控的邏輯下，人與家庭是可以與房子、環境、土地的根基區隔開來進行搬遷的。

「這個地是國有財產局的地，那房子是我們（台汽）的，那國有財產局要我們付租金，我們那時候就說沒錢付租金，那他們眷戶當年曾經提到過說，他們自己願意付租金繼續住在這裡，但是後來他們沒有守信用，那又剛好

¹³ 節錄自王怡雯（2003）《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第 251 頁。

¹⁴ 節錄自陳樂人的〈村舍〉影片。

遇到 921 地震以後，我們為了安全起見，曾經一在請求趕快搬遷，他們都是說住習慣這裏不要搬，省政府那時有說，安置他希望再一段時間，我們再給他延兩年，希望他兩年以後趕快搬遷，到 92 年他們還是不願意搬，我們依照我們的眷舍處理辦法就是…依照房子大小給他搬遷費，他們還是不願意…所以只好經過法院訴訟程序…（王鑑銓，台汽客運公司主任秘書）」

15

制度內所處理的行為人與現實中所面對的活人，似乎是有條件上的認定差異，當面對實質的空間因為土地利用價值的差異，需要進行利益重新分配時，沒有土地權的人並不具備議論利益分配方式的同等權利，也就是說，現有的空間使用狀態在一種特定的土地利用價值計算系統之下，不符合更大的利益分配需要時，必將採用正當化了的集體空間管理的制度處理辦法，以一種選擇性的制度理性，進行地上物清空作業，包含人與家庭的搬遷，以維持更高價值的空間塑造與利益重新分配的都市化過程。因為都市空間的價值計算基礎已經改變了，於是，這些已經與土地連結、與房舍連結的人，必須搬遷。

正因為在這種都市開發模式下的價值認定，係奠基於實質空間的估價方程式，早已經排除實質空間對於在此生活的人因為長時間所累積的空間營造所衍生的價值計算參數。所以，無論是陳樂人的〈村舍〉或者是公共電視的專題報導，在專業影像剪輯之後所呈現的議題，都表現了在地人期盼著能圍繞著中興新村的花園城市的現代建築群與囊底路，以一種歷史建築的價值認定挽回都市開發者的同理心。同樣的情景也在各個城市進行更都市化的過程中上演，台北的樂生、華光社區、台南、台東，甚至是原住民部落，都在被制度正當化了的都市開發壓迫下，於身體與土地之間的連結出現裂痕。

這一切的地方認同跟生命的關聯，就像是〈村舍〉片頭中的蘇大妹所嘆息的：「想起來真是的，時間過得很快，一下子五十多年就過去了。」

今日，多數的都市發展，其實是站在土地上漠視身體的死亡過程中進行的。

小結－社會共同體

房屋有自己的死亡之道，就如世世代代的人一般各自倒下，有的發出悲劇的怒吼，有的則鴉雀無聲…然而有些房子在軀體風化之前，靈魂就早已溜

¹⁵ 節錄自陳樂人的〈村舍〉影片。

走了。——維克罕大宅之死就是如此，它是在春天傾頹的……九月時，它已成一具缺乏情感的屍骸；被人尊為神聖的，只因其承載著三十年來的歡樂回憶。家具、圖畫、書籍陸續通過圓頂的門廊搬了出去，末了連最後一個房間也告清空，最後一輛貨車也隆隆開走。它又多矗立了一、兩個禮拜之久，睜大了雙眼，似乎為自身的空曠而驚訝不已。然後就塌了。¹⁶



—E.M. Forster. *Howard's End*

2013 年初，我隨著陳樂人的單車導覽過程，看著「中興新村」正像是維克罕大宅之死，只是它矗立了更久，似乎仍在等待著靈魂回來。當重新凝視著被收錄在影像中的靈魂，我不免開始思考：城市跟都市究竟是不是具有同樣的空間靈魂？逾五十年以前的工程師與今日的專業者，同樣都在面向國家與政府進行規劃藍圖，在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壓力下，我們是否還能夠思考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造的空間歷史與文化？

建築設計與都市計劃的問題是一體兩面的，現代都市計劃中的城市建築被以一種含混的現實概念依附著巨大的結構再現¹⁷，表面上是為了解決人類生活需要的問題，這樣的空間本身卻成了最大的問題。不過，當人在空間中的移動過程中受到空間變化所壓迫的身體，其實不會在原地空等待一種來自外來的專業指導、或被正當地稱為「底層」的改革發生，而是會隨著維持生活所需，在可觸及的範圍裡，改造實體空間中的阻礙物或者添加缺乏的生活要件，這些往往不符合現代建築所強調的垂直、水平的規矩，但是我們總會不自主去注意到，客廳白牆上的觀音畫軸，餐桌前方的神案，廚房牆上掛滿的鍋碗瓢盆，浴缸旁大窗戶前遮遮掩掩的花布，以及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從一堆捨不得丟的家庭雜物中拿出一支紅

¹⁶ Cooper Marcus, C. (2006)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徐詩思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5 年）。

¹⁷ 現代建築與都市計劃是一體的問題，從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的觀點，於 1966 年出版的《城市的建築學》*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Italian: *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中，提出的城市意指二種不同的思考：一、城市如同人造物，由大而複雜的工程與建築長期累積而成。（the city seen as a gigantic man-made object, a work of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that is large and complex and growing over time.）二、城市構成的概念，彷彿城市的性格被其自有的歷史與形式所形塑。（certain more limited but still crucial aspects of the city, namely urban artifacts, which like the city itself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own history and thus by their own form）然而，這二種思考中，建築被以一種含混的現實概念依附巨大的結構再現，事實證明這樣的都市建築本身正是問題。（In both cases architecture clearly represents only one aspect of a more complex reality, of a larger struc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ultimate verifiable fact of this reality, it constitutes the most concrete possible position from which to address the problem.）（p.29）

色小桿子，示範如何操控早已封起來的通風口木片百葉。我們會在這種現代建築的具體輪廓上看到了新奇的營造形式，也同時從人們干預這種單一的建築形式的變化裡看見了生活，或許，陳樂人以及在鏡頭下的自述者、螢幕外的旁觀者所期盼延續的，其實已經是這二者與自己的認同所融合而成的一座花園城市，名為「中興新村」。

如何看待平民住宅是什麼？不是提問建築形式，而是「安居樂業」的問題。

第三章

知識份子的建築觀



今天能把建築當做生活藝術的一群人，只有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而我國在經濟上正開始進入中產階級的社會。

—漢寶德（1973/10/26）〈知識份子的建築觀—也談傳統與現代〉（下）

《中國時報》

一、大學之道－現代生活的烏托邦



1963 年 11 月，美國聯董會出資建造的東海大學，在校園中心、文理大道的端點，由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路思義教堂完工，在台中的大肚山上敲響鐘聲。

他處計畫 (Elsewhere)

1950 年代，聯董會以香港與台灣二地，示範性移植北美式的大學體制，重建新中國的象徵，芳威廉 (William Purvance Fenn) 記載為「他處計劃」(Elsewhere)。

19 世紀末到二次大戰後，中國學院 (college) 與大學 (university) 的興辦歷史，關係著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所接收的西方知識啟蒙與現代性的移植過程，不單純是一般的教育史，而是在西方現代世界來臨的壓力下，隨著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宗教組織的全面性向外擴展，西式教育邏輯移植了歐美文化也同時輸入了西方的現代性，促動在華人社會傳統中的師徒學習模式產出的領導知識份子，為了克服自身的國家與民族認同的壓力，迎接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來臨，帶頭領導教育方式的轉型，移植西式教育模式建構新思維以展開教育的現代化過程。二次大戰後，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教育發展，則是冷戰期美利堅盛世下，以盎格魯-美利堅 (Anglo-American) 為中心，建立「新境界」(New Horizons) 與「新傳統」(New Tradition) 的後中國 (Post-China)。

「盎格魯-美利堅」係指英國和美國，特別是指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面的同盟合作關係與文化、歷史脈絡關連性。「新境界」一詞被賦與無庸置疑的偉大教化使命，原本是與基督教社會形成過程密不可分，與「烏托邦」(utopia) 一樣是去社會與去政治現實的理想，係由慈善家與受教育階層以一種施捨的教化行為，在他處建設象徵進步的世界，實踐慈善家自我的人性昇華為神性。而培植一個「新傳統」成為無可懷疑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原本與一些北美的建築學院為了切割源自歐洲的布雜教育 (Beaux-Arts) 的學院歷史，主張去歷史的建築設計教育論爭過程緊密關聯，指標性的論述為 1941 年哈佛建築學院 Walter Gropius 與 Sigfried Giedion 合作完成的《空間，時間與建築 - 培植一個新傳統》(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工業化學校

台灣並未因為一段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歷史，而與在亞洲的現代化教育過程脫離關連。一方面，二戰結束以前，在台灣的知識份子間接從日本與中國大陸接收西方現代的信息。二方面，日本於殖民時期在台灣成立的工業學校，於二次大戰後在國家機制運作下安置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大學教師與畢業生，取代原本的日籍教師的工作，並在 1950 年代從國家層級向下進行美援工程計畫，將原本的日式工業學校在技術層面上置換為美式工程邏輯，培訓工程技術的勞動力，例如：台北工業學校建築科延續工業教育技術性導向，置入美式的設備技術與專科教育模式，成為台北工專的建築工程科。而戰後長期以國立大學位階居建築專業技術領導角色的成大建築系，則是在普渡-成大計畫（1952-1966）中定調為建築工程系，並隸屬於工學院體制下發展，直接由普渡大學移植工程學院組織與工程教育技術，成為工程技術導向的建築專業，於是土木工程技術導向的建築工程教育成為在台灣的建築教育的深層性格。三方面，於二戰末期（1943-1951 年），在中國共產黨（communist）主導的反美利堅文化帝國主義（anti-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聲浪中，北美在中國大陸扶植的基督教大學聯合組織瓦解，來自北美的協董會（Associated Boards）與聯董會（United Board），將籌備在中國大陸進行的戰後重建計畫（the post-war planning），轉移至香港與台灣。

教化菁英

1937-1945 年期間，中國各地的大學師生隨著逃避戰爭群體遷移，以一種臨時性的聯合組織狀態斷斷續續地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1943 年，由北美的協董會在中國扶植的大學為主要成員的組織，後於 1945 年定名為「聯董會」（United Board），由南京大學的芳威廉及其夫人召集，在成都進行各校教育成果與未來計畫討論後，正式在紐約成立戰後計畫委員會（The Post-War Planning Committee），並於 1943-1946 年期間，密集討論中國各大學如何進行戰後中國的高等教育重建計畫，在 1946 年該委員會提交報告給在北美協董會（The Associated Boards）及北美幾所私立大學附屬基金會的中，內容主要規劃在中國八大城市進行大學整併、重建與強化個別重點學術領域，包括：扶植北平的燕京大學成為中國最高等級學術機構；扶植濟南的齊魯大學(前山東大學)發展農村重建、科學與醫學；整併在上海既有基督教大學與學院，扶植重點發展藝術、科學、醫學、工程、法律、經貿；扶植在南京的吉林大學與南京大學的聯合學術發展機制；扶植在武昌的華中大學強化原本的學術組織、扶植在廣東的嶺南大學成為南

華地區的學術領導位置、扶植在福州的福建基督教學院、華南學院、福建工業所聯合教師群與教育中心，主要倚靠福建基督教大學的藝術、科學與農村重建教學計畫資源；在成都成立西華大學包含藝術、科學、醫學、牙醫學院。此外，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扶植是戰後重建計畫的重點之一，另外女性受教權的改善、女性教師的培植以及扶植吉林女子大學的成立，更是成為戰後計畫委員會(The Post-War Planning Committee)、英國計畫委員會(The British Planning Committee)、北美計畫委員會(The Planning Committee in North America)最多的共識與討論。

與戰後亞洲國家有關的實質計畫，特別是香港與台灣，是 1947 年由葛羅培斯與貝聿銘合作設計中國新傳統的華東聯合大學(Ea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的校園類型，在戰末中美關係緊張之際，直接成為聯董會在中國大學的領導計畫(a pilot plan)藍圖。在聯董會的後中國他處計畫下，1951 年 9 月在香港成立崇基學院(Chung Chi College)，由前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 Lee Ying-Lam(1951-1954)擔任第一任校長，崇基被視為一處英皇殖民下短期收容中國逃難菁英者的高等教育場所。1955 年，新校園預定在新界馬料水靠海灣的山丘地，土地範圍內的零星私有農舍被英皇殖民政府持有的坡地環繞著，崇基學院在英皇殖民政府操作下取得此地建校，先是由加拿大聯合教會資助建成一棟教堂與學生活動中心，聯董會資助建成學生宿舍、一般教室、實驗室。校園範圍內的私有農舍與農地地主被政府與校方「說服」放棄持有房舍與土地，改成為崇基學院的圖書館，於是崇基學院校園正式完整成形。1963 年崇基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1952 年，聯董會對於在台灣成立東海大學的定位則與香港的崇基學院有些差異，根據芳威廉的紀錄，「東海大學的服務對象是本土台灣人，而非難民機構，其校園規劃必須維持適度的尺度以符合景觀與經費，其教育計劃不能自動複製過去的形式，而是要盡可能符合基督教社群對福爾摩沙(台灣)的期待，建立一種新鮮的、具想像性的模式。」¹藉由興辦大學安置北美在中國大陸扶植的菁英，分別在香港與台灣建立二個新的中國學院，並進一步加入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大學成員，形成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計畫版

¹ 原文為: The from the outset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that the Christian College on Formosa is intended to serve the people of Formosa, whatever their origins, and is not a refugee institution; that it should be planned and maintained on a modest scale as to plant and budget; and that its educational program should not be an automatic copying of that of the past but should attempt to meet the needs aspirations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on Formosa in as fresh and imaginative a pattern as possible.

圖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其中對台灣建築界影響深遠的是東海大學的興辦 (1955)。

於是，當「現代建築」在台灣以美式工程教育技術取代日式工業教育機構時，「現代建築」也同時以邁向美式現代化生活的想像，隨著新教會校園的鐘聲向外迴響。

建築的神學院

對於戰後大量由中國大陸遷移到香港、台灣安置生活的受教育階層、知識份子與年輕學生而言，來自美國的援助包括協董會、聯董會、美援資金，特別是 1951 年以後新建的校舍與興辦的新中國大學 (New China Colleges for Chinese)，如同西洋聖誕節的禮物，帶來和平希望的象徵，成為實質上貫徹美國文化在亞洲擴張影響力的教育機構。反觀 1951 年以後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於二戰結束前參與協董會與聯董會組織，以及曾經到美國留學的知識份子，成為政治上被批評的美利堅文化帝國主義遺緒 (legacy)，切割其象徵美帝的語言與營造形式，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在中國的西方知識啟蒙與現代性歷程上，1951 年隱約成為戰後切割出兩個中國現代大學發展路線的特殊年份。該年 5 月，聯董會失去過去三十年在中國扶植的大學成員後，在一場年度會議中，由執行秘書處重申該組織的精神以及新計畫「無限境界」 (Horizons, Unlimited)。在中國長大曾擔任南京大學教授長達二十年 (1932-1951)，並且長達三十年 (1941-1970) 擔任聯董會執行秘書長的芳威廉，在他回憶中國學院的興辦歷史中提及²：1951 年以前，在中國興辦教育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服務；1951 年以後，這項源自基督教在知識教育上的傳教理念，已經不單純是實踐基督教大學的博雅教育，反而是逐漸走向「再現北美關注下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 (represent North American interest i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其實這就是文化移植。

一篇收藏於台大圖書館狄寶賽文庫裡，1953 年 11 月香港週報宣傳東海大學校園新建消息的新聞剪報中，斗大的標題：「中國學院在高等教育領域發現基督

² 威廉·普芬司·芬曾經出版兩本關於中國基督教大學興辦歷史的書籍，分別為《1880-1950 年在變動中國的基督教高等教育》*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Eerdmans, 1976)與《永恆新境界-1922-1975 年聯董會在亞洲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故事》*Ever New Horizons –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2-1975* (UB, 1980)，此處引用的資料主要為後者。

教服務的新境界」(The China Colleges find NEW HORIZONS of Christian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在前述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不僅僅是對非共產主義國家的華人，傳達一種象徵新傳統與和平希望的新中國，更是以北美的基督教會與大學的聯合組織，其中包括：哈佛－燕京 (Harvard-Yenching)、耶魯－中國，又名雅禮 (Yale-China, Yali)、普林斯頓－燕京 (Princeton-Yenching)，又名普林斯頓－亞洲 (Princeton in Asia)、奧伯林 (Oberlin)，延續西方知識建構系統在亞洲所進行的教化 (nursing)，並向世界展現由北美扶植重建的新中國，傳達美利堅盛世，即「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³。

北美主導亞洲高等教育發展的角色，介入戰後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重建國族象徵的過程，一如芳威廉的記載：「在亞洲象徵新中國和平希望的東海大學，其座落位置的選擇，是聯董會從一個國家的精神核心考量，認為台中市是一處本土台灣人 (native Taiwanese) 與新到達的大陸人 (the newly arrived mainlanders) 社會關係張力的交界處，比台北市更適合進行全新的教育。」這裡的台灣人是指戰爭結束前已經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而戰末從中國大陸遷移到台灣的中國人，則稱為新來的大陸人，在這二者之間並沒有台灣的原住民族。

1956年11月，聯董會在東海大學召開第一次亞洲大學會議，與會包括：韓國 Chosun Christian University、日本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香港崇基學院 Chung Chi College、菲律賓 Silliman University、台灣東海大學五個機構。會議主題為「今日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意義與挑戰」(The Meaning and Challeng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Today)，藉此重申亞洲高等教育的目的是：「重建國族與人文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and humanity)，發覺本土文化的根基以建立現代理念 (the task of discovering indigenous cultural foundations for modern idea)。」突顯聯董會計畫的東海大學，不單純是新中國文化的生產場所、現代建築的空間範本，而是一道為了移植美國的現代建築與現代都市計畫的理論與技術所開啟的大門，也同時是一份美利堅盛世下所規劃的新境界藍圖。

³ 出自亞倫·科爾克霍恩 (Alan Colquhoun) 於 2002 年出版的《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一書中，第 12 章(末章)標題：〈美利堅盛世：1945-65 年在美的建築〉(Pax Americana: Architecture in America 1945-65)。其中 “Pax” 係源自希臘羅馬教堂裡的和平女神之吻，為基督教的用辭，象徵「和平」；而 American + a 的拼字，係為拉丁語系中，普遍代表女性的命名方式，而 Americana 同時是美國文化代表全美洲的統稱。

中國人力生產中心

高等教育透過大學與學院的組織建構專業技能與知識的正當性，其建構的起點往往是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其過程與結果卻不一定落實在如何認識所處的社會傳統上。如果以教育組織成立的脈絡分類二次大戰後在台灣的大學與學院，大致有四條線索：



- 一、殖民時期日本建立的大學與工業學校，在美援的藍圖制度（blue print system）計畫下，進行新建設與教學系統轉型，例如：台灣大學（日殖時期第七所帝國大學，在台灣的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現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省立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省立法商學院（今台北大學）、省立工學院（今成功大學）與省立台北工專（今台北科技大學）等。
- 二、美國聯董會所創辦的東海大學。
- 三、原來在中國大陸官辦大學在台灣復校，例如：政治大學（昔為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1954年在台復校），清華大學（昔為北京清華大學，由梅貽琦校長於1955年在台復校），交通大學（昔為上海交通大學，1958年在台復校），中央大學（昔為南京-中央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
- 四、戰後由中國大陸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菁英與在台灣本土的仕紳合作興辦的私校，例如：中原理工學院，現為中原大學（張靜愚、虞日鎮、黃寶瑜）；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盧毓駿）；淡江英專（1950-1958）、淡江文理學院（1958-1980），現為淡江大學（居正、居瀛玖、張驚聲、居浩然、張建邦）；東吳大學（丘漢平、王寵惠、黃安素、施季言）；逢甲工商學院，現為逢甲大學（蕭一山、丘念台、楊亮功、高信）等等。

其中，與戰後在台灣「現代建築」移植論述過程關係密切的，主要是成功大學與東海大學，其次是中原大學與中國文化大學，更晚些則有淡江大學與逢甲大學，形成建築傳統六校（又稱老六校）。位在桃園縣的中央大學是一所只有土木工程系所卻沒有建築系的大學，但復校前身是在中國南京的中央大學（今日的東南大學），卻是同時設有建築工程系與土木工程系。蔣介石曾為校長，該校畢業生於戰後遷移到台灣，成為初期台灣各建築學院的主要師資，以及戰後台灣各項公共建設的建築師。

而台灣大學是在日殖時期建立、只有土木工程系而沒有建築系的一所現代大學，戰後與成功大學、中興大學（現為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系所等等，都在聯合

國專家、美援計畫的經合會代表的政府技術官僚所規劃的制度下，成為國家層級的「現代都市計畫」移植與現代化社區規畫技術實驗過程中的勞動力生產基地。



小結－現代生活的烏托邦

如果從二次大戰後的知識份子的處境來看，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於美國政治經濟強權主導下，不以移植摩登的美式理論與發展技術建立專業制度是不可想像的事，一方面新成立的學院、新世代的菁英為了克服自身文化認同的危機而寄望新思維的學習，急切地移植西方的知識理論與營造形式，想像並模擬西方的社會技術，推動新中國在台灣的現代運動。另一方面，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建立的工業學校系統在國家主導下開始轉型，原本接受日式教育的知識份子同樣面臨自身文化認同的危機也必須改變。這些經歷教育方式的改變與現代社會來臨的壓力下的知識份子們，是在尚未解除的殖民社會遺緒上，直接進入了美利堅盛世的新境界，不自覺地在西方工業社會移植的勞動與分配方式中，生產出空間與語言的折衷形式，反而形成一種與自身長期累積的空間營造經驗之間的陌生。

二、建築師法—制度化的專業黑手



我預期未來的建築界會與其他工業生產體系一樣，會進一步的合理化。因此我認為社會並不需要建築師制度，應該結合營造業，成為完整的經營體系。因此「合理的設計原則」可以發揮作用。我對當時（1971年底）立法院通過了《建築師法》，使建築專業化，得以西洋式的形態合法化，感到是一種開倒車的作法。

—漢寶德（1990）〈大乘的建築觀〉《雅砌》雜誌第五期

修法的時局

1963年7月1日聯合報記者謝豈平寫了一篇社論〈都市建築的高空發展〉，他說：「建築工程師們說從純技術的觀點來說房屋的高度是無需限制的。…房屋高度的需要限制在今日已不是而是『經濟價值』和『都市計畫』的配合問題安全問題。」文中表示「都市計畫的內容大約有三方面：土地的使用、交通和公共設備」，房屋的「高度」是配合都市計畫發展的規定，舊建築法需要改進，並且「內政部長連震東在日前市政學會上，已公開承認這一法令『落伍』決定修改現行的建築法令。」文末建議政府參考日本的建築規定修法，並指出「今日本省所採用的三一·五公尺的限制，即是日據時代所規定的，日本本國的『高度』限制現在也只是三一公尺。因此近年來日本建築界人士紛紛向政府提出建議他們認為以今日建築技術材料硬性，規定高度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建議以『比例制』代之，如以百分之五十的土地興建房屋，可以建十二層高的房子。」

1964年1月4日《聯合報》第二版報導：「發展民間建築事業，將設房屋建築中心，董監事會通過工作範圍，基金將由有關機構及個人捐助。」中國房屋建築中心董事長為板橋林家林維源之子林柏壽擔任，該中心基金由行政院經合會捐助二百萬，台省政府捐助八十萬，個工商企業共同捐助八十五萬等。該中心組織分五組：展覽組、服務組、研究出版組、總務組、會計組。以協助政府推行房屋政策並發展民間建築專業為目的，工作範圍包括：(1)指導社會大眾關於房屋技術及建築材料之認識。(2)長期展覽建築材料及房屋設備，供建築者之比較選擇，並促進建材之改善。(3)聯繫國內外建築及建材組織，交換並報導有關資料。(4)介紹國外優良產品、技術與建材，供國內業者參考。(5)辦理關房屋建築之諮詢服

務事項。(6)受委託辦理有關計劃、研究、訓練等服務事項。(7)其他經董會決議之有關事項。

1964年1月5日《聯合報》第三版評論「中國房屋建築中心」成立一事，指出：「這個機構具雙重性格，一是經濟的，促進經濟建設，以厚民利。一是社會的，助成廣廈千萬，以利民居。」並認為其工作內容既不與類似的企業爭利，反之，建築師、營造業、房地產公司將為該中心的受益者。

1964年3月24日《聯合報》第二版標題「新建築法如能及早公布，台北市容將更壯觀。」報導指出，建築界人士表示，新的「建築管理辦法」如能在最近公布實施，台北市市容將大為壯觀。該人士說，高樓的興建乃為本市日益發達的工商業所需要。以往建築法限制房屋建築高度不得超過馬路寬度一倍半以及不得高於35公尺，實在無法適合現代都市發展的需要。日本也正在革新舊的建築法規，我國自亦不能落後。

1964年8月24-25日《聯合報》第七版「玻璃墊上」專欄主筆何凡⁴以「建築法多而無當」為題，連載二天評論。他切入的問題是「本省的建築法規多如牛毛，期間多有重複矛盾，不合時宜之處。因之造成經手人的敲詐的機會。」文中舉出1963年12月出版的《建築》月刊中蔡添壁和蘇錦雲寫的〈本省有多少與建築相關的法規〉一文中列舉有名堂的法規有八十二種之多，看起來中國似乎是一個「法」治國家，法條不厭其多，至於實用不實用，適行不適行則是另一回事了。何凡認不信台灣修蓋房子的都是一些以毀法為榮的刁民，如今百條法規一擁而上，連專業的建築師都搞不清一般老百姓如何能教他們心悅誠服地去遵令辦理？而條文太多了，只有主管建築行政的人才清楚，他們正可以利用其中的空隙與矛盾，大做文章，那時「順我者生」的行市就擺出來了。蔡、蘇兩軍認為本省建築水準之低落，管理之紊亂，主因是法令不能配合事實。台北奉安大樓案發後，市工務局管理課長蔡添壁表示，他早認為現行的對建築物的「高度」及「空地」的限制不合理建議內政部據實修改，學工的高玉樹市長也有同感。內政部請專家研究了半年多，還沒有得出結論。而蓋房子的人等不了，先蓋了再說。「衙門門，八字開」，不走左道，無法暢通。在法令既不合理，執行又有偏差的狀況下，老百姓也就只有不俟合而行，看你有什麼後果再說了。所以「特權」解決不了問題，那一百種「形同具文」的法條也唬不了人。

⁴ 何凡，原名夏承楹，自1953年起任《聯合報》主筆。曾擔任國語日報副社長。

專業的詮釋

再思考一下既有詮釋「專業」(profession)的意涵及其問題。首先，專業並不是自然存在的一門學科，也不被傳統的學術界視為一種學門，一般對於專業的認識偏重於實質面操作的知識與技術，進一步在專業分工制度化了的社會發展與運作過程中，體察到專業存有政治上、經濟上與教育面向的特殊性，專業代表著受過專業教育取得專業資格的一群人，在制度化的專業範疇裡主導相關的集體事務，這樣的制度或機制往往連結上治理政策面或市場經濟面上的運作結構，專業領域以參議、審議、辯護等等方式，或者設計、規劃的技術操作，介入社會變遷過程。

換句話說，一般寄望專業在社會表現上，以「政治中立」、「非營利性」的重要角色達成服務社會的理想，是將專業的形成基礎設定在集體生活的社會過程中，一種為了維護公眾利益與需要而發展出來的知識與技術，依照這樣的基本設定，一般被認定為專業領域主要範疇，例如：醫學、法學、工程學，理論上是著重於公眾性、公共性的知識與技術的研究與實踐，其重點明顯表現於處理集體生活危機，例如：公共衛生、傳染疾病醫療、人權法、公共工程等等。當然，專業領域的範疇會隨著群體生活的社會過程中，各種不同領域的問題混雜產生而擴大，逐漸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醫學、法學、工程學交集分支出更多種專業，並且逐漸構成教育系統中的專業學院體制，而專業學院的實質操作性質明顯與學術研究型的學院體制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區分。

歷史中的專業角色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專業的角色在社會過程中的顯現主要與 19 世紀後期西方歐洲的工業社會與國家形成之民主化過程有關，醫師、律師、工程師於其所屬的受教育階層中逐漸在社會關係裡形成仕紳地位，取得與世襲的貴族類似的參政權力，得以參與民主化的政治過程，並在工業革命所帶動的科學理性的趨勢上，反抗教條式的宗教信仰所主導的教育系統，進一步推動現代化的教育改革過程。一些 20 世紀初期的西方歷史學者將這種革新過程回推到中世紀之後，西方市民城市的浮現，非世襲貴族的受教育者（醫師、律師、建築師）在知識上的理性主義表現與政治上的參政權，並在社會關係上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這樣的過程被稱之為「啟蒙」、「復興」，這意味著終結之前由宗教（基督教）勢力所主導的黑暗時期。於是，15 世紀前後的西歐文藝復興時期被歷史性地設定成為西

方的專業主義的來源，而工業化與民主化的社會轉型被視為當代專業主義興起的歷史條件。

1960年代，西方學界（主要開始於英國學界的論述）針對專業與專業主義展開認識論的批判，主要從政治、經濟與教育面向，重新檢討專業者與專業主義所強調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理性與實踐之特殊性，特別是在社會變動過程中，專業者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如何逐漸偏離了專業初始形成的社會基礎，特別針對在專業與資本主義結合，形成專業在知識的內部結構之政治保守狀態，以及專業在技術的外部操作之壟斷性支配。專業逐漸成為服務上層結構的工程，同時成為控制下層基礎的技術，專業者成為一種新中產階級。

專業特質

如果從狹義的專業特性的建構模式來看，由專業者組成的專業界所詮釋的「專業」特質，依照一些西方學者（例如：Terence，1972）的整理，大致如下：

1. 技術奠基於理論化的知識上。
2. 特定的訓練方法與教育內容、教育機構。
3. 通過特定考試審查過程取得專業者的資格，並成為進入代表專業組織（公會）的成員之基本條件。
4. 遵循一種符號化的專業形象的指導。
5. 利他的服務。

專業過程原本是一種多方參議或參與的社會過程，以實踐專業服務社會的角色，而在商品化經濟的發展趨勢下，專業者改變了，逐漸缺席於各種形式的社會過程。當專業主義與資本主義緊密結合後，在上述這些專業特性之設定下，專業被預設了個人化的專業者、專業服務的對象與二者之間的交易關係，例如：醫生與病人、律師與委託人、建築師/工程師與業主。專業逐漸少了公眾性與公共性的社會特質，轉變成為商品化的智識或技術服務，其問題不在於專業者的道德與倫理，關鍵要害在於病人、委託人、業主被限縮在個人化的消費與需求，致使專業的語詞只能成為專業者維護的自身形象與市場價值，除了知識與技術被商品化，專業者自身也在職業化的專業過程中被異化為商品。

建築與都市計畫如何能構成一個專業領域

在這樣的專業發展脈絡下，建築與都市計劃作為一個專業領域的關鍵構成為何？建築與都市計劃與實質空間塑造過程緊密相關，通常是被界定在工程學的專業範疇之下，是一種以制度化的流程與技術的系統化所建構而成的專業領域，建築專業與如何進行建築設計、建造、管理有關，都市計劃專業與如何進行都市設計、規劃、管理、開發有關。在實際執行面上，建築與都市計劃之間存在著彼此牽制與從屬的實踐關係，如果從形式上的尺度與制度來看，都市計劃涵蓋建築並且成為建築的上層結構，而建築構成並作為實行都市計劃的實質結果。在這樣的工程學邏輯設定之下，建築與都市計劃作為一個專業領域，其構成同樣維繫在：空間的知識系統之建立、空間理論實踐的環境條件與制度建構，以及空間的研究-理論-實踐的機制之形成，如何介入社會結構產生作用。

這樣的構成也同時與專業領域的主要成員（專業者、技術官僚）有緊密的關係，當代主導實質技術表現的空間專業者，例如：建築師、社區規劃師、城市建築師(規劃師)、都市景觀設計師、都市規劃師等等，往往是都市化過程中在空間建造的技術上所依賴的重要角色，然而，因為都市計畫與建築的執行內容關係著空間利益的競爭，在都市化的社會衝突過程中，專業者的角色與作為容易被質疑其專業道德與政治立場。這與專業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專業者特性有關，特別是專業者對於「利他服務」的認知，讓專業者選擇性地與任何一種社會衝突過程保持距離，以維持自身的專業形象或立場。以空間規畫者為例，其類型特質大致如下：

1. 強調以技術與形式作為專業形象的表現，服膺市場邏輯與業主導向的專業技能提供者。
2. 強調以理性與秩序作為專業理念的概念基礎，擔任空間秩序化的諮商者與理論化的空間營造知識的教育者。
3. 以訴求環境倫理、空間歷史與生活權利為專業職責者。
4. 以專業領域的實踐形態作為研究對象與理論建構的評論者，通常成為第 1 類的專業評審員，以及第 2、3 類專業者的諮商員與教育員。然而，這類具有某種程度的專業特性的評論者，面對社會同樣具有空間專業者的形象，卻不一定被專業領域中的第 1、2、3 類專業者視為同等的專業者。

承上所述，專業是一種過程。當代的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專業領域更是一種「體制」⁵，這裡所指的體制至少包含了建構的專業制度（政策、法令、教育等）、動態的過程（介入、干預、支配等）、能動者的行動與形成，這種專業由於涉及到大範圍的物質生活、政治過程、經濟生產等等層面，更是一種特殊的、支配性高的體制，也同時是現代主義下的產物。從西方現代都市規劃設計的發展脈絡來看，形式、功能、效率及行動力是都市規劃的關鍵，表現在都市的城市意象、基礎設施、交通計畫等等。從空間的主體性與社會性來思考，都市計劃表現在提供市民基本的社會服務，這包括個人與家庭的工作、消費、教育、醫療等等，然而，專業者規劃過程所預設的社會需求由於脫離了現實的差異性而產生社會衝突，於是，都市計劃專業的規劃政治表現在專業規劃過程中市民（民主）的參與，如何創造並保護都市中共同生活的空間效益，這樣的空間效益不僅僅是空間使用量上的公平性，也包含過去的、現在的空間與人的情感結構上之連結品質。

都市計劃同時存在另一種面向：政治工程與經濟設計，前者通常被預設以有利於國家、政府的治理為主要規劃目的，往往表現在政策性的、長期的建設綱要或法令制度，使空間秩序的建構成為一種訴求功效的空間治理術；後者以促進產業經濟的活力為主要計劃目標，通常著重於區域、特區的發展，透過持續性的重新規劃過程，一方面創造都市投資誘因，另一方面因為產業改變造成勞動者的流動。因此，都市計劃作為一個專業領域的關鍵構成至少包括：公共空間形成的政治過程如何在規劃過程中呈現民主的成果；都市的經濟設計如何在持續變化的空間結構中，透過規劃過程維繫與建立各種社會關係；正因為都市計劃專業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大範圍的變化，其教育系統除了工程學的基本學科，如何在跨學術領域的知識交流過程中生產整合性的技術，避免侷限於工程計算邏輯的框架，更是關鍵。

相較於都市計劃的尺度與特性，建築被界定以空間的形式再現物質生活，其空間的主體性與社會性，表現於介入人們居住生活的種種需要與細節上，建築是介入社會變遷過程的物質鑲嵌，其象徵性、儀式性的空間構成具有干預、支配社會關係如何形成的重要影響。當建築作為一種工程學邏輯下的專業，往往意味著一群接受建築教育的專業者，依循著既定的建築管理法令與制度，進行建築工

⁵ 參照王志弘在〈新文化治理體制與國家-社會關係：剝皮寮的襲產化〉（2012）的前言註腳解釋（世新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三期第 34 頁）：「體制」（regime）則接近 Michel Foucault (1980) 的真理體制 (regime of truth) 概念，指稱由機構、制度、規範、論述、技術等構築而成的運作體，有著知識/權力之真理效果。

程的計劃，這樣的建築專業構成至少包含：具有預設價值的設計理念、準則化的建築計畫與標準化的建築管理，換句話說，（狹義的）建築是透過一種制度化建構而成的系統與流程塑造空間。同時，建築的專業領域存在著另一種專業者自己的詮釋：藝術化導向與人文關懷，前者經常是美化建築設計意欲傳達的專業品味與專業技術的支配性價值觀；後者意圖合理化建築干預空間的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介入社會的表現。

如何鑲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

這個建築與都市計劃專業領域，又以何種方式鑲嵌在更大的哪些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過程或場域中？換言之，建築與都市計劃同樣作為一個與空間塑造息息相關的專業領域，其相似的關鍵構成在於：以預設的理念價值（例如：社會烏托邦）或理論方法（例如：田園城市、區域規劃）主導空間計劃的架構，介入、干預實質空間的營造與社會過程。正因為同時有著制度面的、教育面的專業體制，以及社區參與、市民參與、社會動員的機制，這樣的空間設計與規劃其實是一場政治過程，是介入社會的表現，並且是透過形式象徵表現的手段，圍塑出利益的競爭之地。

當代建制化的建築與都市計劃之專業領域，有專屬的制度法令、公部門專管的行政機關、學者與市民代表合組的審議委員會機制、專業者的公會組織與社團、專業教育機構與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考試系統，基本上，這樣的專業過程已經是一個近乎完整的系統化流程，從治理、審議、參議（參與）、辯護到實質面上的規劃與執行。理論上，這樣的流程控制了專業的功能與效率。現實上，這樣的結構將建築與都市計劃專業領域，在國家與社會轉型過程中，緊密鑲嵌在規劃政治、技術政治、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場域裡，並且在市民城市的社會過程、社區參與規劃設計的組織過程、都市的歷史文化保存和環境保護運動過程中，進一步突現了專業領域既有的系統中，審議、參議（參與）與辯護的重要角色，改變制度化了的專業領域的規劃設計流程，並且帶入治理方式及內容的檢討與改革。然而，這是在一個國家體制之內，偏重實務的都市計劃與建築專業領域，在實質面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狀態，同時，潛藏著國家與社會轉型過程中空間關係之隱憂。

專業代理

在專業主義之下，空間被界定由專業領域專門代理，原本是由空間中的勞動者所營造的空間經驗與建構的歷史，在專業主義導向的社會結構中成為專業者代理演繹的知識資本，專業在社會關係生產過程中的上層結構與下層基礎之間，成為一種新的、具有某種支配地位的（中產）階級，服務上層結構與支配下層基礎的生產。致使勞動者的空間生產反而更容易是在資本主義的剝削之下進行。因此，這種專業主義將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專業領域以壟斷的方式鑲嵌在國家管控集體消費與集體空間的營造空間政治、資本主義市場的生產與消費機制的操作式經濟、專業教育系統的內聚力與排他性的社會關係建構。

當全球化資訊網絡社會來臨，新國際分工的影響，跨國經濟與政治結構的轉型與轉變，削弱了國家的角色，強化了都市在全球都會區域發展趨勢下的重要性，在一切強調跨國合作的政治經濟之關涉過程中，都市計劃的專業領域面臨須跨越國家邊界的挑戰，國家與都市計劃專業領域之間的關係維繫在政策的研擬與實行，也就是說，都市計劃專業領域以一種實務與智囊的顧問角色，鑲嵌在國家層級的土地政策制定與經濟發展設計過程，在地方政府層級的都市管理與社會控制的規劃過程。但從都市運動的角度來看都市計劃專業領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治理術的規劃是都市計劃專業領域鑲嵌在更大的社會關係裡的方式，以威權、集權式規劃的空間治理術在都市的社會運動翻攪過程中，逐漸轉向以蘊含文化治理、自然治理的技術政治，介入多元文化的社會空間塑造。於是，近期的都市計劃專業體制逐漸浮現了文化轉向、環境轉向等等轉變，以及調節國家與社會之間轉型衝突的角色。

建築表現

相較之下，建築的專業領域更趨向於象徵表現的發展，都市成為建築的表現，客體化的建築脫離與社會空間、空間活動者之間的主體性，成為設計城市的名片，也同時成為迂迴而未成形的社會干預行動。在休閒社會狀態下，建築專業領域以一種專業品味的營造與專業技術的發明方式，鑲嵌在城市轉型的空間政治與觀光（房地產）投資經濟發展過程，設計是象徵表現的手段，建築是城市消費的動力。但從都市的居住權運動、公共空間的抗議行動來看建築專業領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參與式的建築計劃是建築專業領域鑲嵌在更大的社會關係裡的方式，保守封閉式的設計過程在資訊開放的社會網絡中，由於關係著空間利益的競爭，面臨市民社會的質疑與挑戰。建築專業體制逐漸顯現了種族、族群、性別、

階級、歷史保存等等文化轉向的影響，並在氣候與環境變遷的影響下，扮演建築行為與環境品質之間的策略性與技術性的角色。

承上所述，都市計劃與建築的專業領域圍塑出利益的競爭場域，規劃與設計實質上為一個兼具經濟性的政治過程，也同時是介入社會的表現，都市與建築是社會變遷下的產物。因此，從「空間的政治經濟分析」角度來看，台灣的建築與都市計劃專業領域同台灣戰後都市和區域發展的關係，之所以會以某些方式選擇性的連結或脫節於台灣的空間發展動態，關鍵在於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在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的環境條件為何？特別是對於都市計劃的專業領域同台灣戰後都市與區域發展的關係而言。也就是說，政治-經濟的環境變化是改變都市計劃取向的主要關鍵，而都市計劃以表現政治-經濟導向的規劃方式鑲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上。

反觀建築的專業領域與台灣戰後的空間變遷過程之間的關係，相異於都市計劃專業領域在空間變遷過程中的大尺度與變化速度上的表現，建築的專業領域與區域發展之間的變化關係是緩慢、保守、片片斷斷的脫節狀態。戰後所進行實質的建築營造，先是以一部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所草擬制定的建築管理法令，以及一群剛從中國幾所主要的現代大學（清華、中央）畢業的建築工程師直接在台灣實行。受到國際間興盛的現代主義與現代建築的影響，又在國族國家與社會的象徵重構之政治氛圍下，紀念性的建築形式成為威權體制介入社會的表現，設計的象徵表現成為社會接納與社會排除的政治手段，於是，出現了中國的現代建築、中國建築的文藝復興等等意識形態的表述。

當 1970 年代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引領民間中小企業的經濟活動之活力，因為建制化的專業體制，建築成為以中小企業模式發展的房地產經濟活動的制度性工具，引領中產階級的資本、激勵積累的機制設計。1980 年代，受到國際間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牽動社會的文化轉向影響，以及台灣的威權體制的權力削弱、本土論述的意識形態抬頭，建築的專業領域也同時在古蹟的保存與修復的制度建構過程中，浮現了鄉土關懷的建築形式上的表現。1990 年代以後，由於全球化政治-經濟佈局與新國際分工市場形成，一切固定的、層級的都改變了，在跨國企業運作體與明星建築師的出現後，建築的專業領域所面臨的挑戰是：在都會區域成形後，建築設計如何在區域創新與區域發展的空間塑造過程中，提供圍塑出創新氛圍的策略性設計，這種建築徹底的客體化並脫離與地方連結，而建築形式成為誘發各種經濟活動的功能性設計。

不過，當建築成為媒體，建築師的意識形態與建築專業體制之間出現了模糊性，這也就是說，建築的專業領域內部終於出現矛盾與衝突，長期與台灣的區域發展、空間的變遷過程脫節的本土建築師，在近期的國際競圖與開放的新自由市場的競爭過程中，因為頓失依靠而警覺到自身的危機，於是一些本土建築師們開始出現土撥鼠的行徑，試圖在寒冬來臨之前，耙掘土地之下的根莖，也就是說，一些本土建築師們積極移動到農田裡實現自己的建築，以表現（狹義的）地域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上反抗全球化佈局。從建構鄉愁的視角來看，是選擇與地方局部連結，從分配利益的勢力來看，是選擇與地方有所切割。

小結一 建築專業消耗殆盡⁶

以下利用 2015 年造成台北市政府都發局長林洲民與建築界大老們感情決裂的公宅統包案，一窺原本就根基脆弱的建築專業，如何在都市設計過程中，政府政治績效－建築開發利潤率－人民居住資源分配之間的利益與利害共構關係裡，消耗殆盡。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預計 9 月 14 日上網招標的東明里公共住宅統包案，是公部門主張，政府委託民間蓋公宅會有效率達成社會福利政策。這卻引來一些建築師私下的議論：「公宅」怎麼會「統包」給甲種營造廠規畫？「公宅統包」怎麼是都發局長畫完設計圖發包給營造廠？

將公宅／統包分開來看，「統包」是一種公共工程採購方式，而公共工程泛指工程、勞務、財務，不僅僅是硬體的土木建設工程，統包是基於最有利於公共工程品質或因技術與執行不可分割，而將不同類型的公共工程合併一案發包。主要由政府內部的採購小組根據公部門業務單位的需求，依照採購法選擇合宜的採購方式，規畫設計成一件公共工程採購案，供政府上網招標廠商，講白話就是，政府的採購小組依法規畫設計標案，協助公部門業務單位（例如：公宅案的業務單位是都發局），透過採購行政過程找到廠商來跟政府簽約辦事。

而「公宅」是由政府推動的「公共住宅」，本意不只是蓋新房子，而是出於抗衡今日居高不下的房地產市場造成台北居大不易的惡質環境，公部門積極介入改良居住環境的設計。理論上，應該同時從制度、組織、法令的訂定到實質執行建設方式的研擬，公私部門合作規畫設計出一套系統，能深入體察到居住者的

⁶ 本段文字修改前曾刊載於 2015 年 9 月 14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

特質與居住環境的特色，因地制宜，並持續檢討改進策略，不能是一成不變的 SOP。

公共住宅作為一種社會建築，要有別於以開發獲利率主導的民間建案所造成的高級化（縉紳化）排除，對居住環境的設計，要讓被房市壓迫的居住者，重新能營造社區生活的創造性，也就是說，政府不能像個短視近利的開發單位，到處拆舊屋蓋新房，要先看見在地特色與潛力，培力地方社區意識，一起營造社區生活，進而逐步設計環境。理想上，政府為維護這種居住環境的公共利益，積極干預房地產市場的作為，是公部門引導私部門，逐步實踐「人人安居樂業」的居住正義。

不過，當這種須要長時間的研究、磨合、推動的計劃，若顧及今日的政治效益，將「公共住宅」濃縮成一件件的公共工程採購案，讓公宅成了趕進度上市的建案，恐怕難以再理想化「公共住宅」為什麼還是一棟棟標上價格的新房子，與民間的建築開發作法差異不大。除了政府充當公宅的房東，先拿府庫財政墊公宅營建費和租金。

這次引發建築界議論的東明公宅統包案，將公宅的工程與勞務統包案非創舉，依照都發局官網的公告，前任市長任內已有公宅統包案。這次標案的公開閱覽文件洋洋灑灑，電子檔上百 MB，舉凡制式化的公共工程招標文件，以及先前專案管理者（PCM）的規劃評估和設計準則，包括今日都發局自製的東明公宅規畫設計圖（參考），鉅細靡遺，甚至透明公開參與本標案的評審名單，形式上作足了台北市長的透明施政工作。

那麼，建築師對「公宅統包是都發局長畫完設計圖發包給甲種營造廠」的質疑從何而來？

首先，這是一件不超過四家廠商的共同投標案，屬工程類公開招標，也就是說政府歡迎民間組隊投標，合乎資格的夢幻隊友是：甲種營造廠、機電工程公司、建築師事務所，以及其它（最好是口袋深的金主）。不過，熟悉公共工程與建築市場的建築師一窺此標案，便知其中隱憂出在招標須知及契約本文，招標須知第 12 頁：「不論投標廠商組成為何，均以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為代表廠商，且代表廠商所占契約金額比例，應為所有共同投標成員中最高者。」契約書第 14 頁契約價金調整第四款：「基本設計成果(含建築、結構、機電項量)核定前，應依都發局意見調整設計內容，契約價金均不予調整。」

依照契約，設計要照都發局（長）意見調整，也就是說，都發局已在招標文件中提供了本案的規畫設計圖（參考），廠商端的建築師如不照著畫細部施工

圖，反而危及其他共同投標廠商的時間成本、資金壓力。若連同招標須知，明定甲種營造廠為代表廠商，二者結合起來，講白話就是，本案廠商端的建築師實際上恐怕只能是甲種營造廠的下包。這不免刺中開業建築師說不出口的痛處：「台灣的建築師是繪圖員加橡皮圖章。」雖然，簽證建築師的角色與功能因此更明確化了，但建築師的專業獨立性卻是更模糊了。



嚴格來說，這項東明公宅的統包案不算是真正完整委託專業規畫設計含施工的統包工程，主導規畫設計者一直在府內，想投標的廠商心知肚明，蓋房子就是閉嘴、蓋章、作工、領錢。喊了很久的居住正義制度一直沒發生，都發局長大力宣傳的公宅，基本上是蓋新房子美化都市景觀，還是「台北好好看」的概念。

至於，有人問到，此案將來如何進行都市設計審議？或許這正是都發局(長)邀部分都審、都計委員參與本標案評審的用心與用處。畢竟，副市長已在 2015 年 4 月宣布，新的都市設計審議制度以快速通關為要。

今日，建築師「法」之於建築專業，如同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所言「這件斗篷會變成鐵牢籠」，這樣的發展造成人們對所謂的「專家」感到憤怒，幾乎就像韋伯在 1904-05 年〈新教徒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一文中所寫的：「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而空洞無效卻幻想著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⁷

⁷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ion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First published 1904-5), pp. 180-182. 原文翻譯節錄自夏鑄九 (2011) 〈三十年回首，反省向前—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一個批判性回顧與展望〉《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報》第十七期，第 32 頁。完整段落如下：「對於身外財富的關切，應該宛如輕落在聖徒肩上的輕斗篷，隨時可以甩掉。然而，命運卻注定這件斗篷會變成鐵牢籠…，今日宗教禁慾主義的精神…已經逃離了鐵籠。但是，得勝的資本主義由於奠基於機械根基，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沒有人知道未來誰會生活在鐵籠裡，或者在驚人發展的終點，是否會有新預言家崛起，或者是否會有老舊觀念的偉大重生，或者，如果以上皆非，是否會有一種在驟發的妄自尊大潤飾下的機械性麻木呢？在這種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也許真的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而空洞無效卻幻想者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三、空間營造—文化的抽象與具體



突然間，現代建築像掙脫一切束縛似的，什麼樣的建築都能出籠了。

—法國建築雜誌的刊頭語⁸

文化運動

1926 年底，一位美國學生記者正為自己的家鄉寫報導，他訪問了賓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林徽因，她說：「此刻正有一場運動，既不是盜匪，也不是叛亂，而是展示給學生和中國人看：西方文化中的技藝、文學、音樂、戲劇。但我們千萬不能以此取代我們原本擁有的！我們必須學習這些技藝的基本原則，只為了用來彰顯我們的文化，我們要學會構成永恆的方法。」⁹

1922 年二月，日本基督教牧師與社會運動者賀川豐彥來台灣，對蔣渭水這位年輕醫生與台灣總督府的台灣醫學生說：「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1925 年四月，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返台，參加蔣渭水主辦的台灣文化協會文化演講團，前往彰化二林庄舉辦演講，這裡正發生林本源製糖會社挾警力低價搶收甘蔗，與蔗農發生肢體衝突的事件。這些返台演講的台灣留學生，受到村民沿街鑼鼓喧天的歡迎儀式，當天的演講活動在一家碾米廠內進行，附近村莊的農民自動集結到碾米廠內外聆聽。專

⁸ 節錄自張寧靜（1985/07/04）〈建築的語言〉《聯合報》。

⁹ 原文為:Whei-yin Lin said, “There is a movement – not bandits, not rebellion – to show to the students and people of China, Western attainments in art, in literature, in music, in drama. But not to take the place of our own! Never. We must lear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ll art only in order to apply them to designs distinctly ours. We want to study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that mean permanency.” (This article had been published in *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 and *Montana Gazette* in 1926)

程來參與此次演講的葉榮鐘，眼見這種景象以為：「文化演講活動與其說是開通風氣、傳播文化，不如說是對無依無靠、飽受欺凌的同胞打氣的作用。」

一位研究文學與文化的學者伊格頓（Terry Eagleton），曾於千禧年如此說到：「從詞源來看，『文化』起初意味著一個徹底的物質過程，後來才轉喻為關乎心靈的事情。因此，文化一詞的語意延續描繪了人類自身的歷史轉變——從農村到都市生活，從養豬到畢加索，以及從翻土墾地到分裂原子。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文化的概念結合了下層（base）和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¹¹

當我們重新透過社會的、技藝的、政治的歷史脈絡去認識「文化」，反而會察覺到文化的反身（reflexive），不是表現在形塑、鞏固民族主義式的建築，而是我們參與社會中重新認識到的「我」，這是持續與已進行的、進行中的、未來的文化活動，產生斷裂與連結的創造性過程。這樣的積極性會從各方面對我們起作用，形成「文化反身性」（cultural reflexivity）。

文化意境—美的制度

1960年，建築師盧毓駿開始設計由張其昀創立的中國文化學院（即今日文化大學）的大成館，同時著手寫〈明堂新考——一個中國建築師想像中的中國古代明堂〉¹²。他於文章開端，以明堂作為象徵文明的建築，寫到：「中國古代學者盛稱明堂，仿若歐洲學者盛道：『希臘之亞哥拉（Agora）及羅馬之索朗（Forum）』亞哥拉與索朗均義為廣場，乃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公眾臨時集會之場所，且亦市民日常活動之中心；舉凡政治、祭儀、法庭與市場莫不在此。故當時是時城市建築美亦盡薈萃於斯，其重視廣場之營建實更有甚於其道者。近世歐美之早期都市計劃，可謂傾全力於創造美的城市，而以造成市民中心（civic center）為首要，尤以美國之城市為然，實亞哥拉與索朗之遺風也。」

盧毓駿認為文明古國莫不有其類似之物產生，明堂也符合他在《都市與區域計劃學》一書中表述的「人類尺度」（human scale）概念。「中國明堂，著稱明政教之堂，又稱明諸侯尊卑之堂。依前說，似若遠古實施『政』與『教』合而

¹⁰ 摘錄自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

¹¹ 摘錄自泰瑞·伊格頓（2000）《文化的理念》，台北：巨流。（林志忠翻譯）

¹² 〈明堂新考——一個中國建築師想像中的中國古代明堂〉一文收錄在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系友會於1988年8月出版的《盧毓駿教授文集》（壹），第102-131頁。

為一所必需之建築也。依後說，則屬行政中心之建築物，亦可謂宮殿建築之胚胎。」¹³他認為中國固有都市計劃之造形，雖無市民中心之名稱，其實有雷同的建築，就是明堂建築。

建築師盧毓駿的兒子，建築師盧偉民於 1987 年追憶其父設計文化大學大成館，說：「我認為他平生最成功的作品，並不是科學館，而是在陽明山華岡中國文化學院（現為文化大學）的大成館。…當時大成館的設計受古『明堂』建築影響很大，這是文化學院第一座大樓需要教室、辦公室、禮堂和圖書館。…他把二層高禮堂放在最中間，四周圍以辦公室和教室，又很巧妙地把圖書館和儲藏室放在留下的空間，三樓和四樓的教室像四合院地圍繞著一個中庭，這中庭也就是禮堂的屋頂。在四樓的四角還有大方陽台，整個建築陽光充足，有傳統精神，卻又符合新時代的需要。」¹³這是點出了大成館與明堂造形之間的相似性，同時暗示了盧毓駿將〈明堂〉一文作為大成館設計的精神（或旨趣）。

1960 年的盧毓駿正在思索如何創造一種屬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大學建築，並試圖衍生出一種「社會區中心建築」（community building center）¹⁴的原型。而轉譯中西古今建築形式的關鍵與動機，便是介入市民城市的公共工程（civic engineering）。

這種文明城市的建築概念不止於形塑視覺形式上的美，更是在市民集會場所上，將建築具體化成為一種「美」的制度。

1965 年 1 月 25 日《徵信新聞報》刊載了蕭鍾梅¹⁵寫的〈北平傳統建築的空間擴大感〉，她說：「因為建築是一個時代，一個地點的物質文明的技術能力，生活要求，審美時尚等的積累，是諸種條件的交織，當不能互相割席獨立的。所以談到建築，不必再要現代、折衷、古典等等字眼，只要做到適用、經濟、美觀便可以了。」她認為「對於傳統的認識，不是局限於個別建築的形體與細部上，而是在平面和空間處理上，去尋求那些匠師們所創造的意境。」這一篇投書是為

¹³ 節錄自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系友會於 1988 年 8 月出版的《盧毓駿教授文集》（壹），第 19-20 頁。

¹⁴ 這一詞參見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系友會於 1988 年 8 月出版的《盧毓駿教授文集》（壹），第 106 頁。

¹⁵ 原名蕭梅，成大建築系畢業，到東海大學擔任助教，當時的助教也必須負責授課。她開的課是「中國建築史」，後來蒐集全台灣的民居案例，編成了一本《台灣傳統民居建築》，由燕京哈佛學社出版。1966 年到台北工專土木科建築組任教（即今日的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前身）。

了寫給尚對北平傳統建築念念不忘的「長輩」看的，她提出：「建築的空間觀感大於真實尺度，稱為空間擴大感，它是創造建築意境的一種手段。……傳統建築，特別是園林建築，也正是在這『不盡盡之』、『不了了之』上苦心經營，創造一整套『不隔隔之』的手法。」



建築的空間對現代建築師而言，是營造一種文化意境的手法，認識明堂、園林的空間形制，是為了重構文化意境的抽象與具體，並以流動的空間反抗西方現代建築形式的壓迫。將這些建築師在智識與實踐層面的活動，放在社會視野之下，則可看見這樣的活動是一種擴張可能性空間的文化運動，而不是革命。

小結—建築自社會脫落

1969年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兼《建築與計畫》的總編輯漢寶德以〈建築雙月刊改刊辭—過去、現代、未來〉：「建築本來是社會的產物，要激起某一改革運動，一定要從社會改革起。」回應了1962年《建築雙月刊》的發刊辭〈我國當前建築之自覺運動〉：「建築如同其他一切的文化活動，是從充分的自覺始，只有自覺方能促成文化的有意識的創造。」

漢寶德的「建築是社會的產物」概念脈絡源自他大二暑假自修《空間，時間與建築》一書所認識的建築與社會文化的深層關係，他的建築觀先從「建築是社會活動的舞台」來看建築，在1971年提出「建築的精神向度」，接者是在1971年8月的《境與象》雜誌以編輯對話形式，從「大眾媒體與建築」來看這種建築形態取決於社會大眾喜惡的意象，前一年正是日本大阪博覽會中華民國館開幕。他將自己對建築的社會觀之轉變寫在1975年出版的《建築，社會與文化》文集的自序中提出「建築只是社會，文化外顯的形態」。

透過建築師漢寶德的視域，1960-70年代社會的變化遠超過建築師能掌握的工程技術，到了1980年代，現代建築師的建築夢是無法乘載現實社會活動的空中樓閣，建築之美只能是夢中的形式。他在自傳《築人間》中說1982年以後自己就遠離了建築，轉向生活與藝術教育，以及最後推動的全民美感教育。他相信建築的生產狀態取決於社會之上，在他眼中的社會意象是集體的意象，「要讓社會視建築為藝術，就必須是屬於他們的藝術」。所以為了讓改良建築生產的形態，使建築回歸藝術美學，重新營造建築師的創作空間，就必須改革社會對建築的態度，也就必須教育「他們」對建築藝術的欣賞能力，才可能改變社會，這便是漢寶德所寄望的「中產階級社會建築」。

然而，當這樣的社會改革初衷將「社會建築」轉化為生活與藝術教育、美感教育，放入今日台灣的教育體制內執行的現況，還是脫離不了化約成升學與就業的教科書與作品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台灣社會。



第四章

補述「大同社會」之夢



暗夜中，除了還亮著的台北、中國、台灣的旅社招牌字樣，眼前已經看不見任何房子的完整輪廓。破曉之際，一群女工戴著花布包覆著的斗笠扛著扁擔過橋進城賣菜，同一時間，在城市的公園裡男男女女運動著，路邊小販正炸著油條賣早餐，報童騎著鐵馬穿過現代化的社區送報，一位穿著改良式旗袍的婦人推開屋門拾起報紙往屋內走，而在城邊的山坡上，一群女孩們正在練唱吊嗓…。在城市裡，身體隨著移動的車子前進，眼前的景象也在移動著。

—白景瑞（1964）〈台北之晨〉（默片）

「民生才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才是歷史的重心。」

- 嚴家淦（1967）〈元旦文告－紀念開國與復興文化〉

（這句話出自孫中山於 1924 年 8 月 3 日在廣州演講的民生主義第一講）



未完成的表述

1924 年 8 月 3 日孫中山在廣州演講民生主義第一講，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我今天為什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谷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流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社會主義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我用民生主義來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

1924 年 8 月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了四講民生主義，按照原來的計劃，民生主義還準備講二次，即住和行的問題，後來未續講。隔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便過世了。

以花園城市復員社會

迎接抗戰結束後的第一個新年，1946 年 1 月 2 日《中央日報》第五版刊了一篇〈城市大革命－願錦繡山河處處建築成美麗花園〉，作者署名羅裕，文中提到城市大革命是以政府作為大營造廠，以整個政策、整片區域、整個設計，重建城市，並說：「我們的國家是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們的城市應該是要依據『民生主義』的精神的『農村化』的城市，能夠部分自給自足，有地方性的小工業區，小商場，不會給少數人控制。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人口集中大都市，釀成嚴重的『農村破產』。」我們的城市革命的理想城市，是美麗而適合現實的現代化農村都市。一個城市至少要有一個圖書館，一所醫院，一個公共體育場和一所中學，餘如抗

戰紀念堂花園等也不應或缺。工業區不應該超過八層樓，商業區及旅館不應該超過十至十二層樓，至於摩天大樓，我們是不需要的。這樣的花園城市大革命正是跟從美國考察回來的城市設計運動（the city planning movement）同步，另外，政府協助人民蓋合作公寓（cooperative apartment）也是時下需要且摩登的。



這是國民黨報《中央日報》在戰後復員社會的宣傳中，首次明確以花園城市作為民生主義城市的藍圖。

總裁辦公室

1949年元旦文告，南京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在文中暗示將引退，另在計劃引退之前，已任命陳誠接替魏道明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並派蔣經國安排引退到台灣事宜。6月25日蔣介石電報廣州中央黨部秘書鄭彥棻，決定7月1日在草山設置「總裁辦公室」，8月1日總裁辦公室正式在草山開始辦公，草山亦改名為陽明山。總裁辦公室下設九組一會，就功能而言，一為協助總裁決策，初名「顧問委員會」，後改稱「設計委員會」。二為辦理業務者，初分黨政、軍事、新聞、警衛、研究、人事、總務等七組，後來增加經濟、秘書二組。

第一組掌管黨務，組長谷正綱、副組長蔣經國、秘書談益民。第二組掌管經濟，組長吳國楨，後來在12月16日吳國楨取代陳誠的省主席一職後，由嚴家淦接任第二組組長，無副組長。第三組掌管軍事，組長王東原、副組長唐君鉞、參謀為周菊村、于豪章。第四組掌管宣傳，組長董顯光、副組長沈昌煥、秘書虞超。第五組掌管國際問題研究，組長陶希聖、副組長蔣君章、秘書費慶楨。第六組掌管秘書業務、文書處理、檔案及冊籍編輯，組長張其昀、副組長周宏濤、曹聖芬、秘書為葉實之、張廷楨，另有編審張乃藩、石劍生。第七組掌管情報，組長唐縱、副組長張師、秘書塗壽眉。第八組掌管警衛，組長施覺民、副組長樓秉國、秘書李畹秋。第九組掌管總務及醫藥衛生，組長陳舜耕、副組長黃寄慈、秘書陳元。此外另設秘書主任黃少谷，總務主任俞濟時，辦公室秘書李士英、周靈鈞。設計委員會主要工作包括主義研究與各項業務執行方法設計，指定成員包括王世傑、俞大維、張道藩、俞鴻鈞、吳國楨、胡健中、方治、余井塘、雷震、端木愷、任卓宣、葉公超、徐柏園、羅時實。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布復行總

統職權，並改以「蔣中正」為官方使用的正式名稱。3月31日總裁辦公室結束，原九組業務工作分別併入中央黨部、非常委員會、總統府等組織。¹

其中，總裁辦公室的「主義研究」編輯計劃仍持續進行，這項「主義」的詮釋寫作始於毛澤東與蔣介石二人之間的權力之爭。

1940年毛澤東出版了一本《新民主主義》，標誌著中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相應的具體政策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體系。而1943年蔣介石利用陶希聖寫作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激發中國人在外敵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樹立其領袖地位，而提出的一套系統的建國方略，為他在中國戰後地位做準備。另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的開幕詞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標題，他說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這本書就是《論聯合政府》。²

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北大教授、《中央日報》主筆陶希聖，進入總裁辦公室後，繼續為「蔣中正」撰稿關於主義研究的內容。依照陶希聖的兒子陶恒生在2008年追憶其父在政治上的執筆，除了《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還有《民生主義育樂篇》。³

但，為什麼國共兩黨原本爭論的民主與自由的主義路線論述，到台灣後的蔣中正會選擇「育樂」（recreation）來持續主義的路線論戰？傳聞是蔣中正接受了宋美齡的建議：給老百姓生活育樂，才能獲得群眾支持，鞏固領袖地位。

補述民生主義

1953年出版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是一部前所未有且僅在台灣發展的工業社會假說，或者可視為一部民生主義社會的政策性規劃的導言，其基礎建立在孫中山修正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社會主義論點上，但從未被放在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和都市計畫的研究討論中。這篇《補述》的官方作者—蔣中

¹ 本段文字參考比對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第202-204頁。以及邵明煌根據唐振楚的《總裁辦公室工作紀要》所撰的稿〈風雨飄搖中的柱礎—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之成立與結束〉。（詳黃埔軍校網 <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jhnz0006.html>）

² 本段文字參考並節錄自李楊和范泓合著（2008）《重說陶希聖》，第213-215頁。

³ 詳陶恒生為李楊和范泓合著（2008）《重說陶希聖》寫的序言，第11頁。

正石，和傳聞中參與實際撰稿人一張其昀和盧毓駿，三人都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25-1948）這個特殊的軍事組織有關，而這篇《補述》內文跟張其昀擔任教育部長前後的工作內容緊密相關，也跟中國文化大學建築既都市設計系創系主任兼校園建築師盧毓駿移植柯比意的現代都市計劃藍圖有關。



《補述》引人關注的重點並不是上溯至 1924 年在廣州發表的「三民主義」，依循儒家哲學正當化由孫中山到蔣中正、蔣經國的世襲政權。更多是由於這短短四個章節的概要，在台灣的國民教育課本內超過 40 年的時間，至少已讓 1950—1990 年代初期受教育的中小學生，都能朗朗上口「食衣住行育樂」的安康生活想像，民生主義育樂至上的思想透過如此平常的管道，融入台灣人的生活，比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或其他思想，更深入台灣社會各階層。

《補述》分四章：序言、育的問題、樂的問題、結論，建立「民生主義社會」的藍圖，將「民生育樂」制度化、社會化和空間化。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假設，當中以健康和疾病隱喻農業和工業社會的城市差異，並將學校教育界定為終身學習一致性的職業教育，以持續供給工業所需的勞動人力，也為這樣的社會，描繪了「花園城市」（Garden City）和「光輝城市」（Radiant City）合體的「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田園城市」都市意象，以邁向「大同社會」之夢。

都市建設就是經濟建設

1966 年，蔣中正與嚴家淦就任中華民國第四任總統與副總統，宣布全面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同時，副總統嚴家淦兼任行政院長成立新的財經內閣，進入台灣的第四期四年經建計劃與十大公共工程建設。今日的學者認為，這是戰後台灣的技術官僚體制，在 1965 年 6 月結束美援計畫前後，實質推動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時期。

1966 年的 10 月，台大工學院都市計劃教授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盧毓駿提出〈國父實業計畫都市建設研究報告〉⁴（《建築都市計畫與文化》第一期），這是 1940 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核准盧毓駿參與編擬的《都市營建計劃綱要》作為國家的都市計劃原則之後續工作。〈國父實業計畫都市建設研究報告〉文中定義「都市計畫即經濟計畫」。這是什麼意思？對照《補述》第一章

⁴ 以下標楷體引用文字除了節錄《補述》的對照文字外，節錄自盧毓駿（1966/10）〈國父實業計畫都市建設研究報告〉，本文收錄在《盧毓駿教授文集》（貳），第 94-109 頁。

序言第二節第一段「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移」，開宗明義說「民生主義的主旨，在發展實業。」而實業便是工業，在這裡的工業社會便是以工廠為中心的城市。所以「機器工廠設在城市人口集中的地方，便容易得到工人。」市民即工人，而都市計畫即經濟建設，是開馬路、建港口、蓋工廠，一切只為「機器生產事業（即製造業）發達了，必將有百數十個大城市發達起來了。」



於是，戰後的政府與民間在田中央、市中心蓋工廠，以及客廳即工廠都是其來有自，當時這是想像富裕的工業化社會，上行下效，老百姓並不容易查覺這有什麼問題，因為《補述》中一再強調窮苦是懶惰的惡果。

盧毓駿又說，實業計畫之發展自然引起都市建設之需要，其中，國父（孫中山）對於熟知之都市如廣州、南京、鎮江等提出具體指示，例如：「新建之廣州市應跨有黃埔與佛山，而藉以車賣砲台及沙面水路，此水以東一段地方應發展之以為商業地段，其西一段則以為工廠地段。」「廣州附近景物特為美麗動人，若以建一花園都市，加以悅目之林園，真可謂理想之位置也。」他想像孫中山心中有個花園城市的畫面，如紐約、倫敦或費城等，如同他的心中有著柯比意的理想城市—巴黎，這都是為了經濟建設所移植的都市建設藍圖。

接著，他舉了實業計畫的居室工業「以預定科學計畫建築中國一切居室，以合於近世安適方便之式，乃勢所必至。」這裡的近世安適方便之式，白話文就是讓工人方便居住與上工、經濟有效率的標準房子，但不包括老闆、大官、建築師的自宅。這樣的居室工業如何成為經濟建設？標準化（即系統化）、制度化是關鍵。他以為這是作為政府興建與提供國民住宅的根源，進一步提出制定「住宅法」做為各級政府據以實施國民住宅政策之依據。

盧毓駿在結論中強調，「實業計畫是現代都市計劃理論之藍圖」。從技術官僚的角度來看這個結語，現代都市計劃便是配合經濟建設的工程、制度工具、賺錢工具，期望最終能達到《補述》中的大同社會之「富則同富，樂則同樂」，實際上卻是停滯在《補述》中的小康社會之「富者恆富，樂者恆樂」。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補述》本質上是一種軍事邏輯下的政治手段，從統治者的視角來看，全民皆工與全民皆兵是一樣的統治管理作為。而真正將《補述》全面具體落實為一種制度的的是面對國家社會現實處境的技術官僚。這樣的轉型關鍵是在 1963 年

底，副總統陳誠辭去兼任行政院長，改由財政部長嚴家淦接任行政院長，而這一年的9月，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改組為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1965年4月，行政院長嚴家淦在臺灣省行政座談會議中以「建設台灣光復大陸是我們的基本國策」為題，正式宣告「實施都市平均地權」及「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為行政院工作重點。⁵同年6月19日嚴家淦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歷史檢討會上致詞，再次宣達「建設台灣，光復大陸」為行政院制訂施政方針。⁶全文分為政治建設、軍事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五項，其中，社會建設最為具體，他將社會建設視為政治建設的一部分，指出行政院院會剛通過一個決議案，頒布「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生活實施方針」，準備全面實施「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內容包括：社會福利政策、勞工政策、社區發展政策、合作政策，以及鄉村與都市建設政策等。文末更強調《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使民生主義體系完整，並可看見民生主義的社會政策全貌，是這個階段的國家總體戰體制內所則要實施的重點。此後，《補述》的民生主義建設成為行政院主要政策設計與政令宣導的核心概念。

1969年9月20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在對國軍第十四屆軍事會議全體出席人員致詞⁷，同樣列席的人有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國防部長以及參謀總長。這篇致詞稿中開場白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以達成「全面性」的國家建設工作，講稿的架構是將《補述》內容更具體對應上這時候的國家建設，包括國防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教育文化建設、經濟建設。對於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移，他強調農工並重、均衡發展下，人人皆是有用的勞動力，但同時舉了一個統計數據是1965年之前國民生產毛額是農大於工，之後是工大於農，這是在國際貿易關係下，以產品出口貿易統計數字來看待「國民生產毛額」，以及判斷工業化是必然的經濟發展趨勢，並且必須面對電力發展的重要性，於是接下來須建立核能發電廠，因為百分之八十的電力是用於工業，也就是說，電力發展代表了整個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他轉化《補述》內容中「全民皆工」的概念為「人力發展」的政策，國民教育與家庭計畫皆是提高人口品質，最終讓人人皆成為可信賴的高素質勞動力，提升國民生產毛額。

⁵ 參詳國史館嚴家淦資料庫言論集，嚴院長於五十四年演講詞暨書面致詞：2. 臺灣省行政座談會致詞。

⁶ 參詳作者於2015年編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245-260頁。

⁷ 參詳作者於2015年編的《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第205-216頁。

1970年7月24日的台北市市政工作會議上，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表示：1967年台北市改制，中央要把台北市建設成為一個不但安寧的、健康的，而且具有發展性的現代化都市，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在此之前，中央政策是將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如嚴家淦於1963年12月14日行政院長交接典禮上致詞：「今天台灣建設成為東南亞最安定的地區，成為西太平洋的最堅強反共堡壘，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成為大陸同胞爭取自由的燈塔。」

8

兩個城市之夢—大同與小康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補述》在結論中引用《禮記》〈禮運篇〉的「大同」，轉譯為民生主義建設的第一個城市之夢—「大同社會」。

這樣的大同社會經濟制度是「貨不必藏諸己，力不必為己」，生產是努力開發資源，以養民為目的，勞力是社會服務而不是工資勞動，經濟制度是以合作為基礎，以服務為目的。大同社會的社會制度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有人一輩子都受到國家的保護和社會的救助，這就是福利社會。大同社會的政治制度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民主國家主權平等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成為「天下為公」的永久和平世界。

《補述》在結論中又引用《禮記》〈禮運篇〉的「小康」，轉譯為民生主義的第二個城市之夢，是在大同社會之前的小康社會。

這樣的小康社會經濟制度是「貨力為己」，貨物為自己的利潤而生產，勞力為自己的工資而作，企業家追求利潤，勞動者追求工資，成為一種自由社會。如從自由競爭發展為獨占資本制度，造成不平等競爭，使得少數人獨占社會的財富，多數人陷入困窮的境遇，社會變亂必由此而起。小康社會的社會制度是「各

⁸ 參詳國史館嚴家淦資料庫言論集，嚴部長言論集:10.交接典禮上致詞。

親其親，各獨子其子」，這是以家族作為社會基本組織，有安定的家族就有安全的社會，有安全的社會才有安定的家族，當社會流於不平等，則家族也會瓦解。小康社會的政治制度是「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這是指君權之爭，謀用是作，兵由此起。



《補述》結論所轉譯的兩個民生主義城市之夢，一個是人們終日想望的明日城市，另一個是人們終難逃離的現代城市。

建造紀念堂

1975年4月14日星期一，中國時報記者周天瑞專訪中山樓建築師修澤蘭，標題是「中山樓從藍圖到營建完工，完全出自蔣公精心設計，修澤蘭推崇領袖英明，為天生偉大建築家」文中說明，中山樓的前身是國防研究院蓋給蔣中正的一處行館，後來是蔣中正想改成一處會議館，由1950年國防研究院張其昀引薦了修澤蘭去替蔣中正畫圖，在四、五年的設計過程，蔣中正屢屢召見修澤蘭批示改圖。修澤蘭回憶1966年10月蔣宋美齡回國，蔣中正神采飛揚地在工地現場向夫人解說設計，蔣宋美齡回他：「蠻好的」。1966年中山樓落成之日，蔣中正正在蔣宋美齡陪同下，於中山樓宣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全面展開，並任命自己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長。

1975年4月13日蔣中正過世，緊接著政府宣布籌建紀念堂與辦理建築設計競圖，許多建築師提出方案，最後獲得設計權的人是設計1960年代中國宮殿式中華民國館的建築師楊卓成，設計式樣是一處藍瓦白牆的中正紀念堂，二翼分別是黃瓦紅柱的音樂廳與劇院，據說這是蔣宋美齡認為屬於蔣中正的建築風格。1980年4月中正紀念堂落成啟用典禮，報社用「育樂」來報導這棟建築與蔣中正的一生，中正紀念堂無疑是設計給蔣中正的《民生主義育樂篇》之紀念碑。

然而，真正完成這個紀念公園的場所精神是抗爭。

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1989年8月一群小學老師號召市民夜宿忠孝東路集體抗議台北市房價高漲，市民無屋可住，一些大學教授也加入這場無殼蝸牛運動。1989年9月26日無殼蝸牛的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在中正紀念堂前廣場，舉行百對無屋佳偶結婚典禮，搭帳棚象徵無殼蝸牛的洞房花燭夜，嘲諷紀念堂的崇高與華麗。

1990 年，歌手沈文程發行音樂專輯《1990 台灣人》，主打歌〈1990 台灣人〉的第一段口白便是無殼蝸牛運動：



無殼蝸牛置咧街頭抗議，伊講想要租嘛租抹起。

若照這款薪水來買厝，嚙吃嚙喝嘛著愛等幾十年。

市長大人叫咱大家不要著急，將來攔有國民住宅等著你。

我講市長大人感謝你的好意，到時請你派人來阮墓前通知。

1990 年 3 月 20 日上午 10 點，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講《解讀中正紀念堂》，現場擠滿了學生與市民。此刻正是一場從 3 月 17 日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門前圍牆邊開始的群眾運動，逐漸移到中正紀念堂前廣場靜坐、喊口號、唱歌、演講，表達民主改革訴求，最後以野百合為民主象徵的三月學運。演講中，夏鑄九說：「中正紀念堂不是一個靜態的空間對象，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它可以做多重解讀。中正紀念堂作為一個城市中的文化造物，其實是一種偽正文（pseudo-text），它不只是紀念堂而已。」他說，這裡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軍營，也是戰後的聯勤總部與陸軍總部，是台北市作為一個殖民城市時，殖民者表現軍事與政治支配關係的中心，也是戰後作為戰時首都的台北市表現中央政府威權與維持國族國家正當性的中心，這樣的空間是「意象化的支配性意識形態」。更準確地說，「建築是社會與歷史所界定的空間，然而它並不等於政治，我們必須處理空間實踐的特殊性，處理意識形態中介的過程。」⁹

三月學運過後，1990 年 6 月 12 日《中國時報》大版刊登了二篇文章〈不中不正，麻煩多多？中正紀念堂風水趣譚〉〈政治歸政治，建築歸建築—中正紀念堂建築師楊卓成談當年內情〉，作者認為三月學運是中正紀念堂其中一個禍亂，邀了中華民國易經學會理事邵崇齡替中正紀念堂看風水，風水的結論是「大中至正門」為「辰山戌向，丙辰分金」在正八方向上，結果「名不符實，象術不合，必生事端」，以及「兩廳拱位沒拱好，不能輔佐主人」、「鎮獅太小，造成奴欺主，當面豎旗也犯了大沖」、「大八卦無力發揮，黑色屬水與屬火的中正紀念堂正好相剋」。作者將此設計之禍告知中正紀念堂的建築師楊卓成，他力圖辯解這

⁹ 節錄自 1990 年 4 月份《雅砌》雜誌第 52-53 頁。

些設計要求都是委員會告知的，要作者去問當時在委員會裡的李登輝與蔣彥士。最後，楊卓成說：「其實政治歸政治，學生在廣場裡鬧，我也蠻遺憾的，不過我蓋中國的東西不要牽扯到那一方面去，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了，不過若我當時就知道大中至正門偏了一點，我會把它蓋正的。」



這實在是個政治風水將建築打入形式牢籠的荒謬笑話了。

建築要成為真正屬於人的地方空間，大概就是台大教授夏鑄九在三月學運中的演講結論所建議的：「中正紀念堂的空間不一定只有拆除一途。這是勞動者的成果，拆了太可惜，即使拆了中正紀念堂，並不表示真正能去除封建神話與父權關係的影響。我們只需要小小的改造，就可以重新界定它的意義。我們只需要把它變的再開放一些，再平和一些，再親切一些，成為一般人日常生活得以享用的歡愉地方。」¹⁰

而勞動者的社會動員就像黑手那卡西唱的台語版《國際歌》，起來！《補述》裡的工人、窮人、女人從大同小康之夢走出來，以歌聲幹譙「福氣個屁」。

鬥陣，做工的兄弟姊妹！鬥陣，全世界歹命的人！

欲創造幸福的新世界，咱就愛團結起來。

資本家，剝削咱的血汗，緊起來反抗甲伊拼；

毋免驚頭家按怎鴨霸，工人鬥陣力量大！

這是工人的天下，團結起來，勞動者；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這是工人的天下，車拼相挺，向前行；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毋免求耶穌阿彌陀佛，嘛免望總統皇帝；

勞動者創造人類一切，天下原本工人的！

資本家，剝削咱的血汗，緊起來反抗甲伊拼；

毋免驚頭家按怎鴨霸，工人鬥陣力量大！

這是工人的天下，團結起來，勞動者；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這是工人的天下，車拼相挺，向前行；INTERNATIONALE 鬥陣就一定贏！

正是此刻，這個屬於所有人的公共空間之場所精神，終於鮮明了。

¹⁰ 節錄自 1990 年 4 月份《雅砌》雜誌第 56 頁。

小結

承續前三章的表述，再想想「建築是特定社會的產物」，或許是因為孫中山、蔣介石等人都作古了，台北市中心只剩下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連大中至正門都改成自由廣場了，空間氛圍改變了，使得我們過於專注在彌補戰後台灣的現代建築師，為他們立碑，還冀望能藉此修補今日的都市歷史地景，結果都忘了戰後台灣的社會建設背後存在過《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這份腳本。花園城市的工廠、監獄、教養院、醫院、學校、科學館、美術館、體育館、電影院、旅館、公園等等全是《補述》中設計來解決育樂問題的建築，以及建構全民皆工的大同社會所需之公共空間。

若僅視《補述》為延續 1930-40 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或是後來防堵 1966 年中國大陸文化革命的反共政治文宣，就會太快略過了《補述》所營造出的政治經濟空間與現代建築移植的關聯。正因為戰後加速台灣經濟發展是國家唯一的生路，現代化的發展和《補述》之間的連結，一方面是將土地和稅制緊扣在一起的經濟建設，從政策面開闢出一條條開發都市土地、加速資本累積的便道，加速了經濟社會的轉型。二方面是連貫各層級的教育環境一致成為職業技能訓練，持續提供市場優質的勞動力，這也表現在台灣建築師的工程教育基調。無奈長期以來，改善台灣的工業投資環境，一直顯得比改善人的生活環境更重要，建築也就順著這樣的時勢生產。直到今日，我們仍不斷從一個夢醒來到另一個夢。終究，《補述》所勾勒的大同小康社會只是都市幻影，這讓《補述》成為今日研究戰後台灣現代建築的重要取徑。



結論

移植現代性



建築是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它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思想意識與習俗風尚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經濟的繁榮或衰敗、對外戰爭或文化交流，和敵人入侵等都會給當時建築留下痕跡。孤立去研究建築本身的發展演化，那樣我們將無法了解建築發展的內容，不能得出任何正確的結論。¹

—林徽因（1954）

如何看現代建築與如何閱讀文學有點相似，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如何閱讀文學》（*How to Read Literature*）²一書的第四章〈詮釋〉的第一句：「當我們把某件作品稱為『文學』時，我們指的是這件作品不會受限於某個特定脈絡。誠然，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從特定環境下產生。」而現代建築的關鍵正是特定脈絡與特定環境的詮釋。

移植

「移植」是 Transplanting？還是 Transplanted？結論是前者。

一個被科學界廣為採納的「移植」技術，算是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從旁成就了 20 世紀的現代性地景的濫觴，原本這是 15 世紀隨著解剖科學展開的生命工程計劃，目的是去延續生命，將一個身體的一部分，移到另一個身體裡，取代後者不再適用的部分，讓原本的功能持續運作，生命得以延續。這種科學理性的假設是將身體當成機器一樣的組合物，成為科學家眼中沒有主體的客體。

¹ 文字節錄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林徽因建築文集》的〈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第 13 頁，該文原載於《建築學報》1954 年 12 月第 2 期，發表時署名：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作者認為這一段建築觀點是林徽因寫的。

² 原文書於 2013 年由 Yale University 出版，中文翻譯版於 2014 年由城邦出版，翻譯者為黃煜文。

選擇從科學措辭切入「移植」一詞，而不是從植物學的詮釋開展，雖然目的都是為生存而設計，但更接近現代建築師從機械複製美學建構建築與社會關係的脈絡。不過，移植的操作手法被二十世紀的空間規畫者挪用在空間生產上，其特徵是系統化、體制化生產，其效力是在現實中運作、調整和諧。如同支配性空間經驗的現代性，都是創造性破壞，這種破壞在科學家與工程師眼中，是提升生產效能必要付出的消耗性成本，甚至會鼓勵科學家與工程師移植更多理論技術，以達到和諧的運作。

移植的社會作用

彼得·霍爾（Peter Hall）從移植的概念批判了現代都市計劃的「明日城市」意象，他認為都市規劃從十九世紀末面對工業社會浮現的貧窮場景開始，今日又回到一個更複雜的、更隱晦的（elusive）資訊都市隔離下的貧窮狀態，這是資本主義都市危機的歷史循環。他說，「1900 年的先驅人物關心生活的“標準”，他們的後繼者在 2000 年後談論著生活的“品質”，物質條件已經如此大幅度改進，使得更高層次的要求出現在政治日程上。這種生活品質的主要內容是要求有力的社會控制，而在這中間，規劃是關鍵。」這種後殖民的規劃是為了保護好優勢者的環境質量，創造與維護優勢集團專屬享用的時間與空間，貧窮已經成為都市中富有的一邊認定等待救贖的原罪。荒謬的是，都市官僚制度下的規劃者，追隨的都市規劃理念源自 19 世紀末，無政府主義者反都市化過程的行動。

許多 20 世紀的都市規劃是被去歷史和去政治的閱讀，成為「少數被建構為中心思想的理念，一再地迴響、再循環與再連絡。」這意味著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被以一種宛如神授、天啟式的引用，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環境中、以不同的機制實施，這就是「移植」的神話。理論規劃的移植效應尤其表現在社會變遷的地景，正是在異時、異地的特定社會政治氛圍下，經由政治（政府）、經濟（市場）、教育（學院）的制度化系統，介入實質營造空間的關係，並置入空間塑造的知識與權力。當移植的規劃理念不完整，僅僅是形式上的挪用，實施的結果往往是離奇的、甚至是災難的塑造了建築空間與社會狀態之間的斷裂。珍·雅各指出這種聲稱改善都市生活的規劃，荒謬承襲了「反城市」的規劃理念，正是破壞城市而非認識城市。

我們從時間（自何時開始）的邊界跨過空間（在何處發生）的邊界，得見歷史和建築的決定性關係，並非是察覺到何時開始出現新的規劃理念與實踐的具



體事蹟，而是在規劃之前，因為社會場景顯現出底層貧窮的一面，帶給菁英階層的恐懼所引發的種種反應，換句話說，這種恐懼被歸納為資本主義都市遭逢的主要危機，於是都市的規劃系統開始啟動社會控制。這種社會控制最常見於文化殖民的都市結構，規劃系統是表現特定社會的政治氛圍，並控管經濟生產與分配，經由建築與都市計劃形塑象徵都市的徽章(emblem)，傳達一種時代精神(zeitgeist)。在這種都市空間裡，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性(modernity)、現代主義(modernism)與現代(modern)皆是建構具有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的文化霸權(authority)。這是表達出社會狀況在專業者的規劃與設計理念之前，早已經影響空間生產的權力關係。

非正當性支配的效力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關注城市形成和衰敗的歷史過程中，他所看見的「共同體」，再現了城市與城市的空間關係歷史裡，同時存在正當性與非正當性支配之間的權力關係，城市的形成不只是經由貴族和菁英集團在政治與經濟層面的運作，更大的關鍵在於非世襲的「市民」所營造的社會空間生產趨力，這是有活力的城市所表現出來的「共同體」特徵，市民不只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下的合法身分，而是具有經濟能力並取得社會權利的城市成員，這種市民的能動性緊密關係著城市的空間生產，如此構成的市民社會，持續透過空間生產關係，建立認同和差異，形塑市民城市的非正當性支配力。這便是平民住宅的問題其實是安居樂業的問題，也就是社會共同體。

反觀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分析社會運動對都市規劃的抗爭行動，所產生的都市結構變化裡，浮現了形塑各種領域的都市過程，其中，反叛的社會行動是透過挑戰既有的認同，建立另一個領域的差異。從非正式城市是一種起因於社會利益和價值衝突的社會產物來看，都市中的抗爭行動，或者「社會運動」的根源，正是韋伯提出的「城市共同體」的對立面，但更積極表現出市民在都市化過程中的能動性，甚至是基進的反叛性。這便是「保存」作為一種集體面對都市問題的社會抗爭行動。

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以資本的空間修補之概念，分析勞工及其工會組織對抗都市發展壓迫下，從依賴到迫遷的空間關係轉變，重新認識實質的空間生產，終究是在資本擴張的支配性力量下，表現在都市地景變遷的中心化和邊緣化。這種「戰鬥」的現代性是落實在「城市共同體」和「社會運動」之間，非

正當性、非正式且草根的空間生產。這便是「公共私有化」的資本壟斷終將會激化都市衝突空間的形成。

於是，「社會」終究是現代建築流失與回歸的特定脈絡、生產與再生產的特定環境。



物與論述的空間營造

面對每個人對地方的記憶，同時是大量的創新和遺忘，有一種說法是兩極化的現代性襲捲了 20 世紀以降認識世界的方法，這也包括我們如何看見 20 世紀之前的社會場景，甚至是如何辨識自身承襲的傳統特徵，關鍵在於知識的建構和翻譯，尤其是在建構認識方法的層面上。其中，「論述」既是表現兩極化（知／無知）的現代性，也形塑了一部分現代性的歷史。

首先，「論述」表現在詞和物的生產關係上，透過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解構非連續性的歷史結構，是一種極大化了的知識權力。藉此，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 批判了一些操作式的建築評論，是史家或建築師明知故犯去玩弄論述的歷史建構。他見到 20 世紀中期以前的現代建築，是一種寓示階級差異的建築美學，而歷史的現代運動所成就的現代建築 (師) 貢獻，不過是現代主義者操弄現代建築論述的歷史，換句話說，評論史家和建築師都是在認同的危機中進行歷史的空間生產，烏托邦式的現代建築正是這種意象化了的支配性意識形態產物，面對這種建築的現代性，要先進行階級批判。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接著傅柯批判論述所建構了知識權力，轉向質疑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與其知識構成的問題上，他將知識分子放在一個影響公眾認知與代表公眾發言的社會位置，甚至，知識分子的角色存在語言中，也就是在論述裡，特別是形塑公共性／公眾性的論述語言。馬克斯·韋伯曾以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中立之說，批判過這種知識份子佔據的講堂具有神學院般的言論支配權力。正是如此，論述的知識權力緊扣著經由學校系統形塑的教育結構，於是，建築史家關注到現代建築和現代都市計劃存在於建築學院內的論述語言中，甚至像曼弗雷多·塔夫里 (Manfredo Tafuri)、珍·雅各 (Jane Jacobs) 等人，直言不諱都市問題來自規劃專業學院轉譯了各種規劃的弊病，以及有越來越多的批判研究，注意到建築學院和現代建築、現代都市計劃之間的共生和衰敗的趨勢。

空間的形勢

現實一直是我們與世界之間的接合關係，我們無法擁有現實，但現實對我們的空間生產有極大的支配性，現實從何處生成？「現實不是以一種問題出現，現實完全是由趨勢產生的」，這是法國漢學家余蓮（Francois Jullien）的看法，在 1992 年出版《勢 - 中國的效力觀》（*La Propension des choses*）表述「勢」，既是位置（position）、情勢（circumstances），也是權力（power）或趨勢（potential）。甚至是有策略地運用勢、發展勢（propension），使其產生最大的功效。這也就是「造勢」，既是人的活動，也同時塑造出空間，清楚傳達了支配性意識形態干預的空間生產。正是由於「勢」的概念出自我們的文化脈絡，更能介入我們經驗的社會空間轉變。

於是，勢（conjugation）是動態與靜態變化同形的異質空間，現代建築便是這樣的異質空間，也就是一種空間的形勢。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看懂了論文一開頭切入的中華民國館，既是一種由趨勢產生出來的建築形式，也是在現實中轉變為具有形勢效力的現代建築。同理，論文中出現過的建築都曾經是，當然也包括文末的中正紀念堂。

結語——一個城市，兩個夢

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不幹建築師的政治漫畫家 CoCo，在 1989 年畫了一幅的政治漫畫，一個少年左手拿著一顆寫著「我的未來不是夢」的氣球，瞪大眼睛站在崩壞的環境裡，想著這是「我的噩夢」。³微妙地、非巧合地描繪了今日這份論文下結論的語境。



圖 20

³ 截圖自 1989 年時報文化出版的《時報漫畫叢書 5: COCO1988~1989 政治漫畫》，第 173 頁。

後記

夢醒台灣之文化反身性



這類現代生活，豈是為我？This type of modern life, is it for me?

這類現代生活，豈無代價？This type of modern life, is it for free?

—節錄自瑪丹娜 Madonna (2003) <夢醒美國> (*American Life*) 歌詞

逆行，夢醒

2001年夏天，我剛進耶魯大學建築學院讀書，這一年的9月11日，紐約時間上午9點左右，媒體即時轉播了紐約市中心雙子星大樓（Twin Tower）先後被二架空中巴士撞毀的畫面，當時我在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設計的建築學院大樓的工作室裡做功課，身邊的美國學生對著電腦畫面咆嘯「這是美國的一場惡夢」。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學校輔導室持續發信給全校學生，要求大家冷靜，別仇視或攻擊亞洲學生，並發信給亞洲學生，建議接受心理輔導，校園裡族裔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著。

這年年底，中國大陸政府再次對台灣政府放話不放棄對台獨動武，美國同學問我擔不擔心家鄉安危，我回他：「台灣維持現狀不正是美國控制中國的政治手段嗎？」

2003年，我從耶魯大學畢業前夕，美國歌星瑪丹娜出了新專輯《夢醒美國》，美國學生整天在工作室與木工廠傳唱 F-U-C-K，歌聲將原本人際間的壓力推向另一種與國家之間的衝撞，當時不少像我這樣的亞洲學生的感受就是「原來，樓會倒，夢會醒，美國人也幹譙自己的國家。」

顯然，現代國家很有問題。

西遊記¹

2014-2015 的跨年間，我受邀主編第 78 期的《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讀者主要是台灣的建築師與建築學院師生。這是一種以編輯形式建構對當代台灣的建築教育與文化移植的論述方式，我與 27 位作者跨越香港、南京、檳城、紐約、路易維爾和臺灣之間的距離與時差，克服萬難完成 16 篇誠懇的文章，交織出「建築事件」、「東渡西遊」、「異鄉人」、「世代男女」、「建築合作社」和「重構社會建築」的各向視角，回應「西遊記」專題的初衷，我認為這是反思文化衝擊和文化認同對於建築專業教育與實踐的作用。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曾成德問我：「孫猴子被收服沒？」他認為自己是透過持續與他人交流學習中，反思建築的教與學。美國雪城大學建築學院 (Syracuse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院長史皮克斯 (Michael A. Speaks)，近期多次與台灣交流，他在往返紐約與亞洲、短暫停留台北時，曾與我述及 2014 年 11 月在紐約-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台灣建築展之深刻印象，他稱之為一場「台灣秀」，對他而言，那是第一次察覺到正在紐約工作與讀書的台灣青年建築師的才華與活力。其中 12 位曾經參與這場在紐約市舉辦的「移植」建築作品展覽的台灣留學生，於本期透過自己在美國的建築學院聽的演講和設計的作品，共同提出「非線性的設計方法」、「Reading, Re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全球性議題下的建築原型」、「全球化議題下的都市閱讀」、「城市中的建築／建築中的城市」的觀察與觀點，他們說：「這是一種新知識及環境轉換在作品之中所帶來的潛移默化。」為的是去釐清一些創作方法上的差異，以及試圖理解創作背後的思想脈絡。

這些年輕學生正在經歷的探索與轉變，是我們的老師及其老師也曾經歷過的旅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吳光庭從西遊美利堅，談起美國建築學院對台灣的近代建築師的影響。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俊銘，則是從自己留學東京的時代經驗，談東渡東瀛對台灣的歷史建築保存觀念的影響。美國路易維爾大學教授賴德霖，則是透過中國的庭園建築概念，在近代建築師的設計作品上的表現，重新認識文化對於建築師的深層作用。

¹ 本段文字節錄自作者主編的《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 (2014/04) <西遊記—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對於建築專業教育與實踐的作用> 之序文—〈文化積極性〉。



另一些建築師較少被台灣的建築報導媒體注意，在這群建築專業者裡，有些曾是離鄉背井來到台灣讀建築的僑生，有些則是跨領域學習建築的專業者，目前各自在亞洲各個城市工作著。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暨系主任王維仁，是最為鮮明活躍的建築師，他穿梭台灣和香港之間，思索著如何能形成亞洲自己的建築語言，他主張建築要回歸人與環境，才有機會體現與土地結合的美感經驗。陳耀威和黃木錦則是畢業自成大建築系，他們在台灣完成大學學業與數年建築實務工作經驗後，回到馬來西亞檳城（檳榔嶼），投入歷史城市的文化資產保存和修復當地老房子的工作，並參與促成了檳城世界文化遺產的登錄。另外，陳耀威長期用攝影和錄影方式，自製紀錄短片，長時間記錄自己的城市文化活動，希望能提醒人們一座活的城市多元且多樣的面貌。

然而，教與學建築並不是進入大學建築系才開始，一位中山女高的教師蔡紫德透過自己帶高中生到東京校外教學的經驗，提醒我們建築的教育不僅僅是一門給大學生選讀的科系，青少年對城市的探索，特別是對成人世界的解讀，恐怕也是今日建築專業者和教育者必須重新認識的課題。另一位剛從 MIT 媒體實驗室出來的建築師莊智超，剛投入經營 IOH 開放個人學習經驗平台，他現身說法解釋了電腦網路帶給時下年輕人的吸引力，是一種透過網絡零時差的合作模式，能完成前所未有的創作。資深女性建築師王秋華則給世代男女最誠摯的建言：「留學不止是為了進修專業，也是去增長人生經歷。…同時…建築是與各種人合作的成果。」

面對今日的城市轉型，建築學院裡教給學生的常識已經不太夠用。實踐大學建築系教授王俊雄從 2005 年起便覺察到學院教育的危機，他從 2007 年《台灣建築》雜誌開辦「6x2」，到 2012 年開始在宜蘭羅東文化工場和「日本一」共同舉辦大評圖與 PK 賽，試圖在建築學院的畢業設計之後，重新營造一種對話的平台，生產後畢業設計的論述。如同曾成德也曾提出「交流」的重要性，王俊雄具體指出了台灣學生透過與日本、香港、新加坡學生交流中，形成一面鏡子來看見自己的迫切需求。同樣的，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康旻杰，透過參與跨領域合作的國際工作營，看見城市營造的各種可能性，這已是超越藍圖規畫模式的國際視野之在地實驗。今日城市空間的公與私，展現比以往更詭辯的流動狀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張榮哲，長期關注社會運動在都市公共空間的狀況，他反思佔領公共空間背後被撩起的政治慾望，藉此反問當代的空間規畫專業者的因應之道。

「重構社會建築」是夏鑄九面對這波引動城市巨變的風雲所開展的新視野下的提醒：「網絡社會已來臨。」這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暨南京大學宜興講座教授認為：「全球都會區域的形構，一方面是創新氛圍與都會節點的網絡，另一方面，都會區域關係著對所謂沒有城市的都市化的辯論，它是短時間快速發展造成都會區域的越界環境污染與不可持續的城市，又是全球都會區域資訊經濟與社會吸納／排除所造成片斷化的都會區。」這是對當代空間規畫專業者的調適能力之大挑戰。夏鑄九對「重構社會建築」的期待，剛好也反應在「西遊記」專題下的各篇章節裡，作者們從自身的實際經驗或對歷史的反思，各自在崗位上持續努力建築的教育和實踐。

人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後所渴望的，往往不是盲目服膺於一種制式化了的文化，而會有更多的積極性，表現在持續反省的文化認知上，以及表現在適應社會轉變過程中，文化反身性（cultural reflexivity）會積極從各方面對我們起作用。

異質地方之營造²

回顧半世紀前，1964-65 年間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學運佔據校園訴求人權，學生站到街頭發報紙，發動市民積極參與都市規劃。1968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運同樣佔據校園訴求人權，抗議校方的體育館新建案，迫遷窮人、歧視黑人，校方趕緊宣布長期聘任專業的建築師整體規劃校園，小心處理校區周圍的社區居民的生活環境。這半世紀以來，世界各大都市的大學陸續投入都市空間研究與規劃民主改革運動，甚至，一些大學開放自己，融入市民城市，成為城市大學。

相較於市民城市的歷史，大學顯得很年輕，如果放在都市發展的軌跡與布局來看，又顯得舉足輕重。終究，今日無論如何看大學，都不是一種關起門來讀書的修道院，畢竟，大學集結了來自城鄉各地不同背景的學生一起生活，這些青年人對大學所在的市民城市脈動敏感且蠢蠢欲動。

當大學之門向市民城市打開，大學對都市的關鍵作用，不只是將大學校園靜靜地放在都市計畫的區位中評估效益，引人朝聖大學，帶來周圍的消費與活動。重點是，市民城市的歷史脈絡提供大學培養人才的養分，而成熟有活力的大

² 本段文字節錄自作者刊載於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2016 年 5 月出版的《15+ 新竹少年刑務所職務官舍群空間再利用規劃專書》的〈異質地方之營造〉。20-21 頁。

學能回饋給市民城市前進的能量，這便是今日的知識青年與社會大眾詰問大學教育的課題，這既是在關懷社會的視野下，檢視專業的知識生產與實踐，也是警覺到所謂的都市發展與市民城市之間似同非同的矛盾與衝突。



對我們的建築專業而言，此勢非同小可，當代的建築教育必須設法從學院內的烏托邦之夢醒來，回到都市社會中進行，同時必須在教學過程中積極建立空間專業者的反身性，並慎防尚未成熟的技術介入現實社會時可能造成的傷害，這便是此刻回頭重建大學教育、構思反省式教學的初衷與挑戰。

今日的建築教育須建構向外探索知識、跨域學習的行動力，同時，建築教育必須通識化，讓人們能用熟悉的語言，互相溝通共同生活的空間營造，以避免建築淪為追逐虛名、圖利他人的形式操作，或是粗製濫造的奇觀奇景。

觀自在

文末借用論文寫作期間聽到的一段話來提醒以建築為志業者，特別是自己：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這個社會沉澱在自己身上的歷史經驗，而這些經驗有時候會利用衝突和矛盾形成一個表達在外的一種行動。我是在參與社會的行動過程中，逐步克服歷史殘留在我身上未知的恐懼。它是可以被改變的，我們一起學習面對它。」
—夏林清（2016/06/07）

建築是社會的產物（漢寶德），是介入社會迂迴而未成形的行動（夏鑄九），甚至對個體而言，僅是觀自在的矛盾與實踐之空間營造。

留美返台同時教書與執業至今十餘年，建築對我而言，已經從設計房子的自我滿足，層層疊疊了不可迴避的複雜性，包括理解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係、認識環境變遷的壓迫感，以及必須參與社會的行動等等。此刻，反思以建築為志業的初衷，我仍有一個夢，建築師有巧手，能助人造家，有勤快的雙腳，能走入地方，有千里眼，能鑑古知今，有順風耳，能傾聽疾苦，有良心，能感同身受，有口才，能為兒童說故事，有德行，能安貧樂道，與平民百姓家中坐。

內文附圖



圖 1: 1968 年 7 月 5 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於行政院會見貝聿銘建築師。來源：國發會國家檔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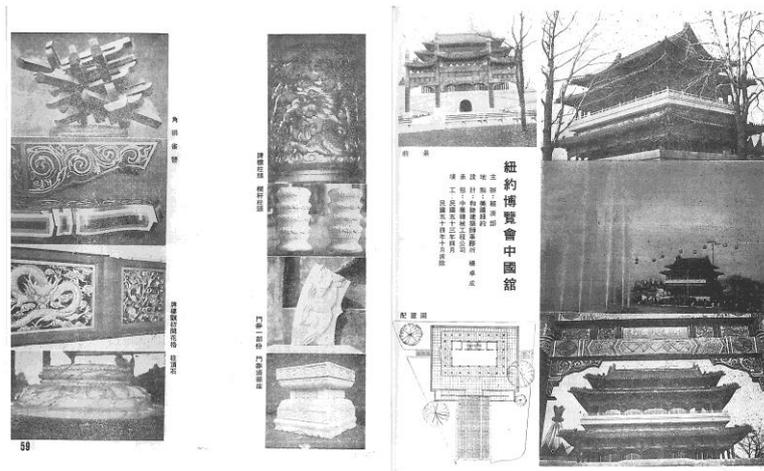


圖 2: 1964 年紐約市博覽會中華民國館。來源：1966 年 8 月份《建築》雙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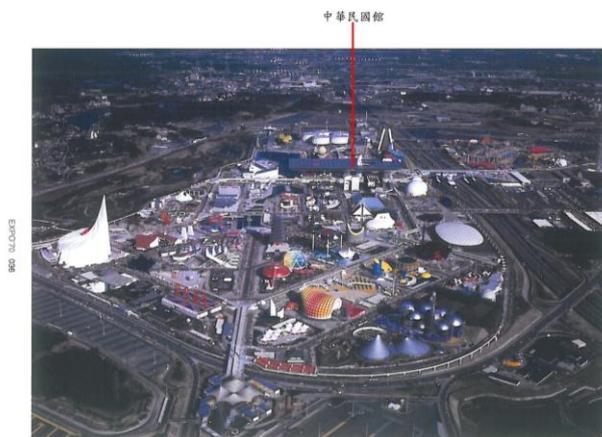
圖 3: 1966 年 11 月 12 日 中山樓落成日並宣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展開。來源：國發會國家檔案局。



圖 4: 1970 年副總統嚴家淦及其夫人到大阪萬博會為中華民國館主持中國日。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4: 1970 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本ノ会場全景、右端に「夕陽館」。
 右側の丘の上に「スウェーデン」
 が見える。本ノ会場が埋め立て
 された跡地である。 (編者注)

圖 5: 1970 年大阪萬博會全景（紅線為作者所加）。來源：EXPO'70 Surprising ! OSAKA JAPAN。



圖 6: 1970 年大阪萬博會中國日，北一女樂儀隊表演。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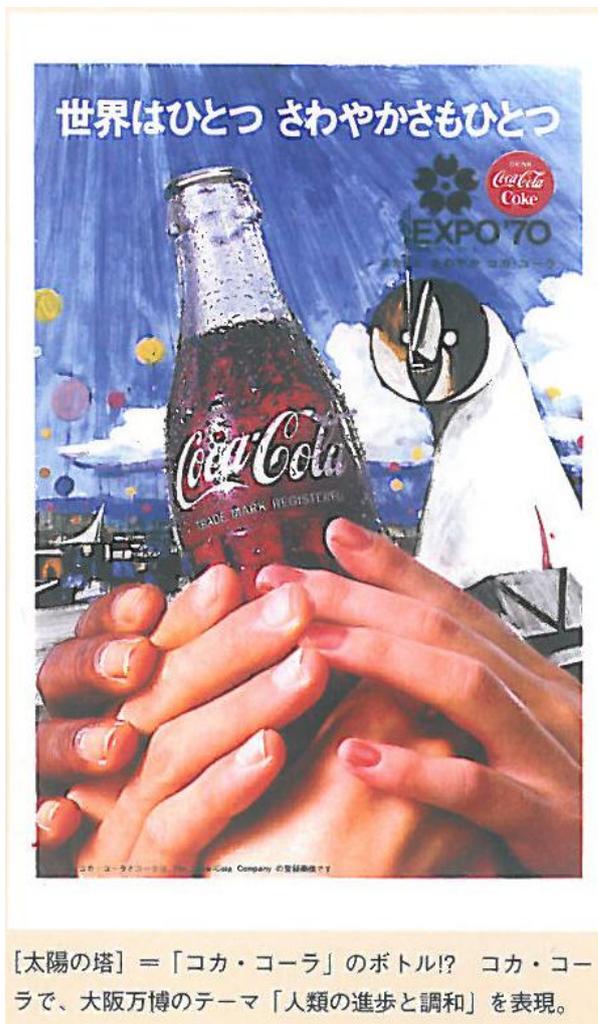


圖 7: 1970 年大阪博覽會場廣告海報。來源：EXPO'70 Surprising ! OSAKA JAPAN。



圖 8: 1930 年代嚴家淦離鄉往福建省政府前的攝影。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9: 1930 年代嚴家淦離鄉往福建省政府前的攝影。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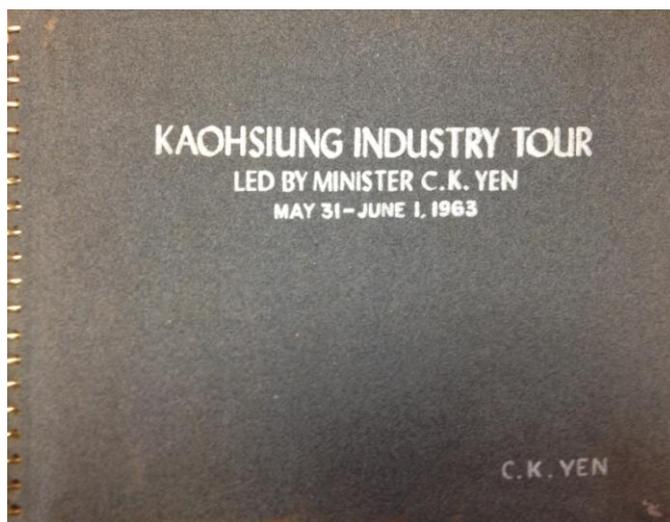


圖 10: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紀錄相簿封面。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11: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12: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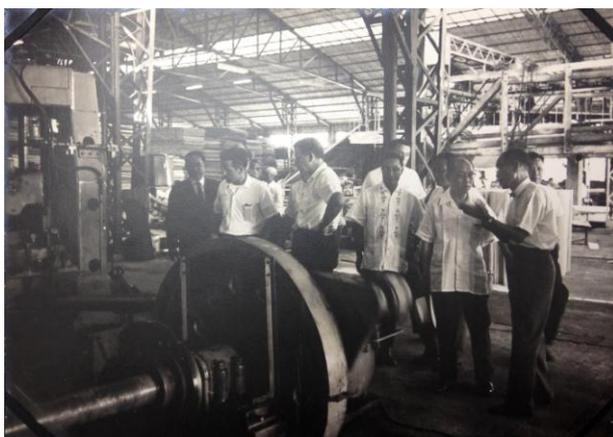


圖 13: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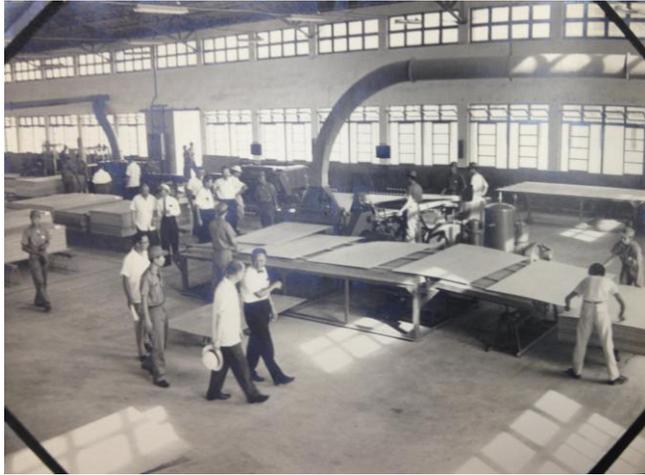


圖 14: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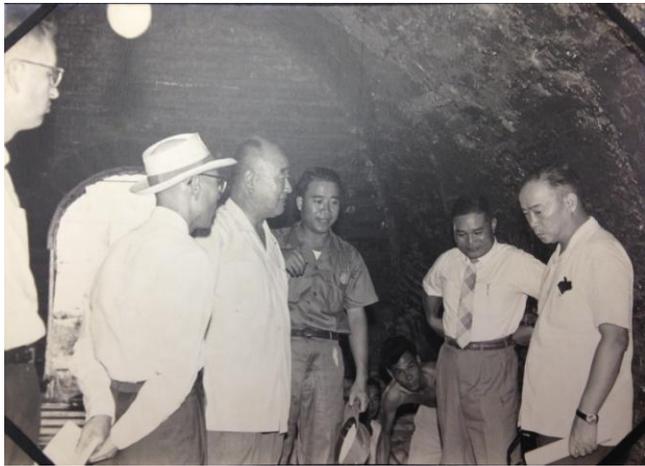


圖 15: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16: 1963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財政部長嚴家淦與美援顧問團參觀高雄工業。來源：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圖 17: 1963 年中泰賓館落成外觀。來源：作者收藏之中泰賓館明信片。



圖 18: 1963 年中泰賓館大門。來源：作者收藏之中泰賓館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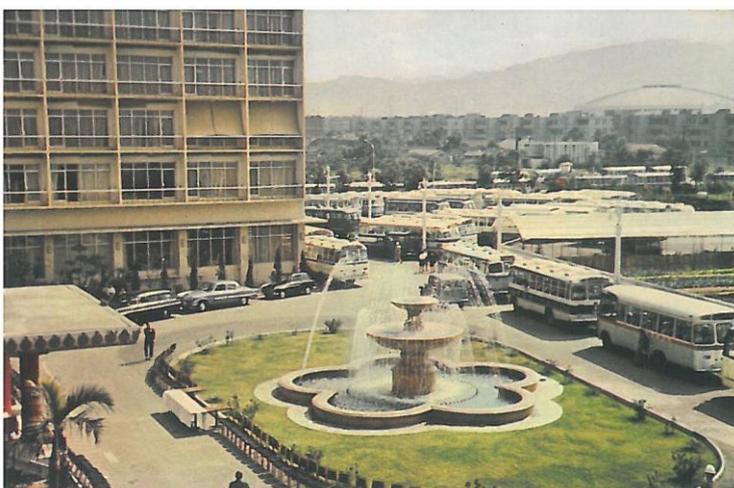


圖 19: 1963 年中泰賓館噴水池與停車場。來源：作者收藏之中泰賓館明信片。



圖 20: 1989 年 COCO 政治漫畫。來源：COCO (1989) 《時報漫畫叢書 5: COCO 1988~1989 政治漫畫》台北:時報文化。第 173 頁。

參考資料



- Barthes, R. (2010). *Le Neture*. 《羅蘭·巴賀特文集－中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文為 1977-1978 年法蘭西學院課程講義。張祖建翻譯)。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of the Grassroots*.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quhoun, A. (2002). *Modern architecture*. Oxford: Oxford Press.
- Cooper Marcus, C. (2006)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徐詩思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5 年)。
- Fenn, W. P. (1980). *Ever New Horizons –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22-1975*. New York : United Board.
- Giedion, S. (1941).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 (1988). *Cities of Tomorrow –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Harvey, D. (2007) 《巴黎，現代性之都》(黃煜文譯)。台北：群學。(原著出版於 2003 年)。
- Heynen, H. (1999).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USA: The MIT University Press.
- Hitchcock, H. R. & Johnson, P. (1932).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New York: W. W. Norton.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
- Kirkpatrick, Rob (2013) *1969: The Year Everything Changed* 《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北京：光明日報。(朱鸿飞譯)。
- Lefebvre, H.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Int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French Original 1947)

Lefebvre, H. (1995). *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welve Preludes, September 1959-May 1961*. London, New York: Verso. (French Original 196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Moor)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French Original 1974)

Minami Nakawada & atmosphere ltd. (2005) 《EXPO'70 驚愕！大阪萬國博覽會のすべて》。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

Said, E.W.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Tafuri, M. & Dal Co, F. (2000). *Modern Architecture: History of World Architecture*. 《現代建築》（劉先覺等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76年）。

Tafuri, M. (1976).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USA: The MIT University Press. (Italian Original 1973).

Tafuri, M. (1980).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Happer & Row. (Italian Original 1968).

Terence, J. 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Weber, M. (1958). *The C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eber, M. (1993) 《非正當性的支配》（康樂，簡惠美譯）。台北：遠流出版。（原著出版於1922年）。

人間雜誌社編（1988/11）〈讓歷史指引未來—溯走台灣民眾40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踪〉《人間》。（37）。

公共電視。〈中興新村三部曲〉《我們的島》。（630）。引用於2011年11月14日，取自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search.php>。

公共電視。〈打造中興新村再生夢〉《我們的島》。（630）。引用於2011年11月14日，取自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search.php>。

公共電視。〈誰是中興新村新住民〉《我們的島》。(630)。引用於 2011 年 11 月 14 日，取自 <http://web.pts.org.tw/php/html/island/search.php>。

天下雜誌社 (1988/2) 〈走過從前，回到未來—攜手台灣四十年，智慧考驗新未來〉《天下雜誌》。(81)。

王怡雯 (2003) 《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台灣經驗》。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敏穎 (2011) 〈建築史在西方與中國專業學院中的定位—從十八世紀迄今〉。《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7, 63-72)。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2012/05) 〈特別企劃：台灣現代建築 20+〉。《台灣建築》，(200, 頁 98-141)。

白景瑞導演 (1964) 〈台北之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

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2004) 《成功大學建築系六十周年紀念系友訪談錄 (一)》。台南：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

成大建築系 (1953-1954) 《今日建築》。

吳密察編 (2007) 《美援台灣與狄寶賽先生 Valery S. de Beausset and U.S. Aid to Taiwan》。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呂芳上 (2014) 《轉型關鍵—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台北：國史館。

李重耀 (1958) 《建築工程術語集》。南投：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李祖原 (1970/07) 〈中華民國館設計之回顧〉《建築與計畫》，(9, 頁 38-43)。台北：建築與計畫雜誌社。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2016) 《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台北：唐山。

林國炯等編 (2001) 《春雷聲聲—保釣運動三十周年文獻選輯》。台北：人間。

邱顯忠製作 (2007) 〈輕與重的對話〉《以藝術之名 In the name of art》。台北：公共電視。(3)。

- 
- 邵玉銘 (2013) 《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台北：聯經。
- 建築師雜誌社 (1979/1) <專集：光復以來台灣建築的回顧，1945-1978>《建築師》。
- 胡廷楣和洪菁耘編 (2010) 《69 個夢—訪問世博建築師》。上海：上海文藝。
- 胡志強 (1994) 《嚴前總統家淦先生哀思錄》。台北：新聞局。
- 茅家琦 (2003) 《蔣經國的一生與他的思想演變》。台北：臺灣商務。
- 夏鑄九 (1990) <書評：Hall, Peter. (1988).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0 夏/秋季號》，(3)。
- 夏鑄九 (1995) 《理論建築 – 朝向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台北：唐山。
- 夏鑄九 (2004) <現代性的移植與轉化：論現代建築在台灣的論述形構與漢寶德的建築省思>《城市與設計學報》，(17)。
- 張小虹 (2016) 《時尚現代性》。台北：聯經。
- 張系國 (1979) 《昨日之怒》。台北：洪範。
- 張靚蓓 (2012) 《龔弘：中影十年暨圖文資料彙編》。台北：文化部。
- 許麗玉編 (2015) 《西遊記—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對於建築專業教育與實踐的作用》。台北：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
- 許麗玉編 (2015) 《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歷史圖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 許麗玉編 (2015) 《靜波人生—故總統嚴家淦講稿選集》。台北：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 郭文亮 (2009) <中國教會大學校園建築傳承與東海大學校園>《冷戰結構下東亞地域主義建築 East Asian Regional Architecture under the Cold-war Structure》。台中：東海建研中心。(頁 63-115)。

陳翠蓮（2013）《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衛城。

陳樂人導（2012/07）《家鄉三部曲之二：村舍》。（紀錄片）。

傅朝卿（2003）《台灣近現代建築史》（A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aiwan）。台北：臺灣建築學會。

黃玉珊導（2003）〈凝固的音樂建築家：修澤蘭〉。《世紀女性台灣風華》。台北：公共電視。（3）。

黃海波編（2004）《一九四九大遷徙 The great emigration in 1949》。台北：含鈺。

漢寶德（1990）〈大乘的建築觀〉《賀陳詞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詹氏書局。（頁 5-19）。

漢寶德（2012）《築人間》。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漢寶德（2012）《建築母語—傳統、地域與鄉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漢寶德（2013）《東西建築十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鄭恆隆導（2005）《消失中的軸線-國立臺灣博物館百年滄桑與風華 1906-2005》。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

蕭瑞綺和蔡宜真編（2003）《桁間巧師—李重耀的建築人生》。台北：重耀建築師事務所。

錢鋼編（2010）《梁思成，林徽因 Liang and Lin》。北京：中國國際電視。

謝欣志導（2008）《熟悉的建築·陌生的歷史-王大閎與國父紀念館的故事 Familiar architecture , unfamiliar history – The story of Wang Da-Hong and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台北：國立國父紀念館。